

飛來峰64龕與65龕《寶王經》阿彌陀佛三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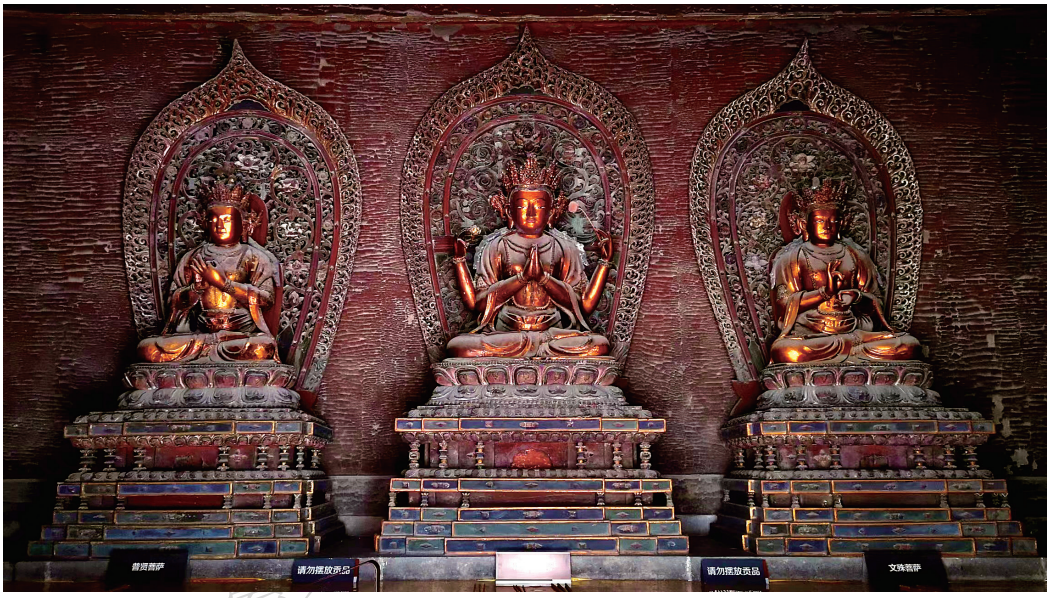


夏魯寺噶夾牆殿四臂觀音三尊

臺大學術



夏魯寺三門殿東側外牆大悲觀音戒定慧瑜伽修習圖



北京大覺寺主尊四臂觀音的三大士

DOI: 10.6541/TJAH.202309_(55).0003

宋夏元時期漢藏多民族佛教信仰的彙聚與趨同——四臂觀音、三怙主、三大士與轉經筒形成路徑考*

謝繼勝**

【摘要】四臂觀音「三怙主」是藏傳佛教最為重要的神靈組合，將原本屬於西方淨土的基層信仰與側重儀軌修習及教法師承的藏傳佛教義理融合在新的觀音圖式中；與此同時，漢地觀音地位升起進入華嚴系統成為釋迦三尊或華嚴三聖的主尊，並接受了二位原主神的須彌獅座，形成文殊-觀音-普賢的「三大士」，成為宋夏以後中土寺院佛教神系的統領。藏地三怙主借用四臂觀音眷屬獅吼觀音與三大士獅座觀音形貌的一致性，也部分進入漢地觀音三大士系統，替代大悲觀音或騎獅水月觀音，組成文殊-四臂觀音/獅吼觀音-普賢組合的漢藏融合的三大士新樣式。自十四世紀以後，六字真言專指或等同於四臂觀音，但脫離了與之相連的四臂觀音圖像以密咒真言形式成為藏傳佛教的象徵；觀音和四臂觀音進入三大士引導的華嚴華藏世界的轉輪藏與四臂觀音及六字真言勾連，六字大明咒進而進入華嚴輪藏系統，大約在十五世紀末以瑪尼輪形式傳入藏區，逐漸成為藏地民間最為重要的信仰。

關鍵詞：四臂觀音、三怙主、三大士、轉輪藏、轉經筒

引言

南宋、西夏後期至入元前後，即十二世紀後半葉至十四世紀，漢藏多民族① 佛教信仰發生了顯著的變化。表現在佛教藝術圖像方面，因應此期佛教滲入民間信仰，唐五代興起的全民文殊菩薩信仰轉向社會特定階層，在民間逐漸式

* 本文為2015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案「文物遺存、圖像、文本與西藏藝術史構建」專案號15ZDB120的階段性成果

** 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 教授

① 本文使用的「漢藏多民族」概念是筆者數十年來從事藏學或美術史學研究宣導建立的學術原則，即以宋夏元時期以漢（唐五代至宋）、遼、藏（吐蕃），西夏、回鶻等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史實導引出以漢藏等代表民族為主流的中國多民族文明的彙聚與趨同之

臺大藝術期刊資料庫

微，或與反映淨土觀念的觀音信仰組合成新的圖像引導系統，觀音佔據了佛教神靈的頂端，由法華進入華嚴體系，替代原本由毗盧遮那或釋迦牟尼與文殊、普賢組成的華嚴三聖，形成新的以觀音為主的三大士，統攝諸佛菩薩與羅漢，元明以後成為漢地基層寺院的新圖像系統；表現在漢藏多民族佛教圖像方面，緣起民間佛教信仰但又顧及教理與體系化佛教的儀軌訴求，側重曼荼羅次第修習的四臂觀音的地位在宋夏元時期的十三世紀至十四世紀陡然升起，在絲路東段河西走廊一線的回鶻、西夏故地出現了早期四臂觀音圖像，並將之作為一種新的觀音式樣替代千手千眼大悲觀音；表現在藏傳佛教圖像體系，同樣在十三世紀末至十四世紀初，與六字真言固定搭配的四臂觀音圖像流行開來，借助基層觀音信仰的力量和吐蕃時期胎藏界三尊的金剛手-毗盧遮那/釋迦牟尼/文殊菩薩-蓮花手觀音的生成路徑，形成金剛手-四臂觀音-文殊菩薩的固定三尊，稱為「事部三怙主」，以瑜伽四部之基礎事部的尊格進入藏傳佛教的密教系統，三怙主將原本屬於西方淨土的基層信仰與側重儀軌教法師承的藏傳佛教義理融合在新的觀音圖式中，逐漸替代或等同毗盧遮那或釋迦牟尼，將佛部文殊菩薩推移至脅侍的位置，成為了藏傳佛教不同階層信眾供奉的至高無上的神靈。與此同時，藏地三怙主在形成與東傳的進程中，以四臂觀音眷屬獅吼觀音與騎獅水月觀音「獅座」的圖像契合進入漢地佛教三大士系統，替代大悲觀音或騎獅水月觀音，於宋夏元時期成為三大士的主尊，組成文殊-獅吼觀音/四臂觀音-普賢三大士體系，並建構了藏漢三怙主與三大士信仰的邏輯關聯。漢藏信眾念誦阿彌陀佛名號或持誦六字真言，其起源發展的路徑大致相同。宋元時期形成，源於西方淨土的三大士糅合了淨土與華嚴，此後藏傳四臂觀音替代三大士主尊大悲或水月觀音成為新主尊統領華嚴文殊普賢，原本屬於華嚴華藏世界的轉輪藏就此與四臂觀音勾連，六字大明咒順理成章的進入華嚴輪藏系統，大約在十五

勢，印證中華文明的多元一體，以多元趨同一體的發展格局。其中「漢藏」、「民族」、「漢地」、「藏地」等概念，有民族和地理名稱的轉化，因為目前很難找到準確的表述，其中有現代語義的借用。參看謝繼勝，〈漢藏文明的形成與多民族中國文明史〉，《中國社會科學報》，2018年2月26日；謝繼勝、趙媛，〈建構多民族共創中華文明史的知識體系〉，《廣西民族大學學報》，2021年4期。

臺大圖書館典藏資料庫

世紀末以瑪尼輪的形式傳入藏區，逐漸成為藏傳佛教信眾最為重要的基本信仰，其間蘊含的淨土、華嚴與藏傳佛教義理反映了漢藏佛教信仰的彙聚與趨同。

一、多臂觀音、四臂觀音與《寶王經》

多臂觀音信仰是唐宋時期密教興起與傳播的結果，與之相關的經典譯為漢文的時間大約在西元六世紀末至九世紀中葉，圖像出現在八世紀前後，② 其中十一面大悲觀音是漢藏佛教乃至東亞佛教共有的主要觀音形態，甚至晚唐所見具有四臂的觀音也是十一面。③ 四臂觀音與持寶菩薩及六字大明母的三尊組合出現在波羅巽那時期（Pala-Sene，十一至十二世紀）的東北印度或南印度，多見於雕塑形式，如印度比哈爾邦出土四臂觀音三尊（圖1a），④ 也有十二世紀

② 如北周保定四年（564）天竺僧耶舍崛多譯，《佛說十一面觀世音神咒經》，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第20冊，No. 1070，頁149-151；唐顯慶元年（656）玄奘譯，《十一面神咒心經》，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第20冊，No. 1071；唐慧沼（648－714）著，玄奘譯本注疏，《十一面神咒心經義疏》，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第39冊，No. 1802；唐天寶年間（746－774）不空譯，《十一面觀自在菩薩心密言念誦儀軌經》，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第20冊，No. 1069等。

③ 龍門石窟擂鼓臺北洞門內側有十一面四臂觀音像，不空譯，《十一面觀自在菩薩心密言念誦儀軌經》記載，此觀音「作十一頭，四臂，右邊第一手把念珠，第二手施無畏，左第一手持蓮花，第二手執君持。」（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第20冊，No. 1069，頁141。）；參看顏娟英，〈唐代十一面觀音圖像與信仰〉，《佛學研究中心學報》，11（2006.7），頁85-116。

④ （印度）蘇達卡爾・沙爾曼著，向紅笳、劉釗譯，《印度帕拉王朝的造像藝術》（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20）（英文原名Sudhakar Sharma, *Heritage of Buddhist Pala Art* [New Delhi: Aryan Books International, 2004], 289 pages.），圖版82（巴特那博物館藏青銅編號No. 9788/9780）的觀音是印度早期的立像「四臂觀音」，或在九世紀末至十世紀初，主要分佈在東北印度的比哈爾邦，形貌高髮髻，髻上有阿彌陀化佛，右手數珠，左手期克印，右下手與願印，左下執手蓮花。同書圖版80和81（新德里博物館編號No. 60.605）是九至十世紀石雕「四臂觀音」兩尊，右上手數珠，左手持蓮，右下

臺大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末梵文貝葉經插圖的個案（圖1b），⑤ 但印度所見的四臂觀音例證與六字真言還沒有圖像伴生關係。

藏地十二世紀前後即有從周邊地區輸入的四臂觀音金銅造像，典型作品如北京故宮藏並蒂蓮座四臂觀音三尊（圖1c），⑥ 但四臂觀音與六字真言大範圍連袂傳播，已遲至十四世紀前後。⑦ 西元九世紀前後吐蕃文獻記載的觀音與唐敦煌等地流行的觀音名類大致相同，主要有十一面八臂大悲觀音、如意輪觀音和不空罥索觀音等。例如《旁塘目錄》收錄、⑧ 也在敦煌藏文寫本出現的涉及觀音的經典，有《聖觀自在一百零八名》（*'phags pa spyan ras gzīgs dbang phyug gī mtshan brgya rtsa brgyad pa*），《聖觀音如意輪贊》（*'phags pa spyan ras gzīgs yid bzhin 'khor lo la bstod pa*），《聖十一面觀自在陀羅尼》（即《十一面觀音神咒經》*'phags pa spyan ras gzīgs dbang phyug gī zhal bcu gcīg pa zhes bya ba'i gzungs*），《聖不空罥索陀羅尼》（*'phags pa don yod pa'i zhags pa zhes bya ba'i gsungs*）以及《具千手千眼聖觀音王菩薩大悲無礙廣大圓滿陀羅尼》（*'phags pa byang chub sems dpa' spyan ras gzīgs dbang phyug phyag ston spyan ston dang ldan ba thogs pa myi mnga' ba'i thugs rje chen po'i sems rgya cher yongs*

手與願印，左下手淨瓶（軍遲），年代在十世紀，但兩側脅侍菩薩不是持寶和大明母。十一世紀末至十二世紀，比哈爾邦石雕已有完整的四臂觀音三尊，上方還有五方佛，如萊頓大學圖書館藏四臂觀音三尊（圖版編號No3813 1910）是十二世紀末四臂觀音的標準式樣，印度鹿野苑博物館（Sarnath Museum）藏四臂觀音三尊像（編號Sadaksari Lokesvara, Bihar, India P-039252）也是十二世紀造像的完美例證。

⑤ 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西孟加拉地區收集的《般若波羅蜜多》貝葉經插圖（博物館編號No. 2001.445a 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60785，檢索日期：2023年10月29日），年代在波羅王朝時期十二世紀，插畫以四臂觀音修度六波羅蜜，插圖中另有綠度母。

⑥ 參看楊新、王家鵬主編，《中國美術分類全集・中國藏傳佛教雕塑全集上・金銅佛》（北京：北京美術攝影出版社，2002），頁58，圖版67，四臂觀音三尊坐像。

⑦ 謝繼勝，〈平措林寺六體六字真言碑與蒙元真言碑源流〉對此問題有充分討論，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9本4分（2018），頁663-710。

⑧ 西藏博物館編，《旁塘目錄・聲明要領兩卷》（*dKar chag 'phang thang ma sGra sbyor bam po gnyis pa*）（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頁31-32。

臺大圖書館典藏資料庫

su rdzogs pa zhes bya ba'i gzungs bam po dang po）等等。⑨

最早記載「六字真言」的文獻見收入北京版《丹珠爾》經疏部（mDo 'grel）ngo卷的《聲明八品之六》（*sGra'i gnas brgyad kyi drug pa*）的《說聲明類別品》（*sGra'i rnam par dbye ba bstan pa*），在該卷最後一部分討論呼喚詞（bod pa）時引用的例子就是Oṃ maṇi Padme Hūṃ。⑩《聲明》卷作者不明，年代與見於九世紀吐蕃贊普赤熱巴巾時印藏譯師於溫姜多宮（'on cang do）編纂的《聲明兩卷》（*sGra sbyor bam po gnyis pa*）的年代相當。⑪ 此外還有敦煌九世紀或十世紀的寫卷，但其中六字陀羅尼與現今的寫法略不同。⑫ 除了以上吐蕃文獻，藏傳佛教對與觀音相關的「六字真言」及《寶王經》的記載多為十二世紀以後的史籍，認為在吐蕃贊普拉脫脫日年贊（lha tho tho ri gnyan btsan）時期有天降「玄密靈物」（gnyan po gsang ba），其中就有《寶王經》和「六字真言」。⑬ 傳說色彩較淡，較為確鑿的記載是九世紀前後編輯的《丹

⑨ 有關敦煌藏文卷子中涉及觀音的文獻，才讓「觀世音菩薩類的密典及吐蕃時代的觀音信仰」做了很好的整理與注釋，參看才讓，《菩提遺珠：敦煌藏文佛教文獻的整理與解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第三章，頁141-182。

⑩《語合》（*sGra'i rnam par dbye ba bstan pa*），收入《丹珠爾》，北京版，經疏部（mDo 'grel），ngo卷（vol. NGO 63v7-64r2:）其中呼喚詞提到「諸中心呼喚詞如六字陀羅尼，唵、嘛、呢為五智本性。」（de yang 'di ltar oṃ ma ṇi padme hūṃ zhes pa lta bu la/ oṃ ma ṇi ye shes lnga'i ngo bo yin pas dang por smos pa yin pas/ hūṃ ni thugs dgongs shig ces par mjug bsdus pa yin te bar gyi bod pa dngos ni ma ṇi ni nor bu yin la/ padme ni dngos te sor bzhag go [/] /des na nor bu padma zhes pa la phyag 'tshal gyi sgo nas bod pa yin la/）。參看 P. C. Verhagen, "The Mantra "Oṃ maṇi-padme hūṃ" in an Early Tibetan Grammatical Treatise," *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13:2 (1990), pp. 133-138.

⑪《語合》（*sGra'i rnam par dbye ba bstan pa*）全文收在藏文《丹珠爾》中，敦煌藏文寫卷Pt. 845就是該書的一部分。《語合》的全文包括序言、正文和跋三部分。

⑫ 參看今枝由郎〈敦煌藏文寫卷六字真言初探〉刊於《敦煌研究論稿》（Yoshiro Imaeda, "Note preliminaire sur la formule om mani padme hum dans les manuscrits tibetains de Touen-houang," in Michel Soymieed., *Contributions aux etudes sur Touen-houang* [Geneve-Paris: Librarie Droz, 1979], pp. 71-76.）今枝由郎所輯三份敦煌寫卷中的真言有不同寫法，分別是 "oṃ ma ni pad me hūṃ myi tra swa-hā", "oṃ ma ma ni pad me/ hum-mye" 和 Pt. 37 寫卷中的 "oṃ ma ma-n[?] i pad me/ hūṃ myi'"

⑬ 如札巴孟蘭洛卓（Grags pa smon lam blo gros）著《奈巴教法史》（*Nel pa chos 'byung sngon gyi me tog phreng ba*）記載，拉脫脫日年贊時期，李提斯（li the se）與吐火羅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噶目錄》（*dKar chag ldan dkar ma*），⑭該目錄大乘經部收有《寶篋莊嚴頌》（即《寶王經》）1365頌，四卷，傳說七世紀前後由吞米桑布紮譯出，藏文全名*'Phags pa za ma tog bkod pa s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梵文經名簡稱*Kāraṇḍavyūha Sūtra*。⑮布頓《布頓佛教史》（*Bu ston chos 'byung*，1322）亦有同樣內容的著錄。⑯

《寶王經》漢譯本由迦濕彌羅僧人天息災（法賢）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於開封譯經傳法院譯出，經名《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此經非常詳

（tho gar）譯師羅森措（blo sems 'tsho）自天竺請來班智達李敬（legs byin）為國王講經，因吐蕃沒有文字，乃將《寶篋莊嚴經》心咒六字真言，用金粉書寫於黃紙上，摁上手印獻於贊普。藏文本《奈巴教法史——古譚花鬘》原文初刊於《中國藏學》，藏文本，1989年4期，頁78-79（71-100），漢文譯文見札巴孟蘭洛卓著，王堯、陳踐譯，《奈巴教法史—古譚花鬘》，《中國藏學》，1990年1期，頁114（108-127）。蔡巴・貢噶多吉著，東嘎・洛桑赤列校注，《紅史》（*Deb thar dmar po*），藏文本（北京：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頁34則記載降落的有《六字大明心咒》；蔡巴・貢噶多吉著，東嘎・洛桑赤列校注，陳慶英、周潤年譯，《紅史》，漢譯本（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頁31；《西藏王統記》（*rGyal rabs gsal ba'i me long*）、《漢藏史集》（*rGya bod yig tshang*）、《賢者喜宴》（*mKhas pa'i dga' ston*）、《青史》（*Deb ther sngon po*）對「玄密靈物」的記載大同小異。

⑭全文名稱為《丹噶宮所藏一切經目錄》（*Pho brang stod thang ldan dkar gyi chos 'gyur ro cog gi dkar chag*），收入《丹珠爾》，德格版jo，葉294-310，日本東北大學編大藏經目錄4364。

⑮《寶篋莊嚴大乘經》（*'Phags pa za ma tog bkod pa s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收入《甘珠爾》，納塘版ja函，葉200a-247b，日本東北大學編大藏經目錄116，經末跋尾云：「此《寶篋莊嚴大乘經》由印度堪布勝友、施戒與慧軍譯師翻譯」（'phags pa za ma tog bkod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 rdzogs so/ /rgya gar gyi mkhan po dzi na mi tra dang / dā na shī la dang / zhu chen gyi lo tsha ba ban dhe ye shes sdes bsgyur cing zhus te gtan la phab pastog）。

⑯《布頓佛教史》（*Bu ston chos 'byung*）將《寶王經》列在大乘經部。文中記贊普10歲所居雍布拉康宮頂，自天宮降落寶篋，有《寶篋莊嚴經》（*Za mo tog bkod pa*）和《百拜懺悔經》（*dPang skong phyag brgya ba*）及金塔一座，布頓・仁欽珠，《布頓教法史》，藏文本（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88），頁181；布頓・仁欽珠著，蒲文成譯，《布頓佛教史》，漢譯本（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2007），頁152。

臺大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盡的敘述了六字大明咒的精義與功德、⑰ 佩飾與念誦六字大明咒無與倫比的功用，⑱ 指出反映六字大明咒本性的的觀音是千手千眼大悲觀音，⑲ 四臂觀音是在卷四的曼荼羅壇場中敘及，這也是四臂觀音最早的經典，其中強調要獲得《寶王經》記述的六字大明咒的法力，必須進入四臂觀音的曼拏囉（即曼荼羅）壇場：

> 觀自在菩薩白世尊言：「不見曼拏囉者不能得此法。」云：「何知是蓮華印。」云：「何知是持摩尼印。」云：「何知是一切王印。」云：「何知是曼拏囉清淨體。」

---

⑰ 《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卷三：「是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微妙本心，若有知是微妙本心即知解脫。」「若有人能而常受持此六字大明陀羅尼者，於是持誦之時，有九十九殑伽河沙數如來集會，復有如微塵數菩薩集會，復有三十二天天子眾亦皆集會，復有四大天王，而於四方為其衛護，復有娑誐囉龍王無熱惱龍王，得叉迦龍王嚩蘇枳龍王，如是無數百千萬具胝那庾多龍王而來衛護是人，復有地中藥叉虛空神等而亦衛護是人。」「若得彼者不可思議無量禪定相應，即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入解脫門見涅盤地，貪瞋永滅法藏圓滿，破壞五趣輪回淨諸地獄，斷除煩惱救度傍生。」天息災譯，《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第20冊，No. 1050，頁47-63。

⑱ 《寶王經》卷三：「若復有人以此六字大明陀羅尼，身中項上戴持者，善男子若有得見是戴持之人，則同見於金剛之身，又如見於舍利窣堵波，又如見於如來，又如見於具一具胝智慧者；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而能依法念此六字大明陀羅尼，是人而得無盡辯才，得清淨智聚，得大慈悲，如是之人日日，得具六波羅蜜多圓滿功德，是人得天轉輪灌頂，是人於其口中所出之氣觸他人身，所觸之人發起慈心離諸瞋毒，當得不退轉菩薩，速疾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此戴持之人，以手觸於餘人之身，蒙所觸者是人速得菩薩之位，若是戴持之人，見其男子女人童男童女，乃至異類諸有情身，如是得所見者，悉皆速得菩薩之位；如是之人，而永不受生老病死苦愛別離苦，而得不可思議相應念誦。今此六字大明陀羅尼，作如是說。」天息災譯，《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第20冊，No. 1050，頁59。

⑲ 《寶王經》卷四：「歸命蓮華王，大悲觀自在。大自在吉祥，能施有情願。具大威神力，降伏極暴惡，暗趣為明燈，睹者皆無畏。示現百千臂，其眼亦復然。具足十一面，智如四大海。」天息災譯，《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第20冊，No. 1050，頁48。

臺大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今此曼拏囉相：周圍四方方各五肘量中心曼拏囉安立無量壽。于無量壽如來右邊，安持大摩尼寶菩薩；于佛左邊，安六字大明。四臂、肉色白如月色、種種寶莊嚴。左手持蓮華，于蓮華上安摩尼寶；右手持數珠，下二手結一切王印。于六字大明足下安天人，種種莊嚴。右手執香爐，左手掌鉢滿盛諸寶。於曼拏囉四角列四大天王，執持種種器仗；於曼拏囉外四角，安四賢瓶，滿盛種種摩尼之寶。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入是曼拏囉者。所有眷屬不及入是曼拏囉中，但書其名。彼先入者擲彼眷屬名字，入於曼拏囉中，彼諸眷屬皆得菩薩之位，于其人中離諸苦惱，速疾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彼阿闍梨不得妄傳。⑳

這段經文，我們對照藏文譯本對勘，需要注意的是：

（1）獲得六字大明咒的法力與功德，必須進入有「六字大明母」（yi ge drug pa’i rig sngags chen mo）在場的曼拏囉，所謂「不見曼拏囉者不能得此法。」藏文本提到有此壇場有「八曼荼羅」（d kyil ’khor brgyad）。四臂觀音與《寶王經》記載的，同樣與六字大明咒關聯的大悲觀音等比較，明確說明四臂具有密教所謂「明咒」（rigs sngags）的力量，但這種力量需要相應的儀軌，必須建立壇場，有相應的護法神祇，所謂「不見曼拏囉者不能得此法。」因此，四臂觀音出現之始就與密教曼荼羅關聯，屬於密教神靈，這也為她此後在藏傳佛教中地位的升起奠定了基礎。

（2）六字大明咒不等同於六字大明母，六字大明母是六字大明咒的守護神和人格化或神格化的形象，《寶王經》中六字大明咒與十一面八臂大悲觀音相聯繫，六字大明咒最初屬於整個《寶王經》論述中心的十一面大悲觀音的咒語，不是四臂觀音的咒語。至明宣德六年（1431）的《諸佛菩薩妙相名號經咒》，其中標明「大悲觀音心咒」是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得彌吽」（Oṃ maṇi Padme Hūṃ）（圖2），四臂觀音的心咒則是「唵盧葛納塔藍莎曷」（Oṃ lo ga nva thva lam sva hva）即「世觀音」（圖3）。㉑

---

⑳ 《寶王經》卷四。天息災譯，《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第20冊，No. 1050，頁61。

㉑ 版畫四臂觀音是有明確紀年的四臂觀音造像。藏文只標注spyan ras gzigs但漢文譯音「土耳只纏卜插日瓦即四臂觀音心咒唵盧葛納塔藍莎曷」，還原藏文thugs rje chen po phyag [bzhi pa]，心咒是om lo ga na’ tha’ lam srva hva即梵文om lokanāthā lam svāhā，其中lokanāthā為「世間主」，svāhā「敬禮」、「致禮」，心咒就是「敬禮世尊」。翁連溪、李

臺大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3）曼拏囉的中央安置無量壽如來（snang ba mtha’ yas），也就是四臂觀音頭頂化佛的阿彌陀佛，是宋元之際四臂觀音取代無量壽佛作為曼拏囉主尊的基礎，六字大明母作為脅侍不是曼拏囉的核心，六字大明咒的精髓當為無量壽而非六字大明母；曼拏囉的中央主尊安置「無量壽如來」（snang ba mtha’ yas），這裡藏文原文為無量光，但法賢漢譯為「無量壽」，譯名受到唐密胎藏界和藏密金剛界的影響，吐蕃時期無量光多譯無量壽，㉒ 十三世紀以後藏傳佛教造像無量光與無量壽開始區隔，前者轉變為阿彌陀佛。

（4）曼荼羅四周安置四大天王（dkyil ’khor de’i gra’ bzhir rgyal po chen po bgyi ste）強調四大天王守護而非明王護法守護的大多屬於顯密之間側重儀軌實踐的壇場，在四部密續中屬於事密（bya rgyud），敦煌晚唐至五代受到密教影響的石窟，窟頂四角都安置四大天王；此外，《寶王經》以無量壽和觀音眷屬為配置的曼荼羅式樣也深刻影響了宋遼夏時期的石窟與寺院佈局。如莫高窟99窟至100窟，西夏文殊山石窟，甚至是明中葉十六世紀的炳靈寺第70窟。

（5）主尊右側為持寶菩薩（當為《寶王經》譯寶手菩薩者byang chub sems dpa’ nor bu rin po che ’dzin pa），所持之寶即為摩尼寶。㉓ 筆者判斷，阿彌陀佛兩側脅侍持物分別是摩尼（瑪尼）和蓮花，正好是六字真言的精髓，如同火焰摩尼和蓮花的（阿彌陀佛）無量壽佛，㉔ 因此十三世紀後半葉起六字真言經常與阿彌陀佛種子字一同出現稱為Oṃ Maṇi Padme Hūṃ Hrīh。㉕

洪波主編，《中國佛教版畫全集》（北京：中國書店，2014），第7卷，頁21。國家圖書館版本提供，《諸佛菩薩妙相名號經咒》（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1），頁42。

㉒如不空譯，《無量壽如來觀行供養儀軌》，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第19冊，No. 930，頁67-71。

㉓夏魯寺噶夾牆四臂觀音三尊中持寶菩薩背龕兩立柱上安置摩尼寶，右手持珠寶，左手執珊瑚。

㉔《寶王經》卷一：「爾時，寶手菩薩摩訶薩，白世尊言：『以何因緣出現斯瑞？』佛言：『善男子，是觀自在菩薩摩訶薩，欲來到此故現斯瑞。』是時，又雨適意妙華及妙蓮華。時，觀自在菩薩手執金色光明千葉蓮華，來詣佛所頂禮佛足，持是蓮華奉上世尊：『此華是無量壽佛令我持來！』世尊受是蓮華，致在左邊。」天息災譯，《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第20冊，No. 1050，頁50。

㉕謝繼勝，〈平措林寺六體六字真言碑與蒙元真言碑源流〉，頁663-710。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6）左側與四臂觀音身色形象相同的神靈稱為「六字大明母」，下兩手手印不譯「合十印」，而是「一切王印」（藏譯rgyal po'i dbang po thams cad kyi phyag rgya 或者phyag gnyis thal mo sbyar ba rgyal po'i dkyil 'khor thams cad kyi phyag rgya「雙手合掌做一切王曼荼羅手印」），僧俗施主合十印即為一切王印。㉖

需要關注的是整鋪曼荼羅有主從三尊，曼荼羅中央主尊為無量壽佛（dkyil 'khor gyi dbus su ni snang ba mtha' yas），主尊右側為持寶菩薩，主尊左側為六字大明母（yi ge drug pa'i rig sngags chen mo），注意此處沒有說明是「六字大明王」，即沒有 -rgyal mo後綴，大明母白色身形，一面四臂，左上手持蓮華，右上手執數珠。此處《寶王經》記載的三尊配置清楚明白：中心曼荼羅本尊為無量壽阿彌陀佛，六字大明母不是「曼拏囉」的核心，六字大明咒的神力得

㉖《寶王經》卷四曼荼羅，收入《丹珠爾》，多頗章寫本（stog pho brang），卷74，葉577-578。藏文原文如下：*'Phags pa za ma tog bkod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 byang chub sems dpa' spyan ras gzigs kyi dbang pos 'di skad ces gsol to/ /dkyil 'khor brgyad kyis 'di stsal bar bgyis te/ bcom ldan 'das ji ltar na me tog padma lta bu'i phyag rgya 'dzin/ ji ltar na nor bu 'dzin pa'i phyag rgya rtogs par 'gyur/ ji tar na rgyal po'i dbang po thams cad kyi phyag rgya rtogs par 'gyur/ ji tar na dkyil 'khor yongs su dag pa rtogs par 'gyur zhen/ dkyil 'khor gyi mtshan ma ni 'di dag lags te/ gru bzhi la khru lnga khor yug tsam du bgyis te/ dkyil 'khor gyi dbus su ni snang ba mtha' yas bri'o/ de bzhin gshegs pa snang ba mtha' yas kyi sku la nor bu rin po che indra ni' la'i phye ma dang/ margad kyi phye ma dang/ padma ra' ga'i phye ma dang/ shel gyi phye ma dang/ dngul gyi phye ma gtor bar bgyi'o/ g'yas phyogs su ni byang chub sems dpa' nor bu rin po che 'dzin par bgyi'o/ /g'yon phyogs su ni yi ge drug pa'i rig sngags chen mo bgyes te/ phyag bzhi po kha dog 'dams bu'i mda' rgyu bzhin du dkar ba/ rgyan sna tshogs kyis brgyan pa phyag g'yog par padma bgyi'o/ padma'I steng du nor bu bgyi'o/ /phyag g'yas par sngags kyi nor bu bgyi'o/ /phyag gnyis thal mo sbyar ba rgyal po'I dkyil 'khor thams cad kyi phyag rgya bgyi'o/ /yi ge drug pa'I rig sngags chen mo nga'I zhabs kyi 'og tu rig 'dzin bgyis te/ lag pa g'yas pa na bog phor thogs shing bdug par bgyi'o/ lag pa g'yon pa na rgyan rnam pa sna tshogs kyis gang ba'I skyon bu thogs par bgyi'o/ dkyil 'khor de'I gra' bzhir rgyal po chen po bgyi ste/ lag cha sna tshogs thogs par bgyi'o/ dkyil 'khor de'I gru bzhir bum pa gang ba nor bu rin po che sna tshogs thogs pa gzhag go/ rigs kyi bu 'om/ rigs kyi bu mo gang la la zhig dkyil 'khor du 'dzug par 'tshal na/ des rus chags kyi rgyud thams cad kyi ming bris la thog ma kho nar der ming de dag stsal bar bgyi ste/ de dag thams cad mi'I sdug bsngal thams cad spangs shing pa tham ba'I byang chub sems dpar 'gyur ro/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之於無量壽而非六字大明母，曼荼羅的精髓是勾畫無量壽佛（與無量光佛等同），即阿彌陀淨土，六字大明陀羅尼的功德原意是佑護信眾進入西方淨土。左側的六字大明母身形與四臂觀音相同，白色身，四臂；無量壽右側的脅侍是持寶菩薩，持摩尼寶，但吐蕃藏文譯本與法賢漢文譯本《寶王經》，都沒有說明持寶菩薩的臂數及其持物，從十一世紀以後留存圖像看，也是一面四臂。實際上，《寶王經》曼荼羅記載中並沒有出現「主尊四臂觀音」，四臂形態「觀音」只是作為脅侍的六字大明母。從手印觀察，佛教圖像系統中，主尊佛或菩薩作合十印的很少，一般是僧俗供養人、脅侍菩薩或主尊眷屬作合十印，六字大明母作為無量壽佛的脅侍菩薩，與持寶菩薩皆作合十印。替換無量壽佛作為主尊進入曼荼羅後，六字大明母作為接受供奉的主尊同樣作合十印就很奇怪，說明她保留了原作為脅侍菩薩的身形特徵，這也正是六字大明母替換無量壽佛的痕跡。筆者確認，隨著西藏佛教信仰的演進，六字大明母以「四臂觀音」之名取代無量壽佛作為《寶王經》曼荼羅的主尊，原本漢藏共通的阿彌陀終極淨土信仰被四臂觀音所象徵的瑜伽禪定戒定慧得到解脫的修習程式所替代，所謂以過程取代了結果。在衛藏寺院的建造史中尚可以看到這種過程，早期如十一世紀的桑耶寺志《韋協》記載，桑耶寺大殿建造之前先建了觀音殿（a rya pa lo gling），由唐人工匠貫擦普堅（rgya tsha pu can即「唐人子」）造像，其時佛殿上方出現阿彌陀佛，佛堂之上築無量光佛殿。㉗ 後期如明宣德六年（1431）刊刻的《無量壽佛大慈悲心親說六字大明王廣大功德》即指出觀音（大慈悲心）即是無量壽佛，即「無量壽佛大慈悲心」。㉘ 四臂觀音具有的明顯的「佛性」正是來源於對阿彌陀佛功能的取代。㉙ 六字大明母作為主尊替換無量壽佛

㉗ dBa' gsal snang, *dBa' bzhed bzhugs so/*（拉薩：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2012），頁30。文中阿彌陀佛以梵字拼作a mi da ba。

㉘ 《無量壽佛大慈悲心親說六字大明王廣大功德》傳授師剌思馱麻上師，傳授師思八剌。宣德六年二月初六日奉，佛信官劉智慧妙發心刊板流通。原版藏北京智化寺。翁連溪、李洪波主編，《中國佛教版畫全集》，第7卷，頁97-98。

㉙ 不空譯，《大樂金剛不空真實三昧耶經般若波羅蜜多理趣釋》卷二：「得自性清淨法性如來者是觀自在王如來異名，則此佛名無量壽。如來若於淨妙佛國土現成佛身，住雜染五濁世界，則為觀自在菩薩。」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第19冊，No. 1003，頁607-616。

臺大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之後，成為具有佛性的菩薩，真正成為了「四臂觀音」！為保持曼荼羅主從眷屬的配置平衡，將原型的六字大明母作為四臂觀音的脅侍，繼續安置在原來的位置，從而出現主尊與脅侍菩薩形象標識完全一致的罕見情形，即持寶菩薩-四臂觀音-六字大明母的新組合，並為以後形成三怙主造像構成框架。

四臂觀音最初出現在《寶王經》卷四，但早期《寶王經》經變畫很少描繪卷四曼荼羅的內容，因而沒有出現四臂觀音。現今藏傳佛教寺院留存的完全依據《寶王經》文本繪製的經變畫不多，根據十二至十四世紀撰著的藏文史籍，記載衛藏地區寺院吐蕃時期壁畫有《寶王經》，提及的觀音多是十二世紀前後流行的不空羂索或卡薩帕尼觀音五尊。源自敦煌系統的不空羂索五尊沒有四臂觀音，娘・尼瑪維色（Nyang Nyi ma ’od zer mNga’ bdag nyang ral，1124–1192）著《娘氏宗教源流》（*Chos ’byung me tog snying po sbrad tsi’i bcud*）記載桑耶寺聖觀音殿配置云：「在大悲源流聖觀音洲，有卡薩帕尼聖觀音主尊與眷屬五身，在其上方有無量光佛主從五尊，牆側凸出神殿（glo ’bur）中有三怙主（rigs gsum mgon po）、國王身量的降服非人塔，銀鑄大悲觀世音、至尊獅吼觀音、犀甲十萬佛母等。繪畫《寶篋莊嚴寶王經》（*Ri mo za ma tog bkod pa*）和《五十部經變畫》（*lNga bcu pa’i rgyud ris*）的壁畫，以大威使者（dbang chen gyi pho nya）為護法神。這是發無上菩提心的洲。」㉚《第烏教法史》也有把同樣的描述。㉛增廣本《拔協》（約十三世紀後半葉成書）提到吐蕃建的

㉚ thugs rje rgyun ’byung arya pa lo’i gling na/ lha tshogs ni khasarpaṇia gtso ’khor lnga/ steng phyogs na snang ba tha’ yas gtso ’khor lnga bzhugs so/ glo ’bur na rigs gsum mgon po/ phra men gyi mchod rten rgyal po’i sku tshad/ dngul gyi thugs rje chen po/ rje btsun seng ge sgra/ bse’i jo mo stong phrag brgya pa bzhugs so/ ri mo za ma tog bkod pa/ lnga bcu pa’i rgyud ris yod/ chos skyong dbang chen gyi pho nya rnams la gtad do/ mngon par byang chub mchog tu sems bskyed pa’i gling ngo/娘・尼瑪維色（Nyang Nyi ma ’od zer mNga’ bdag nyang ral，1124–1192），《娘氏宗教源流》（*Chos ‘byung med tog snying po sbrang rtsi’i bcud*），藏文本（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頁296-297。此處的三怙主，很可能指四臂觀音三尊，而非後期的文殊-四臂觀音-金剛手系統。

㉛ 第烏賢者著，《第烏教法史》（*mKhas pa lde’us mdzad pa’i rgya bod kyi chos ’byung rgyas pa*）（拉薩：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87），頁352： dad ldan chos byed bar chod srung ba dang/ thugs rje rgyun ’byung arya po lo’i gling gi lha tshogs ni/ dbus su gtso ’khor lnga dang/ rgyal po’i sku tsab thugs rje chen po dang/ rigs gsum mgon po dang/ rje btsun seng ge sgra

臺大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觀音殿，主尊是根據吐蕃男子模樣塑造的二臂卡薩帕尼觀音，右側是根據吐蕃女子塑造的摩利支天，左側也是根據吐蕃女子塑造的度母；並在右側塑造了六字聖觀音，在左側塑造了馬頭金剛守護殿門。㉜ 增廣本使用了六字觀音的名稱「六字聖觀音」（arya pa lo yi ge drug pa）但這不是四臂觀音，而是與六字增壽消災陀羅尼有關的聖觀音。㉝ 1388年成書的《西藏王統記》則沿襲這一說法：提到開建桑耶寺前修建的觀音殿造像有主尊聖觀世音，右側度母，左摩利支天光明母。又右方為六字聖觀音，其左為馬頭金剛等，共造主從五尊。上方塑造無量光佛主從五尊。㉞ 此後修建桑耶寺南側三殿，佛殿兩側對觀音殿和譯經（經藏）殿：「末殿為阿耶波羅洲。有喀薩巴哩主從五尊。上方為無量光佛主從五尊。殿角突出室中有贊普像一尊，以旃檀為主心木，外以白銀作包皮。

---

dang/ ba so'i jo mo sgrol ma dang/ 'phra men gyi mchod rten/ stong phrag brgya pa'i yum chen mo dang bcu gsum bzhugs/ ri mo ni za ma tog bkod pa dang/ mdo sde sa bcu yi rgyud ris bris nas bzhugs so// chos skyong dam chen pho nya rnams la gtad//「具信修法守護者和悲心流水般湧出的聖巴羅洲的眾神，中間為主從五尊，國王身量的大悲觀音像，三怙主，傑尊獅吼觀音，犀甲度母，降服非人塔，〈大般若經〉佛母共十三人。畫有《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和《十地經》的壁畫，以諸誓願神使者為護法神。」

㉜ 巴塞囊著，佟錦華、黃布凡譯，《拔協（增補本）譯注》（*sBa bzhed*），藏漢合璧本（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漢譯頁30-31，藏文原本頁128-129：pho la mtshar ba khu stag tsha ba la dpe byas te/ gtso bo arya pa lo kha sar pa ni bzhengs/ mo la mtshar ba ljog ro g[b]za' bu chung la dpe buas te/ lha mo 'od zer can gyon du byas/ mo la mtshar ba ljog ro gza' lha bu sman la dpe byas te/ sgrol ma gyas su byas/ thag bzang stag leb la dpe byas te/ arya pa lo yi ge drug pa de'i gyas su byas/ sman gyas skor la dpe byas te/ arya pa lo rta mgrin sgo srungs su byas。

㉝ 如黑水城出土北宋法華經刻本扉頁二臂觀音標注「杭州晏家重開六字觀音□ [雕]印」，艾爾米塔什博物館藏《妙法蓮華經》（TK-1-4、9-11、15、19）之〈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五〉（TK-90—96、105、113、138、154-156、167-170、175、177）。

㉞ 薩迦巴索南堅贊（Sa skya pa bsod nams rgya mtshan），《西藏王統記》（*rGyal rabs gsal ba'i me long*），藏文本（北京：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頁207：rten gyi gtso bo la 'phags pa spyan ras gzigs/de'i g-yas su sgrol ma/ g-yon du 'od zer can/ yang g-yas su yi ge drug pa/ g-yon du dpal rta mgrin la sogs/ gtso 'khor lnga bzhengs so// steng du 'od dpag med gtso 'khor lnga bzhengs so/；另見索南堅贊著，劉立千譯，《西藏王統記》，漢譯本（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頁123-124。

臺大圖館期刊資料庫

另有有梵塔一座和《寶王經》壁畫，並有一千零二尊天女護法神像。」㉟

《巴協》等文獻都記載吐蕃時期修建的桑耶寺在佛殿中繪製了《寶王經》的經變畫（rgyud ris），㊱ 實際上敘述的史實當是《巴協》與《第烏教法史》成書時，即十二世紀前後桑耶寺修繕時的情景。其中觀音殿的配置提到的觀音主從五尊，是十二世紀前後流行藏地、與水月觀音及不空羂索觀音相似的卡薩帕尼聖觀音五尊，《成就法鬘》對其形體標識及眷屬有清晰的描繪，十四世紀初夏魯寺甘珠爾殿，尚有不空羂索五尊的圖像（圖4）；㊲ 上方有無量光佛五尊則是遵從了《寶王經》的配置，這些史料提到的三怙主是三尊造像的泛稱，具體尊像不明，或指蓮花手、文殊與金剛手的三尊，也可能是四臂觀音與持寶和六字大明母組合的三尊形式，而不是十四世紀以後形成的文殊-四臂觀音-金剛手三怙主。其次，這些文獻記載繪製《寶王經》壁畫的觀音殿，都安置或

㉟ 索南堅贊著，劉立千譯，《西藏王統記》，漢譯本，頁25；薩迦巴索南堅贊，《西藏王統記》，藏文本，頁210：Arya pa lo gling na/ kharsa pa ṇī gtso ’khor lnga/ steng na snang ba mtha’ yas gtso ’khor lnga/ blo ’bur na tsandan la dngul g-yogs pa’i rgyal po’i sku ’dra gcig/ mchod rten gcig rgyud ris/ za ma tog/ lha mo stong rtsa gnyis chos skyong drang srong dharma rva dza la gtad/

㊱ 有十二世紀前後巴塞囊（sBa/dBa’ gSal snang）著《巴協》（*sBa bzhed*）第四章對建造桑耶寺佛殿繪製壁畫情景的描繪。參看巴塞囊著，佟錦華、黃布凡譯，《拔協（增補本）譯註》（*sBa bzhed*），藏漢合璧本，漢譯頁37，藏文原本，頁140。

㊲ 巴達恰利亞（Benoytosh Bhattacharyya）《成就法鬘》，Benoytosh Bhattacharyya, *The Indian Buddhist Iconography: Mainly Based on the Sādhanamālā and Other Cognate Tantric Texts of Rituals* (Calcutta, 1968), pp. 39-41.「行者需觀己為尊（卡薩帕尼），身放萬丈月輝，飾髻冠，頂置阿彌陀佛像，半跏趺於月輪中的雙蓮座上。身現具足莊嚴，面現微笑，十六歲形，右手與願印，左持蓮莖。聖手施甘露，針眼者（Sūcīmukha）立其下，面高揚、鼓腹、現暗微色。尊住普陀洛迦山，華美慈悲，現媚態（śṛṅgāra），極溫善，具諸吉相。其前為度母，右為善財童子。此度母綠身，右手引花，左手持蓮莖。嚴飾諸物，青春盎然，乳房豐滿。善財童子雙手合掌，輝煌如金，現王子形。執經函於左腋下，嚴飾諸物。主尊西者為顰眉佛母，北者馬頭明王。此顰眉佛母四臂，輝煌如金，結髮髻，左二手持三杖（tridaṇḍī）、淨瓶（Kamaṇḍalu），右二手，一手現弓印，一手持念珠，現三目。馬頭明王紅身，身矮小、鼓腹，發如火焰飄舞，以蛇為聖線，面部特徵為兩撇深棕鬍鬚；二血目憤怒圓睜，雙眉緊鎖。著虎皮，以杖為武器，右手現弓印。需正雅如法觀想諸尊，諸尊皆目朝主尊面。卡薩帕納觀音成就法竟。」（採用中國人民大學藝術學院王傳播博士譯文）

臺大藝術期刊資料庫

繪畫了降服非人塔（'phra men gyi mchod rten），安置具有度亡功能的《大般若經》或在殿內建經牆，供奉先祖，如夏魯寺古相・貢波貝（sKu zhang mgon dpal）興建的三門殿（sgo gsum ma），殿內有為其父阿麥欽波・桑傑益西（A mes chen po Sangs rgyas ye shes）內供之金身釋迦牟尼像，介氏先祖、夏魯寺建寺者介尊・喜繞迥乃（lCe btsun Shes rab byung gnas）也繪於此殿。㊳

二、宋遼、西夏、回鶻有關四臂觀音的文本與圖像

因觀音信仰在《法華經》等經典中已經得到了很好的闡揚，側重密咒修習念誦儀軌的漢藏《寶王經》譯出後都沒有很快流行開來，其中曼荼羅四臂觀音圖像則更有一個較長的民間信仰接受過程。法賢漢譯《寶王經》是在十世紀末（宋太平興國八年〔983〕），現今見到最早的《寶王經》雕版印畫是遼重熙十六至十八年（1047－1049）內蒙古赤峰巴林右旗慶州白塔出土《大乘莊嚴寶王經六字大明陀羅尼》單頁雕板印畫，畫面有阿彌陀佛說法、六字真言和佛塔（圖5a），其「六字大明真言」、「唵麼抳鉢訥銘吽」與法賢譯本《寶篋莊嚴經》用字完全相同，亦與遼代高僧道[厄殳]（1056－1128）於遼大安四年（1088）輯錄的《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㊴ 相同。慶州《寶王經》印畫，其中出現了阿彌陀佛和佛塔，有六字大明咒，舍利塔和六字大明咒同時出現，與度亡解脫的功能有關。宋遼、西夏元時期文物遺例，六字真言多與佛塔同時出現，如福建福清瑞岩山將軍岩獨醒石豎立吳越式樣佛塔，塔瓶花窗陰刻蘭札體梵字六字真言（圖5b），福建泉州開元寺西塔仁壽塔元代鐫刻梵字蘭札體六字真言在塔上，元至大四年（1311）江蘇鎮江韶關過街塔也在一側鐫刻六字真言，但都沒有出現四臂觀音。

㊳ 多羅那他著，佘萬志譯，《後藏志》（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頁91，；多羅那他著，《後藏志》（*Myang chos 'byung*），藏文本（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頁166。志書寫明三門殿稱為sgo gsum ma，佛像為覆有法衣、珠寶的內依怙（nang rten）。

㊴ 德新、張漢君、韓仁信，〈內蒙古巴林右旗慶州白塔發現遼代佛教文物〉，《文物》，1994年12期，頁4-33；《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第46冊，No. 1955。

臺灣博碩士論文資料庫

敦煌絹畫中出現的五代至宋時期的觀音像或與《寶王經》的流行有關，其中表現觀音救六難與輪回解脫時，出現的觀音就有六臂和四臂的觀音。現今見到的最早的「四臂觀音」繪畫就是十世紀前後的敦煌絹畫，如俄羅斯艾爾米塔什博物館藏觀音，四臂，左右上手分別持日月輪，㊵ 身側只存留榜題，日輪側是「南無虛空藏菩薩」，月輪側榜題闕如，當為「南無除蓋障菩薩」，即是《寶王經》向世尊發問的兩位菩薩。㊶ 其餘菩薩榜題漫漶，下方繪施主（圖6）。㊷ 另一幅生四臂的觀音，男相，遊戲坐，菩薩冠，頭頂頂上有紅衣禪定印阿彌陀化佛，右手月輪，左手日輪；主二臂右手作說法印，左手外展執淨瓶。主尊左右兩側繪救六難，右側是羅剎難、諸鬼難和苦惱難；左側是枷鎖難、火難和刀兵難（圖7）。㊸ 這裡的「四臂觀音」持物、坐姿與《寶王經》曼荼羅中的四臂觀音並不相同，是十一至十二世紀四臂觀音圖像流行之前，大悲千手千眼觀音或六臂觀音因應《寶王經》曼荼羅圖像式樣的變化形式。

五代至宋（十世紀前後）的敦煌絹畫的觀音雖然與《寶王經》在敦煌的傳播有關，甚至出現了以前不見的生有四臂的觀音式樣，但六字大明咒並沒有在此段的圖像與文獻中出現。六道與惡趣更多以觀音救六難的形式呈現，與《寶王經》觀音六道六幅輪有直接關聯，也是此後觀音救難與六道輪回圖聯繫的契機。如明弘治六年（1493）遵從早期敦煌圖像傳統的甘肅永登紅城感恩寺力士

㊵ 中國傳統繪畫畫面上方置金烏太陽和玉兔月亮的傳統由來已久，如西漢馬王堆漢墓絹畫、新疆吐魯番出土唐代伏羲女媧絹畫，《寶王經》卷一也提到觀音雙眼生出日月，日月輪觀音在大足北山佛灣第136窟中仍然出現。

㊶ 《寶王經》卷一：「是時，虛空藏菩薩白佛言：『世尊，今此來者是何菩薩？』佛告：『善男子，是觀自在菩薩摩訶薩。』時虛空藏菩薩默然而住。於是觀自在菩薩，繞佛三匝卻坐左邊。」天息災譯，《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第20冊，No. 1050，頁55。

㊷ 魏同賢、孟列夫主編，俄羅斯國立艾爾米塔什博物館、上海古籍出版社編纂，《俄藏敦煌藝術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圖99，高116公分，寬57公分，dx 57麻布彩繪。

㊸ Ch.lviii.003。羅德瑞克・韋陀（Roderick Whitfield），林保堯編譯，《西域美術（二）：大英博物館斯坦因蒐集品（敦煌繪畫2）》（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19），圖版21，下方有供養人榜題：「故母大娘子一心供養」、「周兵馬使張佛奴一心供養」。

臺大藝術期刊資料庫

殿壁畫，繪製觀音應化救六難，相鄰則繪製六道輪回圖。㊹《寶王經》的八難與六難等，有俗人現實生活的輪回之苦，更多以具象場景隱喻戒定慧解脫修習中不同的階段，如同禪宗《牧牛圖》象徵對心性的馴服。因此，宋元之際，繼承《寶王經》曼荼羅修習精髓的是將祈福救度、往生淨土功效的《寶王經》納入後期的禪修體系，其中真言陀羅尼在修習儀軌中得到了發展，觀音與真言陀羅尼的聯繫逐漸明晰，六字真言與四臂觀音形成固定對應關係，這在十三世紀漢藏佛教文本與圖像中都有表現，如西夏皇建元年（1211）釋宗密、釋本明集勘的《親集耳傳觀音供養讚歎》題記所說，是兩位沙門聽講或參與各路觀音法事儀軌所做的筆記，此後又據修習儀軌加以勘定，故名「親集耳傳」，其中提到的禱祝的觀音就是四臂觀音。㊺

後弘以降，衛藏等地佛教進入建宗立派的發展時期，逐漸成為強調理論化、體系化的藏傳佛教，原本《寶王經》等西方淨土基層信仰氛圍逐漸弱化，但絲路東段及河西走廊，《寶王經》或西方淨土信仰卻非常流行，六字真言及與之相關的不同形態的觀音，最初在回鶻、西夏控制地區集中出現。圖像表現上，絲路東段的早期《寶王經》經變沒有描繪卷四出現的四臂觀音曼荼羅，也沒有像遼代重熙年版畫那樣特意標注六字真言陀羅尼，圖像與這段時間流行的淨土及華嚴信仰相互融合，例如新疆吐魯番柏孜克里特石窟十二世紀末至十三世紀初的第17窟《寶王經》壁畫，沒有出現四臂觀音和六字大明咒。㊻ 同一石窟群的第29窟，回鶻式樣長形窯洞式石窟，窟頂為券頂，窟內主壁是交腳彌

㊹ 魏文，〈甘肅永登紅城感恩寺考察報告〉，收入謝繼勝主編，《漢藏佛教美術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頁353-410。

㊺ 收錄於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德堡分所等編，《俄藏黑水城文獻》，第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頁496，。皇慶二年（1211）寫親集耳傳觀音供養讚歎畢。其中記有「足下頓想六輻輪，輪臍自身成觀音，六輻亦想六觀音，各各面向於自身，頂戴寶冠月輪上，想金色身無量光，十方諸佛菩薩眾，周徊圍繞中尊坐，身□又想金剛帳，馬項聖者面外向，□□赤色光熾火盛，一面二臂摧四魔」「……有情蒙光除罪障，光回復入『口紇哩二合』字；其字變成觀世音，一面四臂具悲心；頂嚴無量光如來，眾寶瓔珞莊嚴身；其[身]潔白妙難思，下右手持水晶珠；左執白色妙花蓮，上手近心蓮花合；身著裱悉捺二合裡皮，不舍六趣度癡迷。」

㊻ 陳愛峰，〈柏孜克里克石窟第17窟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變考釋〉，《敦煌研究》，2016年6期，頁82-92。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勒，左右壁兩側對應脅侍菩薩，並繪佛像和四臂觀音與之相對（圖8）。[47] 佛像作回鶻、西夏時期流行的佛與上師通行的手印，象徵說法淨土與禪定修習：即右手說法印而左手禪定印，頭頂另有阿彌陀佛說法印化佛，兩側有吐魯番地區繪畫常見、源自漢唐的日月輪；佛像兩側十位眷屬菩薩（或供養人）皆有頭光，主尊下方有蓮池化生童子（圖9），因此可以確定主尊佛為阿彌陀佛。這一配置與此段時期流行的禪定印阿彌陀佛與大勢至及觀音組成西方三聖的形貌不同，可以看做是一種特殊樣式的阿彌陀佛，原本是禪定印的阿彌陀佛改換為說法-禪定的手印，這一手印似乎與說六字大明咒及《寶王經》相關。與柏孜克里特第29窟佛像手印、龕型、蓮座式樣幾乎相同的是黑水城出土阿彌陀三尊（圖10）唐卡，[48] 主尊佛右手說法，左手禪定；兩側脅侍菩薩，右側白色身，左側紅色身，皆二臂，形象一致；二脅侍如果是觀音和大勢至，身色相同且都有標誌，如頭頂化佛和佛塔，雖然兩位都是二臂，但白色身和紅色身，可能與白色六字大明和紅色持寶菩薩的身色有關聯，兩位脅侍具有西方三聖與《寶王經》四臂觀音脅侍的糅合成分。唐卡下方有蘭札體六字真言梵字，此處的阿彌陀佛應為《寶王經》中的無量壽佛，由黑水城唐卡推定柏孜克里特第29窟的阿彌陀佛正是《寶王經》曼荼羅中的無量壽佛，恰好對應此窟的四臂觀音。

四臂觀音漫漶嚴重，上二臂左右手以拇指掐無名指作拈花或持數珠狀，但持物不可辨；主二臂雙手合十，頭頂有三葉冠痕跡，化佛漫漶，逸出的光束。畫法與宋夏時期彌勒經變光束畫法相同。主尊右側可見十一面觀音，是《寶王經》描述的大悲觀音，與之相對的左側菩薩持蛇形傘幢，當為獅吼觀音，這種菩薩相獅吼觀音極為罕見。下方兩側主尊右側繪童子，左側繪馬頭金剛。因該窟主壁為上生交腳彌勒，此處繪製觀音眷屬善財與馬頭金剛，正是回應該窟的主尊，反映善財拜謁彌勒的場景，也是全窟將西方淨土與華嚴結合的例證，四臂觀音代表西方淨土的觀音，同時也是華嚴淨土的觀音（多以水月觀音表示）。柏孜克里特第29窟常做主尊的十一面大悲觀音，此處卻作為四臂觀音的

[47] 圖版參看金維諾總主編，謝繼勝主編，《西域美術全集12・高昌石窟壁畫卷》（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16），圖版221-222，四臂觀音在主室左壁，阿彌陀佛在主室右壁。

[48] 艾爾米塔什博物館編號X2340。尺寸42 x 27公分。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眷屬，可見是《寶王經》四臂觀音主尊曼荼羅的配置，但沒有看到壁畫榜題等書寫六字大明咒，右側脅侍菩薩現今是深色，有可能是黃褐色褪色所致，最具辨識特徵的是她左手上托舉一凸起物，如同持寶菩薩的摩尼寶，白色衣服或與此時的白衣觀音信仰糅合（圖11）；㊾ 與之相對的合十印白色菩薩與六字大明深色相同，但是二臂。柏孜克里特29窟類型的四臂觀音或是絲路東段較早的四臂觀音形式，年代在十二世紀末至十三世紀。黑水城《寶王經》三尊唐卡與柏孜克里特29窟壁畫存在圖像及其風格的繼承淵源，除了阿彌陀佛和須彌座的細節相同外，四臂觀音的仰覆蓮座也是十三世紀的藏傳風格（圖12），新疆地區遺例較少。此外，麥積山元代第38窟四臂觀音雙龕（圖13a-b），阿彌陀佛西方淨土變與四臂觀音並列，是早期河西走廊圖像樣式的延續。㊿

幾乎祛除一切災難而得到長壽福祉，往生淨土的六字大明陀羅尼「長夜安隱遠離眾苦」，「是人恒得長壽無病眾惡不侵。」(51) 巨大的法力和方便靈巧的修習方式使得西夏前期開始流行六字大明咒，其地所見較早的觀音圖像大都來自宋代江南，如黑水城出土漢文雕版《妙法蓮華經》之《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五》殘卷經首繪製須彌座二臂柳枝觀音，右臂外展，持柳枝；左臂禪定印

㊾ 莫高窟308窟西壁西夏時期的白衣觀音，圖版參看金維諾等主編，《中國美術全集・石窟寺壁畫3》（合肥：黃山書社，2010），頁595。

㊿ 麥積山出現元代藏傳佛教造像，或與沙囉巴譯師有關，譯師乃秦州人士。元人念常《佛祖歷代通載》（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第49冊，No. 2036，頁729）卷二十二記載沙囉巴事蹟最詳：甲寅（1314）「弘教佛智三藏法師入寂。公積甯氏，諱沙囉巴觀照。事上師著栗赫學佛氏法。善吐番（蕃）文字，頗得秘密之要。世祖皇帝嘗受教於帝師發（八）思巴，詔師譯語，辭致明辨，允愜聖衷，詔賜大辯廣智法師。河西之人，尊其道而不敢名，止稱其氏，至呼其子弟皆曰：『此積甯法師家』，其為見重如此。公昆弟四人，公其季也，總丱之歲，依帝師發思巴剃染為僧，學諸部灌頂之法。時有上士名剌溫卜，以焰曼德迦密乘之要，見稱於世。帝師命公往學此法，溫卜以公器偉識高，非流輩比，悉以秘要授之。」（元）程鉅夫，《雪樓集》，卷二十九：《送司徒錫喇卜法師歸秦州》「秦州法師沙羅巴，前身恐是鳩摩羅。」收入《元代別集叢刊—程鉅夫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

(51) 施護譯，《聖六字增壽大明陀羅尼經》，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第20冊，No. 1049，頁46-47。

臺灣藝術期刊資料庫

托淨瓶，版心有「杭州晏家重開六字觀音□ [雕]印」（圖14），[52] 因為杭州晏家刻本《妙法蓮華經》為北宋熙寧元年（1068）至二年（1069）刻本，為梵夾裝，黑水城出土杭州晏家雕版《妙法蓮花經》為經摺裝，其年代也當在十一世紀初，證明此時「六字觀音」還不是四臂觀音而是柳枝觀音。黑水城出土漢文《聖六字增壽大明陀羅尼經》卷首題「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傳法大師臣施護奉詔譯」[53] 經尾有西夏人發願文「右願印施此經六百餘卷，資薦亡靈父母及法界有情同往淨方，時大夏天慶七年（1200）七月十五日，哀子仇彥忠等謹施。」[54] 這些陀羅尼經典很多是《莊嚴寶王經》的演繹或片段，如西夏乾祐十六年（1185）釋智通印施的《六字大明王功德略》題記，[55] 功德略中的「六字大明王」是《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的大明王，不是指四臂觀音，更多的是指大悲觀音。

如前文所述，雖然《寶王經》記載了持寶菩薩-無量壽佛-六字大明母的曼荼羅配置式樣，但現今存世的《寶王經》與四臂觀音圖像，很少見到如此配置的作品遺例。非常幸運，筆者在考察杭州飛來峰石刻時，居然找到了《寶王經》曼荼羅的圖像配置。飛來峰64龕與65龕（圖15）正是無量壽佛三尊中現存的兩組，其中63龕為方龕，佛像螺髻大耳璫，忍冬紋邊飾佛衣，禪定印跏趺坐，遼代風格的仰蓮連珠紋座，尊像為五方佛密教系統的阿彌陀佛形貌，佛龕正中上方淺刻蓮花瓣中蘭札體梵字Hrīh「紇利」，正是阿彌陀佛的種子字，十三世紀中葉以後，此種子字常與六字真言同時出現為Oṃ Maṇi Padme Hūṃ

---

[52] 艾爾米塔什博物館藏《妙法蓮華經》（TK-1-4、9-11、15、19）之〈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五〉（又標明《觀世音經》）（TK-90-96、105、113、138、154-156、167-170、175、177）。翁連溪、李洪波主編，《中國佛教版畫全集》，第2卷，頁261-262。

[53] 俄藏編號TK135，見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德堡分所等編，《俄藏黑水城文獻》，第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頁171-173。施護漢文譯本收入施護譯，《聖六字增壽大明陀羅尼經》，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第20冊，No. 1049，頁46-47。

[54] 西夏天慶七年（1200）仇彥忠施經係補刻，原版刻印時間肯定早於1200年。孫伯君，〈黑水城出土「聖六字增壽大明陀羅尼經」譯釋〉，《西夏學》，第4輯（2009），頁46-51。

[55] 乾祐乙巳十六年季秋八月十五日，比丘智通施。俄羅斯黑水城文獻編號TK-136，收入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德堡分所等編，《俄藏黑水城文獻》，第3冊，頁175。

臺灣藝術期刊資料庫

Hrīh，或僅以Hrīh代表六字真言。龕額磨刻蘭札體梵字一行，為阿彌陀佛真言 || hr(īḥ) hrīḥ||oṃ a[m]i(deva) hrīḥ svāhā hrīḥ hrīḥ ||；[56] 第65龕位於主龕西南側，龕型與大小與64龕相仿，位於阿彌陀佛龕主尊左側，恰好是《寶王經》六字大明母的位置；東南側持寶菩薩龕現已不存，坡下有塌落岩面。考慮到飛來峰33龕有我國現存最早的梵漢對照六字真言，另有梵字六字真言一框，除了此龕，飛來峰其他兩處四臂觀音像附近並無阿彌陀佛蘭札體種子字。在阿彌陀佛的上方安置阿彌陀佛真言與種子字，主尊左右兩側配置六字大明母與持寶菩薩脅侍眷屬，說明後期造像者楊璉真迦等人完全按照早期經典、即《寶王經》曼荼羅的式樣佈置造像，是十三世紀後半葉對早期經典的追隨。莫高窟464窟主室在五方佛阿彌陀佛下方，則直接書寫蘭札體梵字六字真言一框，正是《寶王經》的表現（圖16）。[57]

西夏元時期四臂觀音圖像出現以後，更多的是將其等同於原本的八臂或六臂的大悲觀音，甚至水月觀音，例如杭州飛來峰第92龕為一大鋪水月觀音，第93龕則為漢式四臂觀音。[58] 入明以後河西地區更將四臂觀音看做是與送子觀音同樣的觀音，如炳靈寺洞溝第5窟送子觀音與四臂觀音圖（圖17）。[59] 這段時間的四臂觀音沒有完全依照《寶王經》作為六字真言的特有觀音形式，往往與金剛薩埵形成較為固定的對應組像，這是漢地淨土西方三聖圖像的密教變異形態。在西夏淨土往生主題石窟中，窟內主神由水月觀音、阿彌陀佛、大勢至形成的西方三聖組合，隨著石窟圖像的密教化趨勢替換為四臂觀音對應金剛薩埵，前期例證如賀蘭山山嘴溝第3窟，壁畫說法印佛像（阿彌陀佛？），主尊前排右側有唐宋風格的佛頂尊勝和四臂觀音（圖18a-b）；左側壁面脫落，

[56] 謝繼勝、熊文彬、廖暘、賴天兵、林瑞賓，葉少勇等，《江南藏傳佛教藝術——杭州飛來峰石刻造像》（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4），頁67。龕上方在月輪中淺浮雕主尊種字紇哩hrīḥ圖案，漢文又音譯作紇利、紇利俱、頡利等，是金剛界曼荼羅中阿彌陀佛的一字咒，也是觀音菩薩的種字。

[57] 王慧慧，〈莫高窟第464窟《大乘莊嚴寶王經變》考釋——莫高窟第464窟研究之三〉，《西夏學》，2021年1期，頁317-331。

[58] 謝繼勝主編，《藏族美術集成・雕塑藝術・江南卷》（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19），頁168-176，圖版及局部圖。

[59] 圖版為2007年筆者考察所攝。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但根據西夏時期圖像配置，對面是八臂觀音和金剛薩埵，武威亥母洞出土文殊菩薩唐卡下方，佛頂尊勝對八臂觀音，金剛薩埵對四臂觀音，可為一證（圖19）。[60] 金剛薩埵為大勢至菩薩的密教身形，與四臂觀音成組配合淨土主尊阿彌陀佛形成西方三聖。[61] 即使入元以後的居庸關，四天王中西方廣目天王（西南）胸甲上是西夏時期的水月觀音，與南方增長天王（東南）鎧甲上的金剛薩埵對應為一組，是前期四臂觀音與金剛薩埵組合的變體。[62]

瓜州東千佛洞第5窟造像配置糅合了西夏前後期不同的佛教思想，也是理解西夏時期四臂觀音造像的最合理情境。窟門兩側安置曼荼羅與護法，窟室南北壁由東而西分別繪製文殊與普賢變、八臂立相觀音對綠度母、毗盧十方佛對八塔變、金剛薩埵對四臂觀音（圖20）、四臂文殊對水月觀音，後室以五方佛壇城對涅槃變，窟頂則有與敦煌100窟相似的四大天王配置十六羅漢以環繞窟頂曼荼羅。[63] 其間漢地佛教與藏傳佛教，唐密、遼密與藏密，來自龜茲型石窟的小乘意蘊與中亞早期大乘佛教聖跡形成貌似混搭的全新樣式。[64] 與此窟八

---

[60] 文殊菩薩唐卡現藏甘肅武威博物館，參看謝繼勝，〈一件極為珍貴的西夏唐卡——武威市博物館亥母洞寺出土唐卡分析〉，收入宿白先生八秩華誕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宿白先生八秩華誕紀念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下冊，頁597-613。

[61] 晚唐至宋密教中，金剛手菩薩與金剛薩埵有時候混為一體，有時略有區別，金剛手菩薩更多等同大勢至菩薩，金剛薩埵等同普賢，但此時又與金剛持相混淆，因而寧瑪派金剛持等同於普賢王。從圖像來看，作為護法或明王的金剛手與金剛薩埵差別較大，圖像的混用在西夏元時期常見，金剛薩埵常常被用作金剛手作為大勢至菩薩的密教身相。《佛說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三昧大教王經》卷第九「降三世曼拏羅廣大儀軌分第六之一」直接稱呼金剛薩埵為金剛手：「爾時，世尊一切如來又復雲集，以一百八名稱讚金剛手菩薩摩訶薩大轉輪王。頌曰：『金剛薩埵大金剛，妙金剛尊善哉者！』」施護譯，《佛說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三昧大教王經》，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第18冊，No. 882，頁369。

[62] 謝繼勝，〈居庸關過街塔造像義蘊考—11至14 世紀中國佛教藝術圖像配置的重構〉，《故宮博物院院刊》，2014年5期，頁49-80。

[63] 此窟值得重視的是出現了十六羅漢，其佈局也極為特殊，在該窟「前室」穹窿頂安置為曼荼羅，將十六羅漢作為環繞曼荼羅主尊的眷屬，四角安置四大天王，此種佈局方式在十二世紀至十三世紀的西夏元繪畫中不多的例證，說明西夏石窟繼承著五代至北宋前期石窟的圖像傳承，肅南文殊山石窟第2窟窟室四角佈置有立像四大天王，應當是這種樣式適應龜茲型小型石窟樣式做出的改變。

[64] 王惠民，〈安西東千佛洞內容總錄〉，《敦煌研究》，1994年1期，頁126-129。

臺大藝術學院圖書館資料庫

塔變圖像保留印度波羅樣式的情景相似，第5窟四臂觀音造像沿襲十二至十三世紀三尊式樣，即持寶菩薩，四臂觀音與六字大明母而非無量光佛主尊、脅侍持寶菩薩和六字大明王的早期三尊。主尊身色白，主二臂作合十印，次兩手外展，右手持數珠、左手執蓮花，跏趺坐於敦煌樣式的仰覆蓮座，蓮座前方有蓮花池；背龕石綠色，有帷幕背光邊框；上方為象徵岩石或岩窟的幾何圖案，其間安置五方佛，表明四臂觀音處於《寶王經》曼荼羅之中。主尊右側為持寶菩薩，身色現為白色，四臂，蓮座，持物與主尊相同；左側的大明佛母兩臂前展，右手持蓮花，左手持數珠。三尊蓮座有主蓮莖分支二蔓蓮座組成，兩位脅侍菩薩皆「英雄座」（Vīrāsana）而非東印度石刻中常見的並排三尊佈置。[65] 北壁下方有西夏文供養人題記，標明了此窟的大致建窟年代。

典型例證還見於莫高窟149窟，[66] 該窟主壁西壁「說法圖」佛紅色身相、做禪定印，已經具有了金剛界五方佛的圖像特徵，從身相、手印、坐姿及佛蓮花須彌座下畫有阿彌陀佛的標識孔雀判定，此尊為阿彌陀佛無疑，與遵從敦煌系統、作說法印或與願印的阿彌陀佛構成顯密系統的圖像差異；兩側各有二弟子和守護淨土的四大天王，前方左右各三身共六身供養菩薩（圖21），這在佛說法類的眷屬菩薩中是極為罕見的，筆者判定此六身菩薩當為《寶王經》所載以禪定修習獲取觀音心要的六波羅蜜菩薩；南北壁文殊與普賢菩薩，與阿彌陀佛形成特殊組合「華嚴三聖」，其間糅合的華嚴信仰是西夏多元佛教的表現；東壁窟門兩側分別繪四臂觀音和金剛薩埵（圖22），與主壁阿彌陀佛形成西方三聖與華嚴三聖的複合體。[67] 因而，與莫高窟第464窟結合來看，第149窟也可以看做《寶王經》在西夏蒙元時代的變化樣式。[68]

---

[65] Benoytosh Bhattacharyya, *The Indian Buddhist Iconography: Mainly Based on the Sādhanamālā and Other Cognate Tantric Texts of Rituals*, p. 173, fig. 95.

[66] 該窟圖像參看敦煌研究院編，《敦煌石窟藝術：莫高窟第四六四、三、九五、一四九窟（元）》（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1997），頁181-206。

[67] 大足佛灣136窟釋迦同樣與文殊普賢形成華嚴三聖，但又以阿彌陀佛與大勢至及觀音構成西方三聖。

[68] 464、465、149窟等大都是莫高窟西夏蒙元時代遵從西夏圖像傳統建造的石窟，149窟阿彌陀佛有蒲甘的影響，佛頭光上方的裝飾花卉與464、465、山嘴溝都完全一致。

臺大藝術期刊資料庫

黑水城遺址出土四臂觀音唐卡是典型的波羅藝術樣式，高髮髻，焰肩，手心腳掌心施紅色，犢鼻短裙，纏絲褲，胸前有透明絲帛，這是西域敦煌早期式樣的留存，繪畫顏色準確，但技法古拙，應當是西夏藝術家繪製，唐卡年代在十二至十三世紀（圖23a），說明四臂觀音作為繪畫進入西夏的時間或比衛藏地區略早或同時，因為西夏巴哩譯師翻譯了《寶王經》之後最早的四臂觀音成就法。[69]

十三世紀末至十四世紀初，西藏西部及拉達克區域阿彌陀佛與四臂觀音的演變吸收了此期絲路東段中原淨土的影響，如萬喇三層吉祥殿（wan bla bkra shis gsum brtsegs lha khang）寺門右側繪製四臂觀音與阿彌陀佛西方三聖，圖像式樣中《寶王經》四卷曼荼羅已經拆分，阿彌陀佛為五方佛之紅色身相禪定印，兩側脅侍分別為觀音菩薩和金剛薩埵，可見絲路流行的觀音-阿彌陀佛-大勢至菩薩已經因應當地密教化趨勢替換為金剛薩埵，四臂觀音三尊仍保留持寶與六字大明的波羅式樣，與阿彌陀佛西方三聖並置（圖23b-c），此種圖像組合使得藏西喜馬拉雅地區成為漢地淨土信仰波及的主要區域。[70]

浙江杭州飛來峰龍泓洞多為觀音造像，在第34龕側壁刻蘭札體梵字六字真言一屏，但並不直接對應龍泓洞的四臂觀音三尊，只是作為觀音的咒語出現。可見蒙元時期四臂觀音與六字真言仍無恒定的對應關係。中國內地現存有紀年的最早的四臂觀音組像，見於飛來峰第40龕，造像題記記載「至元二十四年（1287）歲次丁亥三月/功德主江淮諸路釋教都總統所經歷郭」，採用的粉本是西夏故舊帶入江南的東印度四臂觀音三尊圖樣。[71] 蒙元之際，新的時代需要一種新的思想，此時的造像者從西夏等地吸收了原本在絲路河西流行的六字真言、大悲觀音與四臂觀音信仰，定都大都後，原由江南等地攜入的四臂觀音與六字真言開始在大都傳播，軍民僧俗信眾在交通關隘要地等地鐫刻六字真言，並供奉四臂觀音。北京八達嶺彈琴峽金魚池舊址出土了元代四臂觀音（圖

---

[69] 四臂觀音艾爾米塔什博物館編號X2352，關於巴哩譯師本文第三部分的討論。

[70] 王傳播主編，《藏族美術集成・拉達克等地卷》（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22），頁206至208圖版。

[71] 謝繼勝、熊文彬、廖暘、賴天兵、R. Linrothe（林瑞賓）、葉少勇等，《江南藏傳佛教藝術——杭州飛來峰石刻造像》，頁208-209、218，其中40龕現僅存中央主尊四臂觀音，兩側脅侍六字大明即持寶菩薩皆已損毀。

臺大藝術期刊資料庫

24），彈琴峽五桂頭則有藏文、蒙文、蘭札體梵文六字真言摩崖石刻，年代大多在元泰定三年（1326）前後。⑫

三、夏魯寺四臂觀音與《寶王經》的修習儀軌化及輪回圖的出現

元代西藏地方的僧人在與元上層的交往中體察到蒙元統治者對四臂觀音及六字真言的尊崇，在十四世紀夏魯寺的修葺重建中以極大的熱情突出了以四臂觀音為信仰中心的圖像體系，⑬將《寶王經》、《法華經觀音普門品》具有的解脫往生功能與宗教理論修習的次第程式結合在一起，即將民眾的信仰與僧侶的解脫儀軌修習聯繫在一起，使得《寶王經》四臂觀音完整進入藏傳佛教圖像系統，這一圖像演化進程在夏魯寺包括四臂觀音在內的觀音圖像中得到清晰的展示。

夏魯寺幾經修葺擴建，原本的圖像系統有很大變化，現存覺康殿（釋迦殿）與馬頭明王殿或屬初建時三世佛佛殿中的二間殿，南北兩側三門殿與甘珠爾殿雖初建時間略有先後間隔，但其配置反映了十四世紀前後漢地三大士觀音殿與輪藏殿的結構因素，但兩佛殿供奉不同功能的觀音。⑭甘珠爾殿繪製了藏文文獻記載但繪畫中較少表現的不空羂索五尊與如意輪觀音等，這是在敦煌多與藥師一併使用的度亡救度觀音。夏魯寺通過回廊將功能明確的「敦煌」觀音

⑫ 謝繼勝，〈平措林寺六體六字真言碑與蒙元真言碑源流〉，頁663-710。

⑬ 四臂觀音在藏地興起是十三至十四世紀，後弘初期的藏地寺院初建時期大都沒有專門的四臂觀音繪塑與殿堂，而是將觀音五尊與表現吐蕃贊普世襲的法王殿聯繫在一起。專名的度母殿大都後代形成，如初建於十一世紀的拉薩曲水縣卓瑪拉康的得名，但並與四臂觀音主供佛。即使是薩迦派十四世紀重修的薩迦寺，也沒有刻意表現四臂觀音，其度母殿同樣是供奉薩迦諸法王的殿堂。只是到了夏魯寺，四臂觀音成為刻意表現的主體。

⑭ 關於十一至十四世紀西藏寺院殿堂配置，可以參看謝繼勝，〈扎塘寺主殿造像配置及其意蘊——兼論11-13世紀西藏佛教與佛教藝術的構成〉，《中國藏學》，2018年3期，頁72-91；此外，三門殿與甘珠爾殿主壁都繪有五方如來，兩側對應正好是十方佛，與現今覺康殿或馬頭殿（原本是十一世紀流行的三世佛殿結構）構成寺院十方三世系統。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與噶夾牆四臂觀音形成勾連，將民間基層信仰的觀音與儀軌化的四臂觀音安置在同一個場景。

夏魯寺原本包括噶夾牆殿在內的三門殿造像安排正是寺院在重建修葺時構建四臂觀音圖像系統的佈局（圖25a-b）。其中三門殿建於古相・貢波貝（sKu zhang mGon po dpal，1290－1303）或古相紮巴堅贊（sKu zhang Grags pa rgyal mtshan，1306－1333）時期，圖像配置與噶夾牆四臂觀音組像原本屬於一組圖像系統，並通過迴廊將集會殿西北噶夾墻壁畫四臂觀音三尊，與三門殿東北迴廊四臂觀音瑜伽次第修習圖形成勾連，共同構成圍合三門殿的四臂觀音圖像系統。⑮

三門殿的東側外牆是寺院一層轉經道出口的內壁，壁畫釋迦牟尼靈鷲山說法，前述四臂觀音戒定慧瑜伽修習次第圖與千佛亦繪於此，外牆壁畫內容呼應三門殿內法華三塔⑯ 與先祖上師的造像配置，繪畫釋迦摩尼靈鷲山說法與千佛則彰顯十四世紀前後四臂觀音與佛陀相同的地位，也是《法華經》及《普門品》在十四世紀藏傳佛教中的變化形態。殿門上方有建造佛殿時繪製的四臂觀音三尊組像，隱喻此殿與四臂觀音的關聯。三門則象徵修習戒定慧三學達到三解脫，入得涅槃。承接吐蕃時期的桑耶寺頂層「頂三門為解脫門。六梯即六般羅密」的做法，⑰ 夏魯寺三門殿也被稱作「三門解脫殿」，修習與觀音聯繫，正是《寶王經》屬於四臂觀音修習戒定慧，證得三解脫的特別教法。三門殿與甘珠爾殿以二殿各自供奉的五方佛構成十方佛形成雙殿特殊的關係，甘珠爾殿繪有不空羂索觀音、綠度母等重在解除病厄災難的觀音，與三門殿以觀音修習戒定慧有不同的功用。

---

⑮ 王傳播，〈夏魯寺嘎加羌殿的營建歷史、圖像配置與空間意蘊〉，《故宮博物院院刊》，2022年7期，頁82-91。「（噶夾墻）四臂觀音組像是十四世紀夏魯寺建築發展期的轉經道禮拜程序的核心設計」。

⑯ 關於漢藏地區十一至十四世紀出現的三塔形製及與《法華經》的關聯，參看謝繼勝，〈居庸關過街塔造像義蘊考—11至14 世紀中國佛教藝術圖像配置的重構〉，頁48-80。

⑰ 薩迦巴索南堅贊，《西藏王統記》，藏文本，頁209：dbu rtse’I sgo gsum rnam par thar pa’i sgo// gru skas drug ni pha rol phyin pa drug/ 這與漢藏佛寺象徵空、無相與無緣的三解脫門（vimokṣamukha）的功用是一致的，解脫的方法就是修習戒定慧三學。

臺大理仰期刊資料庫

事實上，以瑜伽禪定修習儘快獲得解脫的神力早在施護《佛說一切如來金剛三業最上秘密大教王經》（略稱《七卷教王經》）中有所闡釋，經文安置曼荼羅與供奉明王的做法已接近無上瑜伽密，雖然該經並沒有提到四臂觀音，但明宣德六年此經刻本扉頁刊刻一尊須彌座華麗大龕供奉五娛供品的漢風四臂觀音像（圖26），可見四臂觀音與瑜伽修習的關係。[78]

觀音與瑜伽修習的直接聯繫來自《寶王經》，其中釋迦告知除蓋障菩薩，若要獲得大悲觀音非凡功德的六字大明陀羅尼，必須觀行瑜伽，並在卷四設置了觀修的曼荼羅和六字大明咒具象的四臂觀音。[79] 夏魯寺三門殿東側外牆大悲觀音戒定慧瑜伽修習圖是十四世紀四臂觀音修習儀軌最為完美的圖像解讀，也是藏傳佛教將原本往生祛厄、獲得解脫的民間觀音淨土信仰與僧侶強調戒定慧修習次第的佛教基本理論體系結合的圖像表現。四臂觀音修習次第圖（圖27）榜題「修習大悲自在觀音之瑜伽士傳授慈悲心要禪定灌頂如沐雨露・六趣濕續生處」（thugs rje chen po spyan ras gzigs dbang phyug bsgrub pa'i rnal 'byor pas byams pa dang snyod pa snying rje'i snying po can gyi ting nge 'dzin la byin brlabs cher sbrin dang 'dra bas 'gro drug gi rgyud rlan cing chen pa byung bar 'o），此圖是藏區首見的借鑒輪回圖與曼荼羅形式繪畫《寶王經》的嘗試，也是十四世紀上半葉衛藏地區《寶王經》的經變畫式樣。壁畫將獲取觀音功德證得解脫的進程

---

[78] 施護譯，《佛說一切如來金剛三業最上祕密大教王經》，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第18冊，No. 885，頁469。藏文本名*De bshin gshegs pa thams cad kyi sku gsung thugs kyi gsang chen gsang ba 'dus pa zhes bya ba brtag pa'i rgyal po chen po/*，收入《甘珠爾》，多頗章版，續部第100卷，rgyud, kha 1b1-84b7（vol. 100），《甘珠爾》，納塘版，續部第100卷，rgyud, kha 1b1-84b7（vol. 100）。明宣德六年刻本扉畫見翁連溪、李洪波主編，《中國佛教版畫全集》，第7卷，頁100。

[79] 《寶王經》卷四：「時無量壽如來，知我見在及以未來而告我言：『善男子，汝須此六字大明王觀行瑜伽耶？』我時白言：『我須是法，世尊！』」天息災譯，《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第20冊，No. 1050，頁60。

臺大圖書館資料庫

強化為如法可依的次第禪修程式，[80] 畫面安置大圓輪，中心是類似金剛橛的上橫三角形，遵奉《寶王經》圖樣，其上為紅色禪定印無量光阿彌陀佛而非恰好此期開始出現的托長壽瓶的無量壽；下方安置四臂觀音三尊，主尊白色身，一面四臂，主二手當胸作合十一切王印，右手數珠，左手蓮花，兩側脅侍菩薩，左側是與主尊身色形貌相同的六字大明母，右側為黃色的持寶菩薩。外側內圓由上而下分18格，繪畫瑜伽士修習戒定慧三學次第。三角形下方有須彌山，黑底金字書寫六字真言。夏魯寺此處壁畫是西藏藝術中將四臂觀音與六字真言放置在一處的早期圖像例證，故此鋪壁畫下方榜題第一句寫明「此畫來自《莊嚴寶王經心要》」（*Za ma tog bskod pa'i mdo* las 'byung ba'i snying po 'o）。[81] 雖然壁畫周邊遍書六字真言，但即使如此，這裡的四臂觀音仍然遵從《寶王經》的說法，並沒有稱此四臂觀音為「六字觀音」，而是稱為與十一面大悲觀音名稱相同的「大悲自在觀音」（thugs rje chen po spyan ras gzigs dbang phyug），修持念誦所持名號是「聖觀音」（'phags pa spyan ras gzigs kyi mtshan 'dzin）。

---

[80] 夏魯寺四臂觀音修習圖遍佈題記，以具象的物品比喻修習三學的不同階段，如其中提到「聖觀音禪定增上戒學如同身體美飾」（'phags pa spyan ras gzigs kyi rnal 'byor pas lhag pa'i tshul khrims kyi bslab pa'i rgyan lus la brgyan par bya ste rgyan mdzes pa lus la btags pa lta bur bya'o）;「彼增上戒學容納一切功德，如同以善德充滿無垢清香，如此，以八譬喻修習增上戒學。」（lhag pa'i tshul khrims kyi bslabs pa ni yon tan thams cad kyi snod du bzang bas snod dri ma med pa lta bur bya'o/de ltar dpe brgyad kyis lhag pa'i tshul khrims kyi bslab pa nyams su blang bar bya'o ）;「從身受貪欲充滿的煩惱與痛苦的風雨中救度，如同寶幢增上戒學之學處。」（'dod pa'I tshad pas gdungs pa dang gnod pa'I rdzi char gyis nyen pa las skyob pa'I gdungs lta bur lhag pa'I tshul khrims la bslab par bya'o ）;「大悲禪定如根系發達，主幹完好、枝杈無斷裂、葉片無掉落的樹木掛果時節生成的增上戒學之學處」（thugs rje chen po'i rnal 'byor pas shing ljon pa'i rtsa ba ma nyams pa sdong po ma snad pa yal ga ma chag pa lo ma ma snad pa las 'bras bu dus su 'byung b altar tshul khrims la bslab par bya'o）;「如需連接諸兩種柔軟之物，如同用水與奶兩者處理生皮，如智慧雙運。」（mnyen po thams cad zung du 'brel ba dgos te chu dang 'o ma gnyis kyis ko pa gnyan par byed de bzhin du shes rab zung du 'brel bar bya'o）。

[81] 參看藏族美術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藏族美術集成・繪畫藝術・壁畫・日喀則卷》（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21），頁116-117圖版。

臺大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寶王經》所說六字大明咒是大悲觀音菩薩的「微妙本心處」，[82] 四臂觀音只是修習此咒儀軌時出現的觀音形式。即使在十四世紀上半葉的夏魯寺，六字真言作為《寶王經》最初寓意的大悲觀音的明咒，還並未直接與四臂觀音關聯。如噶夾牆的四臂觀音三尊壁畫，非常罕見的是並沒有以黑底金字勾畫六字真言，或在三尊下方寫上六字真言，而是兩側繪製了十方諸佛與馬頭明王，這與宋夏時期的觀音供養圖像體系有繼承關係。[83] 夏魯寺瑜伽禪定修習圖中央四臂觀音並無榜題說明六字真言與四臂觀音的聯繫，只是在畫面邊框和行文中以黑底銀字多次書寫六字真言明咒，這是回應《寶王經》的相關內容。此曼荼羅的重點也在於獲得六字真言的大悲神力，四臂觀音是六字真言的形象化現：「其字變成觀世音，一面四臂具悲心」。[84]

至十三世紀末至十四世紀初，首先在敦煌河西走廊地區，四臂觀音替代了大悲觀音原本與六字真言的關聯，形成四臂觀音與六字真言的固定搭配，四臂觀音與六字真言組合在一起出現。因西夏、回鶻都有發達的印刷技術，十四世紀上半葉出現的銅板或木板捺印模具，在四臂觀音周圍環刻西夏文或蘭札體梵文六字真言，如西夏文六字真言與四臂觀音銅捺印模具（圖28a），[85] 法藏回鶻文寫卷上有銅板或木板捺印四臂觀音像，背光環繞蘭札體梵字六字真言（圖28b），這個捺印雕版年代在十四世紀前後，是四臂觀音與六字真言相關的直接證據。[86] 四臂觀音與六字真言組合最為確鑿的證據是元至正八年（1348）西

[82] 《寶王經》卷三：「此六字大明陀羅尼，無量相應如來而尚難知，菩薩云何而得知此觀自在菩薩微妙本心處耶？」天息災譯，《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第20冊，No. 1050，頁59。

[83]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德堡分所等編，《俄藏黑水城文獻》，第6冊。皇慶二年（1211）寫《親集耳傳觀音供養讚歎》記有「頂戴寶冠月輪上，想金色身無量光；十方諸佛菩薩眾，周徊圍繞中尊坐；身[?]又想金剛帳，馬項聖者面外向；□□赤色光熾火盛，一面二臂摧四魔。」

[84]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德堡分所等編，《俄藏黑水城文獻》，第6冊，皇慶二年（1211）寫《親集耳傳觀音供養讚歎》。

[85] 此模具拓片最初收入羅福萇，《初印〈西夏國書略說〉》1冊（附圖珂羅版，線裝手書印本，東山學社，1914，後由西北民族大學房少新收藏）。

[86] 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藏西域文獻》，卷3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臺大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寧王速來蠻等立「莫高窟造像碑」，碑面正中是四臂觀音，周圍環繞六體六字真言。

既然修習四臂觀音獲取六字大明咒的功德成為一種藏傳佛教的儀軌，那就必須有上師進行傳法，因而西夏至元明時期出現眾多修習六字大明的成就法和以傳授此法著名的上師。瓜州榆林窟西夏晚期第27窟為大窟附屬的耳洞，窟內裡壁繪著帽上師像，主尊上師右側為與四臂觀音形貌相同的白色六字大明母，左側為黃色的四臂持寶菩薩，與上師共同組成四臂觀音三尊（圖29），壁面兩側繪有西夏後期流行的布袋和尚，接引佛和「寒山拾得讀經圖」，主尊頭頂有西夏流行的勝樂續部金剛亥母，但窟內沒有出現六字真言。可見西夏後期已經將上師等同於四臂觀音。至明宣德六年（1431）劉智慧刊刻的《聖觀自在求修六字禪定經》，其經尾題跋有云：

無量壽佛大慈悲心親說六字大明
王廣大功德傳授師剌思馱麻上師
傳授師思八剌
　　宣德六年二月初六日奉
佛信官劉智慧妙發心刊板流通 ⑧⑦

此經旨在以禪定方法「求修」六字大明王四臂觀音，與夏魯寺瑜伽禪定的做法一致，上師的引導非常重要，傳授此法的上師稱「傳授師」，名為「剌思馱麻」和「思八剌」。經首畫一觀想四臂觀音的蕃人上師像，跏趺坐於明式靠背羅漢床椅，下方圓幾有海螺等五種供品，上師頭上升起雲線，中央大像為四臂觀音，觀音背龕上方有阿彌陀佛化佛；蘭札體梵字六字真言Oṃ Maṇi Padme Hūṃ逆時針旋轉安置，從六個梵字逸出雲線格象徵禪定修習次第，即修持六度波羅蜜。同時也象徵六道輪回，六道中有金剛界五方佛和四臂觀音，表明修持五佛與四臂觀音，皆可到達彼岸淨土（圖30）。從此雕版畫可以確定，在十五世紀前後，六字大明王已經完全等同於四臂觀音。傳授上師甚至也有自己的心

⑧⑦ 翁連溪、李洪波主編，《中國佛教版畫全集》，第7卷，頁97-98。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咒，如三世噶瑪巴大寶法王的心咒與四臂觀音一樣就是六字真言（圖31a）。[88]

作為六字真言形象化象徵的四臂觀音，強化了《寶王經》主旨大悲觀音救度眾生有情脫離輪回的功能，因此輪回圖的出現也可以看做是《寶王經》的另一種圖像形式，輪回圖的出現與《寶王經》的真正流行大都在同一個時間，也就是宋夏元時期。現在大家引述的討論輪回的經典中有關生死輪迴圖的儀軌《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唐義淨奉制譯，[89] 講述的是繪製輪迴圖的方法，而不是建立輪迴圖的義理。《寶王經》相關章節，觀音救度與輪迴解脫相輔相成，尤其是出現四臂觀音圖像的曼荼羅配置，或是構成輪回圖式樣的觸發點，西藏阿里札達縣夏石窟六道輪回圖對面繪如意輪觀音，大足石刻的輪回圖，圓輪中央正是寶王經最初的阿彌陀佛。

---

[88] 宣德六年（1431），國家圖書館版本提供，《諸佛菩薩妙相名號經咒》，頁49，佛部十四「大寶法王」。

[89] 義淨譯（635－713），《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三十四，〈輾轉食學處〉（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第23冊，No. 1442，頁810-816）第三十一：「爾時世尊告阿難陀：『非一切時處常有大目干連，如是之輩頗亦難得，是故我今勅諸苾芻，於寺門屋下畫生死輪。』時諸苾芻不知畫法，世尊告曰：『應隨大小圓作輪形處中安轂，次安五輻表五趣之相。當轂之下畫捺洛迦，於其二邊畫傍生、餓鬼。次於其上可畫人、天，於人趣中應作四洲：東毘提訶、南贍部洲、西瞿陀尼、北拘盧洲，於其轂處作圓白色，中畫佛像，於佛像前應畫三種形：初作鴿形表多貪染，次作蛇形表多瞋恚，後作豬形表多愚癡，於其輞處應作溉灌輪像，多安水罐畫作有情生死之像。生者於罐中出頭，死者於罐中出足，於五趣處各像其形，周圓復畫十二緣生生滅之相，所謂無明緣行乃至老死，無明支應作羅剎像，行支應作瓦輪像，識支應作獼猴像，名色支應作乘船人像，六處支應作六根像，觸支應作男女相摩觸像，受支應作男女受苦樂像，愛支應作女人抱男女像，取支應作丈夫持瓶取水像，有支應作大梵天像，生支應作女人誕孕像，老支應作男女衰老像，病應作男女帶病像，死支應作輿死人像，憂應作男女憂戚像，悲應作男女啼哭像，苦應作男女受苦之像，惱應作男女挽難調駱駝像。於其輪上應作無常大鬼蓬發張口，長舒兩臂抱生死輪，於鬼頭兩畔書二伽他曰：『汝當求出離，於佛教勤修，降伏生死軍，如象摧草舍。於此法律中，常為不放逸，能竭煩惱海，當盡苦邊際。』」

臺灣藝術學院出版資料庫

四、四臂觀音、六字真言與《寶王經》之後四臂觀音成就法

除了《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描述的「四臂觀音」曼荼羅，早期記載四臂觀音修習的成就法（sgrub thabs/sādhana）並不易尋覓。

目前所見最早的四臂觀音成就法文本當屬西夏巴哩譯師（Ba ri lo tsa ba，1040－1112）《巴哩百法》（*sGrub thabs brgya rtsa*）所記四臂觀音成就法《聖世間自在六字觀音成就法》（*'Phags pa 'jig rten dbang phyug yi ge drug pa*），譯師申明其法來自《大寶莊嚴經》，其中記載：「據《寶王經》所言，聖世間自在六字觀音，虛空蓮花曼荼羅之上白色『嗡』字發出光芒，集聚成一切眾生事業、佛陀慈悲；自性觀音六字母，白色身，一面四臂，（頭）上方有大悲之眼；上二手合掌祈禱十方佛利益他眾；右下手執數珠，左下手持十六瓣葉白蓮花，有神饈美飾和身著彩衣的龍子，雙足跏趺坐，（龍子）左側各有每個月光墊。右側是黃色持寶；左側是白色六字大明母，標識與主尊相同，遊戲坐；主尊頭上有無量光佛。」⑨⓪ 此成就法展示之蓮花曼荼羅，雖傳自《寶王經》但與《寶王經》不同，主尊已是稱為「聖世間自在六字觀音」的四臂觀音，頭上有無量光阿彌陀化佛，此種化佛是西夏譯師引進的源自敦煌河西系統的造像

⑨⓪ 巴哩譯師（Ba ri lo tsa ba）譯，《巴哩百法》（*Ba ri brgya rtsa'I lha'I mngon rtogs nams bzhugs so*），收入《藏文大藏經》，德格版，No.3306-3399；北京版，No.4127-4220。跋尾提到成就法由巴哩譯師和不空金剛（Don yod rdo rje, Amoghavajra）合譯，引文見葉16-17：Za ma tog bkod ba'i mdo las byung ba/ 'phags pa 'jig rten dbang phyug yi ge drug pa ni/ stong pa'i dang las pa[i?] las padma a las zla ba'i dkyil 'khor gyi steng du hri dkar po las 'od zer 'phros/ sems can gyi don byas/ sangs rgyas kyi thugs bsdus yongs su gyur ba las/ rang nyid 'phags pa spyan ras gzigs yi ge drug ma/ sku mdog dkar po zhal gcig phyag bzhi pa/ thugs rje'i spyan gyi gzigs stengs dang ldan zhing/ phyag dang po gnyis thel mo sbyar nas phogs bcu'i sangs rgyas rnams la gzhan don mdzad par gsol ba/ g-yas 'og ma na bgrang phreng/ g-yon 'og ma na padma dkar po 'dab ma bcu drug pa 'dzin pa/ lha rdzas kyi rgyan dang na bza' lhab lhub kyis klu bu shing/ zhabs gnyis sems dba' skyil krung gis bzhugs pa/ de'i g-yon du zla ba'i gdan re re la/ g-yas su nor bu 'dzin pa ser po/ g-yos du yum yi ge drug ma dkar mo phyag mtshan cha gtso bo dang mtshungs shing rol pa'i steb skyis bzhugs pa/ 'od dpag med kyis dbu brgyan can/ omni padme hum bzlag/ om arya lo ke shav ra sa pa ri / skyon gyis ma gos sogs// 參看賈維維，〈西夏石窟造像體系與巴哩《成就百法》關係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2019年10期。

臺灣藝術期刊資料庫

特徵、吐蕃至後弘初期觀音的配置，十二世紀以來的四臂觀音頭頂並無化佛。

一般的造像圖集等例舉四臂觀音，大都說明為阿底峽及噶當派所傳，檢索阿底峽所傳觀音成就法，最早的當為《丹珠爾》怛特羅部收錄的《聖觀自在成就法》（*'phags pa spyan ras gzigs 'jig rten dbang phyug sgrub pa'i thabs*），跋尾寫明「此世間護法成就法為大師吉祥燃燈智所撰」（'jig rten mgon po sgrub thabs slon dpon chen po dpal mar me mdzad ye shis kyis mdzad pa rdzogsho），無疑為阿底峽（A ti sha mar me mdzad ye shes，982–1054）觀音成就法。此經由阿底峽和古格譯師仁青桑布（958－1055）譯為藏文。然而，此經描述世間護法形象是少見的三面十二臂觀音：[91]「（從月光白色八瓣蓮花A字中湧出），護主身色紅，三面紅、三面白，三面藍；左右六臂共十二臂，分別做禪定印、持蓮花與劍、大寶與法輪，胸中現種子字」，並提到「六字真言」om a o ma ṇi padme hrum hrum hra是種子字。[92] 阿底峽所說的聖觀自在還不是四臂觀音，可見十一世紀初阿底峽入藏時尚無四臂觀音，在四臂觀音圖像濫觴後，將此觀音歸結於阿底峽傳承。

與阿底峽所作觀音成就法年代相近的文獻，是後代掘出伏藏（gter-ma）、託名吐蕃譯師米紮的《大悲米紮心要六字聖觀音成就法》（*Thugs rje chen po mi tra snying thig 'phags pa spyan ras gzigs 'jig rten dbang phyug yi ge drug pa'i*

---

[91] 阿地瞿多譯，《陀羅尼集經》，卷五觀音卷收錄有「十二臂觀世音菩薩身印咒」：是法印呪，取牛糞、牛尿、酥乳酪等各一大兩，總共和攪。香湯灑浴，著新淨衣，正面向東，並足蹲坐。即呪前藥一百八遍，六月一服，一年再服，自身無病，治病大吉。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第18冊，No. 901，頁827。西藏江孜白居寺吉祥多門塔二層獅子吼觀音殿描繪有這種十二臂千手千眼觀音壁畫。

[92] 阿底峽（Atīśa）著，仁青桑布（Rin chen bzang po）譯，《*Āryāvalokiteśvarasādhana*（梵文經名），*'Phags pa spyan ras gzigs 'jig rten dbang phyug sgrub pa'i thabs*（藏文經名）》，收入《丹珠爾》鉛印本第一部第22卷（*bsTan 'gyur,* Par gzhi dang po）（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2008），頁1234-1238。原文如下：de yongsu gyur ba las bdag nyid 'jig rten mgon po sku mdog dmar po zhal gsum pa/ dmar po dang/ dkar po dang/ sngon por snang ba dang/ phyag drug pa g-yas g-yon dang po gnyis snyoms par 'jug pa'i phyag rgya can/ g-yas kyi gnyis pa dang gsum pa na padam dang ral gri bsnams pa/ g-yon gyi gnyis pa dang gsum pa na rin po che dang 'khor lo bsnams pa'o/

臺大理論期刊資料庫

sgrub thabs bzhugs so），[93] 年代大概在十二世紀前後，其中的觀音已經是四臂觀音，文本描繪觀音居於四門無量宮，一面四臂，兩主臂當胸做合十印，下右臂執珍珠鬘數珠，下左臂持白蓮花，身色白如海螺。伏藏成就法沒有提到四臂觀音的兩位脅侍，但明確的將四臂世觀音與六字真言聯繫在一起，稱為「世間自在六字觀世音」。至十六世紀覺囊上師傑尊貢噶卓卻（rJe btsun Kun dga' grol mchog，1507－1566）著《阿底峽略傳》明確描述了尊者所傳為四臂觀音形象：「在世間無量宮，思量六道諸眾生，眾生有情語之主，聖自在觀音身色白，一面四臂，主臂雙手當胸做合十印，次兩臂右手執水晶108數珠，左手持白蓮花，金剛跏趺坐，瓔珞珍寶嚴身，髮髻頂有化佛無量壽佛。」[94] 此類托名阿底峽造像樣式，文字描述源自前述西夏譯師《巴哩百法》，圖像定型在康乾時期編集的蒙藏佛教圖像集。[95]

---

[93] 此成就法本末記：「色嘉達降巴所出無惑伏藏」（zab rgya stag sham pa'i gter ma yang dag pa'o）絳貢工珠洛珠塔耶編輯（'Jam mgon kong sprul bLo gros mtha' yas），《大悲米紮心要六字觀世音世間自在修法》（*Thugs rje chen po mi tra snying thig 'phags pa spyan ras gzigs 'jig rten dbang phyug yi ge drug pa'i sgrub thabs.*），收入倫珠和喜饒智美（Ngodrup And Sherab Drimay）輯，《大寶伏藏》（*Rin chen gter mdzod chen mo 2a-2b*），第38卷（1976－1980），頁20-26，原文：'phags pa 'jig rten dbang phyug sku/ zhal gcig pa la phyag bzhi pa/ dang po thugs kar thal mo sbyar/ g-yas 'og mu tig phreng ba 'dzin/ g-yon 'og padma dkar po snams/ sku mdog dung dang kun da 'am/

[94] rJe btsun kun dga' grol mchog. *Jo bo rje'i rnam thar don bsdu sogs*. 昂仁木刻板[?], 21a-21b. Buddhist Digital Resource Center (BDRC), purl.bdrc.io/resource/MW26572（檢索日期：2023年10月29日）。原文如下：bdag nyid dang bsdu'i gnas phyir 'phros pas lo dgyi 'jig rten gzhal yas khang dang/ rigs drug gi sems can rnam spyan ras gzigs su gyur par bsams la/ ngag tu/ bdag dang sems can thams cad 'phags pa spyan ras gzigs dbang phyug sku mdog dkar po zhal gcig phyag bzhi pa/ phyag dang po gnyis thugs kar thal mo sbyar ba/ g-yas kyi gnyis pa na shel gyi phreng ba brgya rtsa brgyad/ g'yon gyi gnyis pa na padma dkar po/ zhabs rdo rje dkyil krungs gyis bzhugs pa/ dar dang rin po che'I rgyan gyis brgyan pa/ ral pa'i thor cog la bla ma'i ngo bo 'od dpag med pas brgyan/

[95] 《五百佛像集》收錄此類四臂觀音三尊，注明：「阿底峽所傳六字觀音」（spyan ras gzigs yi ge drug pa jo bo'i lugs），左右脅侍是四臂的「持寶」和「大明母」。圖像特徵是頂髻有阿彌陀佛化佛的四臂觀音，專名為「佛海四臂觀音」（sbyin ras gzigs rgyal ba rgya mtsho），遼寧阜新海棠山藏傳佛教浮雕也有依圖像集雕刻的佛海四臂觀音。參看瑞士蘇黎世大學民族學博物館版本提供，《五百佛像集：見即獲益》，《藏傳佛教圖像學叢書》（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1），圖版101和132。

臺大歷史學系圖書資料庫

出自《寶王經》但更系統、詳細且流行更廣的記載四臂觀音的成就法是十二世紀前後印度造像學文獻《成就法鬘》，其中有四篇六字觀音的成就法，其中兩篇為三尊配置，一篇六字觀音單由六字大明（Ṣaḍakṣari Mahāvidyā）相伴，另一篇六字觀音為單尊。[96] 編輯《成就法鬘》的印度學者巴達恰利亞（Benoytosh Bhattacharyya）在此觀音後注明此觀音最初來源於《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Kāraṇḍavyūha Sūtra*），是六字真言神格化的形象，稱「六字大明」（Sādaksarī Mahāvidyā），雖然十二世紀前後《巴哩百法》已有「六字觀音」（'Phags pa 'jig rten dbang phyug yi ge drug pa）的稱呼，但源自《寶王經》的《成就法鬘》，還沒有「六字觀音」（Ṣaḍakṣari-Lokeśvara）的梵文專名。[97]《成就法鬘》收集的四篇成就法中三尊配置的六字觀音成就法記載：

> 行者需觀己為白身、嚴飾諸寶、一面四臂的六字（自性）觀音，左持蓮，右持念珠，另二手當胸結合掌印（Añjali）。右侍持寶（Maṇidhara），身色、臂數與之同，施坐蓮花上；左侍是與其身形相同的六字大明母（Ṣaḍakṣarīṃ Mahāvidyā ），施坐蓮花上。[98]

---

[96] Benoytosh Bhattacharyya, *The Indian Buddhist Iconography: Mainly Based on the Sādhanamālā and Other Cognate Tantric Texts of Rituals*, pp. 124-127.《成就法鬘》有四種專門用來頌贊四臂觀音的成就法（*Sādhana*）。

[97] 巴達恰利亞提到四臂觀音與六字真言相關聯時被稱作「六字觀音」（Sādaksarī Lokeśvara）。觀察梵文原典，並沒有譯文中「六字觀音」，巴氏將其中的Lokeśvararūpaṃ sarvālaṅkārabhūṣitaṃ（「六字自性觀音」）翻譯成了Ṣaḍakṣari-Lokeśvara，即「六字觀音」。不過正如李翎觀察到的，她認為從無「六字觀音」（Sādaksarī Lokeśvara〉一說，這個稱呼是巴達恰利亞的誤讀造成的。參看李翎，〈藏傳佛教六字觀音像研究（上）》，《普門學報》，第35期（2006.9），抽印本頁8。巴氏相關描述見Benoytosh Bhattacharyya , *The Indian Buddhist Iconography: Mainly Based on the Sādhanamālā and Other Cognate Tantric Texts of Rituals*, p. 126.

[98]《成就法鬘》（Sādhanamālā）頁27：ātmānaṃ Lokeśvararūpaṃ sarvālaṅkārabhūṣitaṃ śuklavarṇaṃ caturbhujaṃ vāmataḥ padmadharaṃ dakṣinato akṣarasūtradharaṃ, aparābhyāṃ hastābhyāṃ hṛdi saṃputāñjalisthitaṃ dhyāyāt. Dakṣine Maṇidharaṃ tadvadvarṇaṃ bhujānvitaṃ. padmāntaroparistham. Vāme tathaiva aparapadmasthāṃ Ṣaḍakṣarīṃ Mahāvidyāṃ. Benoytosh Bhattacharyya, *The Indian Buddhist Iconography: Mainly Based on the Sādhanamālā and Other Cognate Tantric Texts of Rituals*, p. 27.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後多羅那他（Taranatha，1575－1634）《寶源百法》對四臂觀音成就法做了更為詳細的說明，四臂觀音主從三尊稱為thugs rje chen po gtso 'khor gsum，造像特徵與《巴哩百法》大致相同，有個別差異，補充了一些細節，如介紹黃色身形持寶菩薩兩手合十，「右第二手以拇指和食指執大寶具力王幢柄，左第二手執穗頭垂下的細枝善果，如同可握持的本性。」[99] 此後四臂觀音的成就法出現較多，諸如八世達賴喇嘛絳白嘉措（1758－1804）所撰《四臂觀音修法儀軌》（*Thugs rje chen po phyag bzhi pa'i sgrub thabs*）等。[100]

宋夏元之後漢地佛教西方淨土信仰深入普通民眾，念誦阿彌陀佛名號的便巧修習方式非常普及，但信眾選擇供養的具象神靈卻非阿彌陀佛而是大慈大悲的觀音菩薩；與中原漢地信仰情形吻合，藏傳佛教流行地區僧侶信仰的是以文殊、彌勒代表的中觀唯實體系的理論化佛教，[101] 但底層信仰與漢地佛教信眾並無差別，念誦六字真言與念誦阿彌陀佛名號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四臂觀音與阿彌陀佛都是出自《寶王經》的同一傳播體系，這也是以往研究者關注較少的、

---

[99] 覺囊尊者多羅那他（Jo nang rje btsun Taranatha），《寶源百法》（本尊大海成就法・大寶生處）（*Yi dam rgya mtsho'i sgrub thabs rin chen 'byung gnas*）（札什倫布寺複製本，新德里：窮佩洛丹〔Choephel legden〕，1976），上冊，頁241-244，原文22a-25b，TBRC 6027/12422，持寶菩薩持物描繪原文de'i g-yas su nor bu 'dzin pa sku mdog ser po phyag dang po gnyis thel mo byor ba/ gyas gnyis pa'i mtheb mdzub sbyor pas rin po che dbang gi rgyal po yu ba dang bcas pa 'dzin cing/ g-yon gnyis pas rin po che'i lhag phran gyi yal ga 'brus bu'i snyem ltung bar 'gyur ba'i ngang tshul can bsnams/

[100] 修習儀軌描述四臂觀音云：「提到四臂觀音出於月白曼荼羅，身色白，一面四臂，主二手作合十印，次二手右手持水晶鬘，左手執蓮花，相好光明，頭飾仁獸皮，珠寶瓔珞嚴身，金剛跏趺座，頭頂是Oṃ，脖子是'a，胸口是Hriṃ Hrūṃ，從此處放出白光。」'phags pa spyan ras gzigs sku mdog dkar po zhal gcig phyag bzhi pa/ phyag dang po gnyis thugs kar thal mo sbyar ba/ g-yas 'og mas shel 'phreng dang/ g-yon 'og mas padma 'dzin pa/ mtshan dpe'I 'od 'bar zhing ri dvags kyi lpags pas nu mgo' yon pa bkab pa/ rin po che'I rgyan dang dar gyin bzas klubs pa/ rdo rje skyil krung gis bzhugs pa'I spyi por om/ mgin par a'/ thugs kar hr'im § hvum gis mtshan pa/ *thugs rje chen po phyag bzhi pa'i sgrub thabs smyung bar gnas pa'i cho ga phan bde'i bdud rtsi'i 'byung ba rab dkar bum bzang (ga) 'jam dpal rgya mtsho; gsung 'bum* g卷。

[101] 謝繼勝，〈扎塘寺壁畫法華圖像與11—14世紀中國多民族藝術史的重構——文殊彌勒、釋迦文殊與藏漢佛教義理的圖像形成史〉，《文藝研究》，2021年11期，頁130-146。

臺灣美術期刊資料庫

漢藏佛教在底層基礎信仰上的一致性。對漢藏基層信仰一致的最好例證是元明時期山東靈岩寺墓塔林所見壽塔碑額，鐫刻《寶王經》用漢字「唵麼抳鉢訥銘吽」、蘭札體梵字六字真言Oṃ Maṇi Padme Hūṃ，或「南無阿彌陀佛」證明六字真言即等同於阿彌陀佛。[102] 即使到了清康乾年間，寧夏地區流行的藏傳佛教三怙主造像，主尊仍然只表現托缽釋迦摩尼/阿彌陀佛，下方題刻藏文轉寫梵字四臂觀音、金剛手和文殊菩薩的種子字（圖31b）。[103] 因此，原本從西夏故地河西走廊生發的六字真言在全國漢藏多民族地方都得到了快速傳播；與之相關的四臂觀音，原本就替換了《寶王經》曼荼羅無量壽佛的位置，[104] 十三世紀以後地位陡然升起，具備了「佛性」，敦煌河西走廊一線四臂觀音造像如同佛陀地位，大多是螺髮佛髻，如榆林窟第6窟蒙古西寧王夫婦供養人上方的四臂觀音佛髻（圖32a），麥積山第38窟的四臂觀音也是佛髻。甚至從菩薩的行列中脫離出來，進入佛的行列。如青海玉樹雜多縣昂賽鄉年都村元代巴艾寺（dPal be'u dgon pa）遺址靈塔，塔身滿繪千佛之阿閦佛與四臂觀音（圖32b-c），可見四臂觀音與阿閦佛有相同的薦亡超度功能；[105] 至西藏昌都卡若區乃

---

[102] 兩者等同在靈岩寺萬曆二十五年同時設置的和尚墓碑中有最好的呈現：圓寂本師西班首座暎天和尚墓（丁酉）碑額「南無阿彌陀佛」；圓寂本師東班都管寶山和尚墓（丁酉）碑額則用「唵嘛呢叭弥吽」，六字真言被看做是阿彌陀佛而非觀音或四臂觀音。

[103] 此處摩崖造像位於寧夏平羅縣汝箕溝花石洞，距離地面4公尺，造像寬3.3公尺，高2.1公尺，筆者2023年8月17日實地考察攝影。

[104] 阿彌陀佛（無量壽佛）涅盤以後，將有觀世音菩薩繼承其位。後漢月支國三藏支婁迦讖譯，《佛說無量清淨平等覺經》，卷三：長跪叉手言：「佛說無量清淨佛壽命甚長，威神大，智慧光明，巍巍快善。乃獨如是乎？」佛言：「無量清淨佛至其然後般泥洹者，其廬樓亙菩薩（即觀音）便當作佛。」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第12冊，No. 361，頁291。

[105] 筆者2016年7月對雜多佛塔進行了考察與拍攝，該佛塔所在的巴艾寺原屬拔戎噶舉，後轉宗噶瑪噶舉。寺塔初建與拔戎噶舉祖師達瑪旺秋（Dar ma dbang phyug，1127–1199）的弟子熱巴（ras pa，1164–1236）有關，《青史》提到「帝師熱巴也是拔戎巴達瑪旺秋的弟子」（ti shri ras pa yang 'bab rom pa'i slob ma yin pas）旬努貝，《青史》，藏文本（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下冊，頁559。熱巴在西夏及入元傳法31年，獲得帝師稱號。木雅噶布，《帝師熱巴傳》，收入德拉但主編，《遊行記》（*Lam yig phogs bsgrigs/*）（香港：博學出版社，2018），頁255-365，其中頁258-263提到熱巴13歲、15至17歲多次見拔戎上師，學習吉祥勝樂法及大黑天修持（Mi nyag dkar po/ bla ma rin po che 'gro

臺大學術期刊論文資料庫

普寺（gnas phug）發展出完整的靈塔窟，賢劫千佛遍繪於窟頂四披，四臂觀音位於靈塔前方上師像下方，與佛頂尊勝、綠度母等祛災延命菩薩組成組像，石窟西壁繪有四臂觀音與救八難圖像，可見四臂觀音與巴艾寺靈塔功能基本相同（圖32d-e）；[106] 藏西卡茲河谷寺院所出四臂觀音三尊唐卡，已經作為藏西常見的三十五懺悔佛的主尊，諸佛以五色五方佛安置，是西域地方五色千佛配置的演變形態（圖32f）。[107] 宣德六年（1431）刊印的《諸佛菩薩妙相名號經咒》，其中四臂觀音屬於「佛部」。[108] 夏魯寺三門殿等處以將成千上百四臂觀音擦擦作為千佛貼在牆壁上，明代中後葉河西的四臂觀音圖像被信眾看成是千佛，如炳靈寺146窟窟頂曼荼羅以下滿繪四臂觀音小像，正是將四臂觀音等同於賢劫千佛，永昌博物館藏橫三世佛唐卡，中央主尊儼然是螺髻四臂觀音，兩側為阿彌陀佛和藥師佛（圖33a-b）。[109]

五、四臂觀音、六字真言與轉輪藏

如同漢藏多民族地區流行的紙馬和風馬旗，[110] 藏地信眾普遍使用轉經筒作為禮佛朝聖等民間信仰活動的法器，漢地普通信眾卻不使用轉經筒，早期印度或中亞佛教中並無轉經筒的文獻或圖像。事實上，藏地轉經筒最初來源於漢地佛教的華嚴轉輪藏，漢地轉輪藏則與隋唐以來表現釋迦牟尼八相事蹟的密簷八塔形制演變有關，晚唐首先在東南沿海地區佛寺出現。如白居易（772－846）〈蘇州南禪院千佛堂轉輪藏石記〉說明晚唐蘇州已經有了完整的九層塔

ba'i mgon po ti shri ras pa'i rnam par thar pa bzhugs pa'i dbu phogs lags so）；另參看謝繼勝、才讓卓瑪，〈宋遼夏官帽、帝師黑帽、活佛轉世與法統正朔——藏傳佛教噶瑪噶舉上師黑帽來源考〉（上、下），《故宮博物院院刊》，2020年6期，頁45-60；7期，頁58-71。

[106] 2023年8月上旬，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和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察隊對乃普寺進行了細緻的考察，感謝熊文彬教授和廖暘研究員與筆者分享考察心得並授權使用圖片。

[107] 此唐卡出自西藏阿里札達縣卡茲寺，阿里地區文物局文物室提供，特此致謝。

[108] 宣德六年（1431）刊印，國家圖書館版本提供，《諸佛菩薩妙相名號經咒》，佛部十一。

[109] 趙雪芬，〈炳靈寺石窟四臂觀音造像試探〉，《西藏研究》，2011年1期，甘肅永昌博物館四臂觀音為筆者調查唐卡文化檔案河西卷時收集拍攝。

[110] 謝繼勝，《風馬考：西藏民間宗教、儀軌與神話》（臺北：唐山出版社，1996）。

臺大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轉輪藏。⑪ 南宋時佛教文獻如《釋門正統》等傳為今浙江義烏人南朝梁傅大士（497－569）傅翕所創，⑫ 但無文物與其他文獻支持這種說法。轉輪藏實物最早見於河北正定隆興寺南宋時所建木構轉輪藏，其後有大足北山佛灣第136窟石質轉輪藏，為南宋紹興十二年至十六年（1142－1146）建，⑬ 淳熙八年（1181）建四川江油竇圌山雲岩寺飛天藏，⑭ 淳熙十七年（1190）建寶頂毗盧道場等。這些轉輪藏集中出現在宋遼時期，是開闢儲經內室的密簷八面塔，佛塔反映的華嚴密教觀念同時進入了轉輪藏形制中，這在宋遼佛塔裝藏中有很好的體現。如遼寧朝陽北塔地宮出土重熙十二年（1043）的金銀經塔，是現今見到的最早的「轉經筒」樣式，經塔金銀套筒，逐層保留了展示了智拳印毗盧佛與釋迦八大聖地，三身佛和毗盧遮那與八大菩薩，其中體現了完整的華嚴密教的宇宙世界，也以此形制為此後「轉經筒」奠定了宗教義理基礎（圖34），⑮

⑪ 白居易，〈蘇州南禪院千佛堂轉輪藏石記〉:「堂之中，上蓋下藏。蓋之間，輪九層，佛千龕，彩繪金碧以為飾。環蓋懸鏡六十有二。藏八面，面二門，丹漆銅鍇以為固。環藏敷坐六十有四。藏之內輪以輪，止以梶。經函二百五十有六，經卷五千五十有八。」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全唐文》（全五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卷676。

⑫ （南宋）宗鑑，《釋門正統》，卷三，〈塔廟志〉（收入《續藏經》，卷75，No. 1513）:「立藏殿者，初梁朝善慧大士（傅翕玄風），湣諸世人雖於此道頗知信向，然於贖命法寶，或有男女生來不識字者，或識字而為他緣逼迫不暇披閱者。大士為是之故，特設方便，創成轉輪之藏。令信心者推之一匝，則與看讀同功。故其自誓曰：有登吾藏門者，生生不失人身。又能旋轉不計數者，是人所積功德，則與誦經無異。」《神僧傳》（《神僧傳》九卷，明永樂十五年御製）卷四：「初大士在日，常以經目繁多，人或不能遍閱，乃就山中建大層龕，一柱八面，實以諸經運行不礙，謂之輪藏。……從勸世人有發於菩提心者，能推輪藏，是人即與持誦諸經功德無異。今天下所建輪藏皆設大士像，實始於此。」（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第50冊，No. 2064，頁975。）

⑬ 本窟石刻有五處施主與工匠鐫刻題記，分別為紹興十二年至紹興十六年。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重慶市社會科學院大足石刻藝術研究所編，《大足石刻銘文錄》（重慶：重慶出版社，1999），頁31-33。

⑭ 「飛天藏在竇圌山，宋淳熙八年（1181）建，元至正中（1341－1368）重葺，明季兵火，惟此獨存。」（清）黃廷桂、（清）憲德修；（清）張晉生等纂，《欽定四庫全書史部十一・四川通志[雍正]》（清乾隆元年〔1736〕刻本，浙江大學圖書館地志庫編號1：280/33.1），卷二十七，頁3b古蹟下。

⑮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陽市北塔博物館編，王晶辰、董高、杜斌主編，《朝陽北塔：考古發掘與維修工程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臺大藝術期刊資料庫

年代稍晚的重熙十六年至十八年（1047－1049）內蒙古巴林右旗遼代慶州白塔塔剎出土的眾多的「法舍利塔」，內置陀羅尼經咒並八大塔，正是佛塔與轉經筒轉化的實物留存；⑯ 這種宋遼時期經筒隨著中土佛教在東北亞的中興，傳入朝鮮半島和日本，現在日本東京博物館藏的早期經筒都是這種類型，如鎌倉時代建久七年（1196）利仁神社經塚出土銅經筒（圖35），⑰ 形制類似的還有平安時代（十二世紀）鐵鑄經筒（圖36）。⑱ 可以說宋遼時期，也就是藏傳佛教後弘期開始的那段時間，已經開始了經筒的小型化，但更多是作為舍利塔等的裝藏，沒有成為普通人手中所持的轉經筒。

轉輪藏逐漸與原本的佛塔形制脫離，成為普通僧俗的信仰，乃至十四世紀以後進入藏區發展為手持轉經筒，可以說轉輪藏與漢藏四臂觀音、六字真言及三大士信仰的結合有直接關聯。

宋夏元之際佛教圖像不同傳承的重組與重構是多民族思想趨同與彙聚的突出表現形式，在漢藏佛教領域分別表現為淨土與華嚴融合的顯密形式，將淨土本質糅化在構建藏傳佛教教派修習系統的次第程式中，進而強調修習進程中的理論體系，讓藏傳佛教呈現為更加理論化的佛教系統。漢藏佛教義理的融合進程在重慶大足北山佛灣第136窟輪藏殿的佈置中有充分體現：正壁為說法佛陀與二弟子迦葉與阿難，此時主尊當為釋迦摩尼；兩側脅侍則為大勢至菩薩和觀音，此時主尊當為淨土阿彌陀佛組成西方三聖；側壁佈置了南宋四川流行的諸多觀音式樣如日月觀音、數珠手觀音和寶印觀音、白衣觀音等，實際上是大足石刻十聖觀音窟的簡略版，呼應主壁西方三聖的寓意；⑲ 該窟兩側壁另安置新樣文殊與普賢菩薩，與正壁主尊釋迦形成華嚴三聖，考慮到鄰近寶頂淳熙十七年（1190）輪藏毗盧道場，該窟內的八柱轉輪藏無疑也呈現華嚴意向，龍柱轉輪藏上方佛傳故事匾框浮雕回應早期密簷塔的八相故事，整個石窟佈局恰好完

⑯ 德新、張漢君、韓仁信，〈內蒙古巴林右旗慶州白塔發現遼代佛教文物〉，頁4-33。

⑰ 東京博物館編號E-14524，福岡縣太宰府市，原山寺經塚出土。有關日本經筒，參看村木二郎，〈東日本の經塚の地域性〉，《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第108集（2003），頁165-190。

⑱ 東京博物館編號E-14401，埼玉縣東松山市利仁神社經塚出土。

⑲ 如與轉輪藏窟幾乎同時的宋紹興六年至紹興十一年（1136－1141）的石門山第6窟。圖版參看大足石刻研究院編，《大足石刻》（重慶：重慶出版社，2012），頁204-205。

臺大藝術期刊資料庫

美的體現了宋夏時期淨土與華嚴的融合，體現了輪藏與淨土及華嚴的關係。

漢地寺院的輪藏殿實際上等同於寺院的毗盧殿，[120] 並將毗盧殿（輪藏殿）與觀音大士殿並列，成為寺院殿堂配置的定制，如南京明洪武初年（1368）改建天界寺時：「（毗盧）閣成，上供法報化三佛及設萬佛之像，左右度以大藏諸經法匭，後延觀音大士示十普門」；[121] 北京正統九年（1444）敕建的智化寺，其藏殿安置的轉輪藏是一個華嚴華藏世界的顯密呈現，輪藏頂端為五方佛與五護佛母，嵌八面龕柱表佛陀八相事蹟，經櫃外面安置四方千佛。[122]

漢地寺院觀音大士殿三尊組像龕背後的標配是影塑全壁善財童子與水月觀音，反映了漢傳圖像以《華嚴經入法界品》的五十三參將水月觀音形象代表的觀音信仰匯入了華嚴體系，水月觀音與善財的角色轉換將《法華經普門品》觀音與《華嚴經》緊密結合，進而形成淨土信仰與華嚴華藏世界的並列，因此漢地寺院與輪藏殿相對的是觀音大士殿，殿內供奉漢地佛教在宋元時期形成的文殊、普賢與觀音三大士。毗盧殿與大士殿的結合使得觀音地位陡然升起，在新三大士中，淨土觀音取代了毗盧佛或釋迦牟尼而成為原「華嚴三聖」的主尊，構成文殊-觀音-普賢結構的「三大士」，並接收毗盧佛或釋迦牟尼造像標識的獅座，構成騎獅觀音新樣式，與此時追隨四臂觀音一併傳入中原內地的獅吼觀音形成對應互換關係，騎獅觀音形象逐漸具有了獅吼觀音的某些造像特徵。藏傳佛教則在幾乎同一時期以四臂觀音取代毗盧遮那或釋迦牟尼成為文殊、金剛手菩薩的主尊，成為統攝僧俗信仰頂端的「三怙主」，藏漢三尊的發展進程大致相同：即從民間基層信仰的層面進入漢藏佛教的理論架構體系。

宋夏元明之際，四臂觀音信仰興起，率先在河西走廊等多民族地區流行，逐漸替代十一面八臂或千手千眼大悲觀音和水月觀音，成為漢藏多民族地區觀

[120]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編，《北平研究院北平廟宇調查資料匯編：內一區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頁66-87。目前大智殿三大士與智化門彌勒造像均已無存，且彌勒造像無舊照可考，其年代尚不清晰。相關記載另見劉敦楨，〈北平智化寺如來殿調查記〉，收入《劉敦楨文集》，第1卷（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82），頁61-128。

[121] 參見姚廣孝在永樂年間撰寫〈天界寺毘盧閣碑〉，收入葛寅亮，《金陵梵剎志》，卷16，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1輯，第4冊（臺北：明文書局，1980），頁750。

[122] 閆雪，〈北京智化禪寺轉輪藏初探——明代漢藏佛教交流一例〉，《中國藏學》，2009年1期，頁211-214。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音的主流，如北京明宣德至成化間修繕的大覺寺，大雄寶殿三世佛身後的三大士塑像，以及西方三聖像，其中的觀音形象都已經使用為漢地式樣的四臂觀音像（圖37a-c）。形象轉用的結果也使得四臂觀音與六字真言進入原本為毗盧殿華嚴體系的轉輪藏，演變為藏地的轉經筒系列。

隨著四臂觀音進入漢藏佛教體系，觀音所代表的六字真言信仰也廣為流行，漢地佛教華嚴輪藏與觀音的緊密關係導引四臂觀音和六字真言進入華嚴華藏系統，通過轉經筒媒介形成漢藏佛教西方淨土、華嚴法界[123]義理與藏傳佛教修習儀軌融合的新樣式。六字真言簡稱「瑪尼」，可以指裝藏的陀羅尼經咒與文獻本身，回應輪藏殿經藏的最初功能；同時又指《寶王經》消災去厄的六字大明咒，進而特指神格化此陀羅尼的四臂觀音，因此輪藏或轉經筒進入藏區之後被直接稱作「瑪尼輪」。

大約在十五世紀前後，漢地轉輪藏隨著漢藏文化的交流自東向西引入藏區，[124]與此一併傳入的還有明中葉以後的漢地宮廷裝飾圖案，[125]現今藏區西部十五至十六世紀的佛教石窟，窟頂多裝飾六瓣蓮花蘭札體六字真言，中央為阿彌陀佛種子字，以此象徵四臂觀音與轉經筒意向，以漢地西方淨土統攝藏傳密教經續傳承，例如西藏阿里札達縣卡茲河谷帕爾宗石窟，窟內繪止貢噶舉與薩迦上師傳承，滿繪金剛界、惡趣清淨、普明大日、無上瑜伽與瑜伽部曼荼羅，但窟頂中央安置忍冬團花六字真言，中央及四隅為阿彌陀佛和觀音種子字「紇哩」（Hrīh），裝飾龍鳳及忍冬紋圖案八吉祥等，是明中葉流行的漢地裝飾風格（圖38a-b）。此窟頂中央六字真言下方、雙塔前方或許安置有木構轉經筒，如同托林寺白殿的式樣。[126]此外，阿里皮央石窟第351窟，石窟正壁橫

---

[123] 華嚴所謂六凡四聖，其中六凡就是六道的內容，但漢地華嚴更側重心境的修持，諸道皆由心生。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第279部，卷19，頁102）「升夜摩天宮品」覺林菩薩偈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華嚴十法界與六道在此處有交集。

[124] 如明北京智化寺（1444）與鄰近藏區的四川綿陽市平武縣報恩寺（1446）轉輪藏。

[125] 熊文彬、唐櫻家，〈元明漢藏藝術交融的視覺證據——西藏阿里三圍地區的漢式龍鳳藝術遺珍〉，《故宮博物院院刊》，2023年4期，頁4-20。

[126] 帕爾宗石窟圖版由浙江大學漢藏佛教藝術研究中心王瑞雷博士提供。

臺大藝術開放資料庫

三世佛上方窟頂是蓮花托舉，蓮莖形成的蘭札體六字真言，兩側及周邊則是漢式的龍鳳圖案與花鳥（圖39a-b）。[127]

目前西藏其他地區沒有找到早於十五世紀以前的轉經筒實物遺存，現今藏地有明確記載的轉經筒見於阿里托林寺白殿題記，大約在十六世紀初，建築大殿時在殿內中央安置了「非常巨大的瑪尼輪」，已然是輪藏形制，但稱為「瑪尼輪」（ma ṇi 'khor lo），與阿里其他石窟窟頂安置六字真言輪是同樣的做法，或許與托林寺白殿現今不見的平綦殿頂六字真言相呼應。藏西石窟窟頂漢地式樣的六字真言與阿彌陀佛種子輪與托林寺轉經筒實例是漢地淨土與華嚴信仰由轉經筒進入藏西的遺留，是十五世紀前後漢藏文化交流的重要實例。後期藏區瑪尼輪都安置在佛殿殿門兩側，白殿大殿之內安置瑪尼輪的做法不多見，考慮到此殿供奉釋迦牟尼、賢劫千佛、佛母與如意輪觀音等，當屬於顯宗殿堂，配置意向與大足佛灣南宋第136窟將轉輪藏置於窟（殿堂）內的做法相似，是藏地初傳的轉輪藏保留了漢地輪藏原始的配置。殿內現存圖像沒有四臂觀音，四壁壁畫腰線繞殿一周，瓷青色背景上用藏文烏兼體（dbu can）書寫宗喀巴菩提道修習次第的《功德生處》（*Yon tan gzhir gyur ma*），類似夏魯寺一層轉經廊道壁畫的四臂觀音瑜伽修習次第。[128]

六、四臂觀音與三怙主信仰的形成與發展

三怙主圖像形成與藏傳佛教圖像一些象徵佛教義理的神靈神格的變化有關，主要是原屬於菩薩體系的神靈進入佛的行列，突出的特徵之一是二臂到四

[127] 霍巍、張長虹主編，《藏族美術集成・壁畫・阿里卷》（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17），頁225，圖版1；頁229，圖版9。

[128] 題記位於托林寺白殿東壁店門北側，兩側有水漬漫漶。「……建。每個木制瑪尼輪上裝藏七千七百七十如穀粒數量瑪尼（經咒），瑪尼輪上有五十七萬四千九……在此興善世間莊嚴殿（白殿當時的名稱）修建非常巨大瑪尼輪一座……水馬年（1522）開建……」（shing ma ṇi 'khor lo ree [re re] la thang ma yang ma ṇi 'bru grangs bdun stong bdun brgya bdun bcu re bzhugs shing ma ṇi lnga 'bu[m] bdun khrir bzhi ston dgu ……dge bar 'du khang 'jig rten brgyan du ma ṇi 'khor lo shin du che ba 'di sar skrun te/ ……chu rta lo rtso[m] ma ṇi khri khrag lhag tsam……）白殿的研究參看王瑞雷、賈維維，〈西藏阿里托林寺白殿壁畫配置與殿堂功能〉，《考古與文物》，2019年1期，頁95-104。

臺大藝術史料庫

臂的過渡，如般若佛母，文殊菩薩，四臂觀音。藏傳佛教標準的三怙主是四臂觀音為主尊，文殊菩薩為右脅侍，金剛手或金剛持菩薩為左脅侍，分別象徵原本屬於胎藏界曼荼羅的佛部，蓮花部與金剛部，其中中央的佛部文殊成為了觀音的脅侍，這種變化是西藏社會宗教理論構架與民間信仰折衷、調適的圖像反映。藏傳佛教的三怙主原本所指屬於胎藏界（屬於四密之事部）的三部，即金剛手，大日如來（文殊菩薩）與觀音的組合，但胎藏界三尊在吐蕃時期至後弘期都不稱作三怙主。十四世紀前後，文殊菩薩替代毗盧遮那進入胎藏界三尊系統成為佛部的代表，隨後因為四臂觀音地位的升起，原來的脅侍蓮花手觀音換為四臂觀音；四臂觀音在宋元之際的無上地位使之很快成為原本胎藏界三尊的主尊，四臂觀音具有的修習禪定的完整體系與次第也使得四臂觀音為主尊的三怙主具有更強的理論色彩，進而成為密教事部的三怙主，原本的胎藏界三尊在後期藏傳佛教中很少看到了。系統化的三怙主此時也完善出儀軌化的修習制度，具體修習情形如甘肅夏河甘丹卻闊林寺刻板印製的《事部三怙主念誦儀軌義明心要》（*Bya rgyud rigs gsum gyi bsnyen yig don gsal snying po zhes bya ba bzhugs so/*）等。[129]

此外，十二世紀前後東印度已經出現了文殊、蓮花手觀音與金剛手菩薩的三尊組合，例證如敦煌研究院展覽館藏觀音立像三尊像（圖40）及布達拉宮藏

[129] 此念誦儀軌為拉卜楞寺24世活佛阿莽班智達・恭卻堅贊（dPal mang pandita dKon mchog rgyal mtshan，1764–1853）著，有甘肅夏河阿木去乎寺（即甘丹卻闊林寺）清代咸豐年間刻板。另有有拉薩雪壩1944年印本，見夏河版頁188-213，收入《阿莽・恭卻堅贊全集》，第3卷（清咸豐年間甘丹卻闊林寺刻板）。末尾跋：「依止事部三怙主與本尊所言，小沙彌持明師貢卻堅贊在左科下院甘丹丹巴派傑林擔任書寫員賢明比丘晉美紮巴所作，此乃土登甯保洛桑傑哇最勝無垢傳軌，願在十方諸時弘揚繁茂常住。甘丹卻闊林寺刻板。吉祥！」（bya rgyud rigs gsum gyi rgyud dang dam pa'i gsung la brten nas/ ban chung rigs pa smra ba dkon mchog rgyal mtshan gyis mdzod dge smad kyi dgon pa dge ldan bstan pa 'phel rgyas gling du sbyar ba'i yi ge ba ni dpyod ldan dge slong 'jigs med grags pa bgyis pa'o// 'dis kyang thub bstan snying po blo bzang rgyal ba'i ring lugs dri ma med pa phogs dus kun tu dar zhing rgyas la yun ring du gnas par gyur cig/ dga' ldan chos 'khor gling du par du grub// bkra shis// ）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十二世紀前後的三尊像等。[130] 藏地民間也稱此類造像或其他三尊式樣為三怙主，但這些造像都是立像三尊，主尊蓮花手觀音與兩位脅侍都是二臂，其中的蓮花手菩薩沒有四臂觀音具有的特定「佛性」，因而不是後期成為藏地頂級神靈組合的三怙主。文殊、四臂觀音金剛手三怙主組合，是十三世紀前後四臂觀音與六字真言形成固定搭配以後的造像體系。完整的四臂觀音三怙主系統在藏地開始流行大約在十四世紀前後，典型例證是夏魯寺集會殿東南壁下方佛菩薩本尊行列中分別以單尊表現的金剛手、四臂觀音與文殊菩薩像（圖41a-c），但此時還未形成固定的三怙主組像，四臂觀音的脅侍仍然是六字大明和持寶菩薩。即使到了十五世紀中葉的西藏江孜白居寺法王殿，施主饒丹貢桑帕（1389－1442）為建構江孜王系與吐蕃王朝相關聯的正朔地位，仍將十一面大悲觀音作為殿堂主尊，右側為文殊菩薩，左側為金剛手菩薩，進而構成「三怙主」系統（圖42）。[131] 明成化十五年（1479）漢地宮廷施造的密教曼荼羅「三怙主」唐卡，上方是金剛持、右下是二臂文殊，左下是四臂觀音，此時四臂觀音尚未成為三怙主的主尊，三怙主圖像並未完全定型（圖43）。[132]

大約十三世紀至十四世紀，這種四臂觀音三怙主與僧院系統對文殊菩薩的尊崇形成分野，並與中原漢地淨土信仰西方三聖、接引佛與觀音，觀音三大士組像的形成趨勢相呼應，承接吐蕃時期觀音信仰的累積與留存，藏地佛教神靈信仰中四臂觀音突然流行，形成了藏傳佛教神靈體系中的三怙主組像，這恰好是藏傳佛教僧俗兩種信仰的重新分配。作為主尊的佛部文殊菩薩變成了脅侍，而融合民間觀音信仰的四臂觀音成為三怙主的主尊，文殊與觀音的位置變化是理論體系與民間信仰與實踐調和的結果。可以看做是十四世紀以後藏傳佛教演化的圖像象徵形式。

---

[130] 如布達拉宮琍瑪拉康藏無編號十二世紀三怙主，為文殊菩薩主尊，金剛手、蓮花手觀音為脅侍，No798則轉為為蓮花手觀音為主尊、文殊與金剛薩埵（？）為脅侍的三尊，可見三尊位置這段時間在變化過程中。烏爾里希・馮・施羅德著，羅文華譯，《西藏寺廟珍藏佛教造像108尊》（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0），頁142-143，圖版47A與47B。

[131] 筆者2023年7月18日對西藏白居寺法王殿進行了考察，此殿可以看做是十五世紀西藏信仰中對吐蕃法王與觀音系統關聯的圖像闡釋。

[132] 此幅唐卡繪製在棉布上，畫面底端有「大明成化十五年四月十五日施」漢文榜題，一西主編，《海外回流西藏文物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頁180-185。

臺大藝術期刊資料庫

三怙主被認為是十四世紀以後藏傳佛教最為重要的圖像組合，十六世紀初甘丹頗章政權時期完成了對四臂觀音三怙主的至尊神係的構建，如五世達賴《西藏王臣記》將三怙主的出現與松贊干布聯繫起來，並將拉薩北郊帕邦喀宮殿的「自生」三怙主作為藏地最殊勝的三怙主組像（圖44a-c）。[133] 自此之後，藏傳佛教圖像出現的四臂觀音基本都是三怙主式樣，《寶王經》及《成就法鬘》傳承的四臂觀音三尊式樣逐漸消失，只是偶爾出現。[134] 藏西一幅十六世紀初的格魯派傳承唐卡，恰好透露出三怙主的形成路徑，此幅唐卡頂行中央三尊阿彌陀佛-觸地印釋迦牟尼-四臂觀音象徵橫三世，以四臂觀音代表藥師佛；十一面觀音頭光兩側有文殊、金剛手與窟頂包含四臂觀音的橫三世佛構成三怙主雛形，以文殊與金剛手兩側宗喀巴與布頓大師寓示三怙主與藏傳佛教的教義體系，主尊下方兩側有四臂觀音的眷屬持寶菩薩和六字大明母，呼應頂端阿彌陀佛和四臂觀音，並以十一面觀音不空羂索觀音等表示格魯派觀音造像沿襲《寶王經》的系統。這是後期唐卡中出現兩位脅侍的罕有案例（圖45a-b）。[135]

---

[133] 五世達賴《西藏王臣記》記載，松贊干布在文成公主堪輿卜算後，心中大喜，在吉雪娘禪地方名為帕邦喀的巨石之上，用紅爐鐵水鑄造大磚，建造九層城堡，四面都用鐵鏈拴緊使其牢固。然後修法禳災，修到第七天時感到怙主三尊從空中降臨，說「藏王你所發的宏願，當獲成就，我是你的一切宏願，將不難獲得成功的見證者。」這樣說完，三怙主也就融入岩石中去了，而岩石上也自然的顯現出了三怙主的像。後由尼泊爾工匠據此雕出三怙主像，至今猶存。（sngar kong jos brtsis pa'i bcos thabs rnams ma byung bar brten/ lha 'dres bshig pas slar kong jo'i rtsis rnams zhib par rgyal po'i snyan du gsan nas shig tu dgyes te skyid shod nyang bran pha bong kha'i brag steng du sa khro chu la sbyar nas mkhar dgu thog yod pa brtsigs nas phyogs bzhir lcags thag btags/ brtan par byas te sgrub pa mdzad pas zhag bdun na rigs gsum mgon po mkha' la byon nas/ khyod kyis smon lam rgya chen po thob cig/ nged kyis smon lam mtha' dag 'bad med du 'grub pa'i dpang po byes pa yin gsungs nas rdo la thim pa'i rang byon bal po'i lha bzo bas ji bzhin brkos pa teng sang yang lus can kun gyi 'dren byed kyi dga' ston du gsal bar yod cing/ ）五世達賴，《西藏王臣記》（*bod kyi deb ther dpyid kyi rgyal mo'i glu dbyangs*），藏文本（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頁41。

[134] 由地方法王建造的十五世紀的西藏江孜白居寺吉祥多門塔對漢藏佛教早期圖像進行了梳理，其中二層四臂觀音三尊是此期較為少見的原型三尊形式。

[135] 此件唐卡收藏與美國克利夫蘭博物館，說來自藏西，尺寸94.6 x 69.2公分，編號Andrew R. and Martha Holden Jennings Fund 1982.147。https://www.clevelandart.org/art/1982.147（檢索日期：2023年10月29日）。感謝浙大漢藏藝術中心研究生趙媛提供出處。

臺大藝術學門資料庫

結論

唐宋以降，觀音圖像因應民眾基層信仰的變化而發生了眾多的分化。南詔大理從胎藏界蓮華部分化出阿嵯耶觀音，宋遼融合了華嚴與法華信仰的水月觀音，十二世紀前後在吐蕃、西夏、回鶻等地興起並逐漸蔓延的四臂觀音，以及作為四臂觀音眷屬而來的獅吼觀音等，共同組成不同地域多民族反映不同社會階層共同信仰的觀音形式，這種新形式結合了普通信眾通過念誦佛號（阿彌陀佛）或咒語（六字真言）的西方淨土往生信仰，同時吸收了僧侶或知識階層為達到頓悟解脫的目的而採用的觀音次第修習程式。淨土解脫思潮使得不同時期的「統治階層」將新的觀音樣式納入社會信仰體系的最高等級。

在宋夏元時期，藏傳佛教流傳地區形成新三怙主，以四臂觀音統領藏傳佛教神靈系統，呼應吐蕃時期的胎藏界密教事部三尊；僅從三怙主的代表性觀察，藏傳佛教的本質並不包括金剛乘無上瑜伽密的內容；漢地佛教流布地區則形成了新的「三大士」，作為主尊的水月觀音以從原主尊毗盧遮那或釋迦牟尼處繼承而來的獅座形成騎獅觀音的新樣式，獅座觀音形象的一致性使得漢傳騎獅觀音逐漸等同於藏地傳入的獅吼觀音，逐步替換為四臂觀音，從而與藏傳佛教圖像體系勾連，並通過文殊、普賢形成四臂觀音為主尊的漢地三大士，以華嚴三聖的義理進入漢地社會主流的華嚴信仰。漢地三大士尚以水月觀音和善財童子完善華嚴的教理邏輯，沖淡根植東亞信仰深處的西方三聖淨土信仰；通過水月觀音至四臂觀音樣式的替換，漢地輪藏與大士的特殊關聯，成功將漢傳華嚴信仰通過四臂觀音輸入藏傳佛教信仰區域，源自華藏空間信仰的轉經筒成為藏地普通信眾最為重要的手持法器，這是我國多民族基層信仰趨同的最為重要的實例，漢地華嚴空間想像存在於藏地的民間信仰中。

西夏、回鶻十二至十三世紀自《寶王經》衍生的觀音修習文本提到四臂觀音，十三世紀至十四世紀初絲路東段河西走廊出現四臂觀音圖像，並將之作為一種新的觀音式樣替代大悲觀音為主的其他觀音，如如意輪觀音和不空羂索觀音；藏地也在十三世紀末至十四世紀初，與六字真言固定搭配的四臂觀音圖像流行開來，借助基層觀音信仰的力量和胎藏界三尊自吐蕃至後弘期的變化格式，即金剛手-毗盧遮那/釋迦牟尼/文殊菩薩-蓮花手觀音的路徑，形成文殊-四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臂觀音-金剛手的事部三怙主，從而進入藏傳佛教的密教系統，三怙主將原本屬於西方淨土的基層信仰與側重儀軌教法師承的藏傳佛教義理融合在新的觀音圖式中，逐漸替代或等同毗盧遮那或釋迦牟尼，將佛部文殊菩薩推至脅侍的位置，四臂觀音成為主尊，重組的三怙主成為了藏傳佛教不同層次信眾至高無上的神靈。

元代濫觴於衛藏夏魯寺的四臂觀音圖像，隨著元代朝廷與薩迦派及西藏地方的政治文化交流，與絲路河西原本盛傳的觀音與四臂觀音信仰緊密聯繫起來，成為新興的多民族王朝以智慧慈悲之心進行意識形態相互溝通、交流的符號。自十四世紀以後，六字真言專指或等同於四臂觀音，但脫離了與之相連的四臂觀音圖像以密咒真言形式成為藏傳佛教的象徵，並借助轉輪藏演變而來的轉經筒流布至藏傳佛教傳播的廣大地區。探索從雪域高原到東海之濱、從絲路戈壁到塞上江南，浸潤了西方淨土與華嚴信仰的漢藏多民族四臂觀音圖像的演變史，可以勾畫宋夏元時期藏、漢、回鶻、西夏、蒙古等多民族政治文化交流的軌跡，並印證元明以來我國多民族文化的趨同彙聚特徵。

（責任編輯：陳卉秀）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dBa’ gsal snang

dBa’ bzhed bzhugs so/，拉薩：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2012。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全唐文》（全五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卷676。

五世達賴

《西藏王臣記》（*bod kyi deb ther dpyid kyi rgyal mo’i glu dbyangs*），藏文本，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

（唐）不空譯

《無量壽如來觀行供養儀軌》，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第19冊，No. 930。

《大樂金剛不空真實三昧耶經般若波羅蜜多理趣釋》，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第19冊，No. 1003。

《十一面觀自在菩薩心密言念誦儀軌經》，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第20冊，No. 1069。

巴哩譯師（Ba ri lo tsa ba）譯

《巴哩百法》（*Ba ri brgya rtsa’I lha’I mngon rtogs nams bzhugs so*），收入《藏文大藏經》，德格版，No.3306-3399；北京版，No.4127-4220。

天息災譯

《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第20冊，No. 1050。

（後漢）支婁迦讖譯

《佛說無量清淨平等覺經》，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第12冊，No. 361。

木雅噶布

《帝師熱巴傳》，收入德拉但主編，《遊行記》（*Lam yig phogs bsgrigs/*），香港：博學出版社，2018，頁255-365。

《丹噶宮所藏一切經目錄》（*Pho brang stod thang ldan dkar gyi chos ‘gyur ro cog gi dkar chag*），收入《丹珠爾》，德格版jo，葉294-310，日本東北大學編大藏經目錄4364。

巴塞囊著；佟錦華、黃布凡譯

《拔協（增補本）譯注》（*sBa bzhed*），藏漢合璧本，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

札巴孟蘭洛卓（Grags pa smon lam blo gros）

《柰巴教法史——古譚花鬘》（*Nel pa chos ’byung sngon gyi me tog phreng ba*），藏文本，原文初刊於《中國藏學》，藏文本，1989年4期，頁71-100。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札巴孟蘭洛卓著；王堯、陳踐譯
《奈巴教法史—古譚花鬘》,《中國藏學》, 1990年1期，頁108-127。
（唐）玄奘譯
《十一面神咒心經》, 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 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第20冊，No. 1071。
布頓・仁欽珠
《布頓教法史》, 藏文本，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88。
布頓・仁欽珠著；蒲文成譯
《布頓佛教史》, 漢譯本，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2007。
旬努貝
《青史》, 藏文本，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下冊。
西藏博物館編
《旁塘目錄・聲明要領兩卷》(*dKar chag 'phang thang ma sGra sbyor bam po gnyis pa*)，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多羅那他著
《後藏志》(*Myang chos 'byung*)，藏文本，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
多羅那他著；佘萬志譯
《後藏志》, 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
《佛說一切如來金剛三業最上祕密大教王經》(*De bshin gshegs pa thams cad kyi sku gsung thugs kyi gsang chen gsang ba 'dus pa zhes bya ba brtag pa'i rgyal po chen po/*)，收入《甘珠爾》, 多頗章版，續部第100卷，rgyud, kha 1b1-84b7 (vol. 100)；《甘珠爾》, 納塘版，續部第84卷，rgyud, ca 64a7-153a2 (vol. 84)。
阿地瞿多譯
《陀羅尼集經》, 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第18冊，No. 901。
阿底峽（Atīśa）著；仁青桑布（Rin chen bzang po）譯
《*Āryāvalokiteśvarasādhana*（梵文經名）, *'Phags pa spyan ras gzigs 'jig rten dbang phyug sgrub pa'i thabs*（藏文經名）》, 收入《丹珠爾》鉛印本第一部第22卷（*bsTan 'gyur*, Par gzhi dang po)，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2008。
阿莽班智達・恭卻堅贊（dPal mang pandita dKon mchog rgyal mtshan）
《阿莽・恭卻堅贊全集》, 第3卷，清咸豐年間甘丹卻闊林寺刻板。
（元）念常
《佛祖歷代通載》, 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 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第49冊，No. 2036。
（南宋）宗鑑
《釋門正統》, 收入《續藏經》, 卷75，No. 1513。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北周）耶舍崛多譯

《佛說十一面觀世音神咒經》，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第20冊，No. 1070。

《神僧傳》，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第50冊，No. 2064。

施護譯

《佛說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三昧大教王經》，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第18冊，No. 882。

《佛說一切如來金剛三業最上祕密大教王經》，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第18冊，No. 885。

《聖六字增壽大明陀羅尼經》，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第20冊，No. 1049。

娘・尼瑪維色（Nyang Nyi ma ’od zer mNga’ bdag nyang ral）

《娘氏宗教源流》（*Chos ‘byung med tog snying po sbrang rtsi’i bcud*），藏文本，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

索南堅贊著；劉立千譯

《西藏王統記》，漢譯本，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

國家圖書館版本提供

《諸佛菩薩妙相名號經咒》，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1。

第烏賢者著

《第烏教法史》（*mKhas pa lde’us mdzad pa’i rgya bod kyi chos ’byung rgyas pa*），拉薩：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87。

（清）黃廷桂、（清）憲德修；（清）張晉生等纂

《欽定四庫全書史部十一・四川通志[雍正]》，卷二十七，清乾隆元年（1736）刻本，浙江大學圖書館地志庫編號1：280/33.1。

絳貢工珠洛珠塔耶編輯（’Jam mgon kong sprul bLo gros mtha’ yas）

《大悲米紮心要六字觀世音世間自在修法》（*Thugs rje chen po mi tra snying thig ’phags pa spyan ras gzigs ’jig rten dbang phyug yi ge drug pa’i sgrub thabs.*），收入倫珠和喜饒智美（Ngodrup And Sherab Drimay）輯，《大寶伏藏》（*Rin chen gter mdzod chen mo* 2a-2b），第38卷（1976-1980）。

（元）程鉅夫

《雪樓集》，收入《元代別集叢刊—程鉅夫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

義淨譯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第23冊，No. 1442。

葛寅亮

《金陵梵剎志》，卷16，杜潔祥主編，《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1輯，第4冊，臺北：明文書局，1980。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實叉難陀譯
《大方廣佛華嚴經》，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第279部，卷19。
《語合》（*sGra'i rnam par dbye ba bstan pa*），收入《丹珠爾》，北京版，經疏部（mDo 'grel）ngo卷（vol. NGO 63v7-64r2: ）。
蔡巴・貢噶多吉著；東嘎・洛桑赤列校注
《紅史》（*Deb thar dmar po*），藏文本，北京：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
蔡巴・貢噶多吉著；東嘎・洛桑赤列校注；陳慶英、周潤年譯
《紅史》，漢譯本，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
（唐）慧沼著；玄奘譯本注疏
《十一面神咒心經義疏》，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第39冊，No. 1802。
薩迦巴索南堅贊（Sa skya pa bsod nams rgya mtshan）
《西藏王統記》（*rGyal rabs gsal ba'i me long*），藏文本，北京：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
羅福萇
《初印〈西夏國書略說〉》1冊，附圖珂羅版，線裝手書印本，東山學社，1914，後由西北民族大學房少新收藏。
《寶王經》卷四，收入《丹珠爾》，多頗章寫本（stog pho brang），卷74，葉577-578。
《寶篋莊嚴大乘經》（*'Phags pa za ma tog bkod pa s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收入《甘珠爾》，納塘版ja函，葉200a-247b，日本東北大學編大藏經目錄116。
覺囊尊者多羅那他（Jo nang rje btsun Taranatha）
《寶源百法》（本尊大海成就法・大寶生處）（*Yi dam rgya mtsho'i sgrub thabs rin chen 'byung gnas*），札什倫布寺複製本，新德里：窮佩洛丹（Choephel legden），1976，上冊。
《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等監修，《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3，第46冊，No. 1955。

近人論著

一西主編
2012 《海外回流西藏文物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
Yixi ed.
2012 *Quintessence of Returning Tibentan Cultural Relics from Oversea*,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大足石刻研究院編
2012 《大足石刻》，重慶：重慶出版社。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Dazu shike yanjiuyuan (Academy of Dazu Rock Carvings) ed.
2012 *Dazu shike* (Dazu Rock Carvings), Chongqing: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才讓
2016 《菩提遺珠：敦煌藏文佛教文獻的整理與解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Tsering
2016 *Puti yizhu: Dunhuang Zangwen Fojiao wenxian de zhengli yu jiedu* (Hidden Gems of Bodhi: A Colle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ibetan Dunhuang Manuscripts on Buddhism),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編
2015 《北平研究院北平廟宇調查資料匯編：內一區卷》，北京：文物出版社。
China Academy of Cultural Heritage ed.
2015 *Beiping yanjiuyuan Beiping miaoyu diaocha ziliao huibian: nei yi qu juan* (Documentary Collection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emples in Beiping by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Beiping: Volume of Inner Town Section One),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王惠民
1994 〈安西東千佛洞內容總錄〉，《敦煌研究》，1期，頁126-129。
Wang, Huimin
1994 "Anxi Dongqianfo dong neirong zonglu (General Records of the Legacy from Eastern Thousand Buddha Caves in Anxi)," *Dunhuang Research,* no. 1, pp. 126-129.
王瑞雷、賈維維
2019 〈西藏阿里托林寺白殿壁畫配置與殿堂功能〉，《考古與文物》，1期，頁95-104。
Wang, Ruilei, and Weiwei Jia
2019 "Investigation of the Constructor, Construction Date, and Spatial Function of the Baidian Temple in Tholing Monastery in Ngaris,"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 no. 1, pp. 95-104.
王傳播
2022 〈夏魯寺嘎加羌殿的營建歷史、圖像配置與空間意蘊〉，《故宮博物院院刊》，7期，頁82-91。
Wang, Chuanbo
2022 "On the Construction History, Iconographical Program and Spatial Connotation of bka' rgya byang Chapel, Zhwalu Monastery," *Palace Museum Journal*, no. 7, pp. 82-91.
王傳播主編
2022 《藏族美術集成・拉達克等地卷》，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Wang, Chuanbo ed.
2022 *Zangzu meishu jicheng, Ladake deng di juan* (Collection of Tibetan Fine Art: Volume of Ladakh and Other Regions), Chengdu: Sichuan minzu chubanshe (Sichuan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王慧慧
2021 〈莫高窟第464窟《大乘莊嚴寶王經變》考釋——莫高窟第464窟研究之三〉,《西夏學》,1期,頁317-331。
Wang, Huihui
2021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Da Cheng Zhuang Yan Bao Wang Jing Bian": Study on Cave No.464 of Mogao Grottoes (Ⅲ)," *Xixia Studies*, no. 1, pp. 317-331.
北京文博交流館編
2007 《智化寺藏元明清佛經版畫賞析》,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Cultural Exchange Museum ed.
2007 *Zhihua si cang Yuan Ming Qing fojing banhua shangxi* (Appreciation and Analysis of Buddhist Sutra Woodblock Prints from the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Zhihua Temple's Collection), Beijing: Beijing Yanshan Press.
李翎
2006 〈藏傳佛教六字觀音像研究(上)〉,《普門學報》,第35期,頁141-156。
Lee, Ling
2006 "Sadaksarī-lokeśvara in Tibetan Buddhism: An Iconographical Study (1)," *Universal Gate Buddhist Journal*, no. 35, pp. 141-156.
法國國家圖書館編
2009 《法藏西域文獻》,卷3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ed.
2009 *Dunhuang and Other Central Asian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The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vol. 32,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金維諾等主編
2010 《中國美術全集・石窟寺壁畫3》,合肥:黃山書社。
Jin, Weinuo et al. ed.
2010 *Zhongguo meishu quanji, shiku si bihua 3* (The Complete Works of Chinese Fine Arts: Murals in Cave Temples Volume Three), Hefei: Huangshan Publishing House.
金維諾總主編;謝繼勝主編
2016 《西域美術全集12・高昌石窟壁畫卷》,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Jin, Weinuo editor-in-chief; Xie, Jisheng ed.
2016 *Xiyu meishu quanji 12, Gaochang shiku bihua juan* (The Art of Xiyu in Twelve Volumes: Murals in Gaochang Temple Caves), Tianjin: Tianjin renmin meishu chubanshe (Tianjin People's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重慶大足石刻藝術博物館、重慶市社會科學院大足石刻藝術研究所編
1999 《大足石刻銘文錄》,重慶:重慶出版社。
Chongqing Dazu shike yishu bowuguan (Art Museum of Dazu Rock Carvings, Chongqing), and Graduate Institute of Dazu Rock Carvings Art of Chongq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eds.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1999 *Dazu shike mingwen lu* (Inscriptions of Dazu Rock Carvings), Chongqing: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德堡分所等編

1996 《俄藏黑水城文獻》，第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俄藏黑水城文獻》，第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St. Peter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et al. ed.

1996 *Heishuichce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Russia*, vol. 3,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0 *Heishuichce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Russia*, vol. 6,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孫伯君

2009 〈黑水城出土《聖六字增壽大明陀羅尼經》譯釋〉，《西夏學》，第4輯，頁46-51。

Sun, Bojun

2009 "Heishuicheng chutu Sheng liuzi zengshou da ming tuoluoni jing yishi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Sacred Mantra of Six Syllables for Increasing Longevity Vidya Dharani Sutra* Unearthed in Khara-Khoto)," *Xixia Studies,* no. 4, pp. 46-51.

翁連溪、李洪波主編

2014 《中國佛教版畫全集》，北京：中國書店，第2、7卷。

Weng, Lianxi, and Hongbo Li eds.

2014 *Zhongguo Fojiao banhua quanji*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Buddhist Block Printings in China), Beijing: China Books, vols. 2, 7.

陳愛峰

2016 〈柏孜克里克石窟第17窟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變考釋〉，《敦煌研究》，6期，頁82-92。

Chen, Aifeng

2016 "A Study on the Avalokitesvara-guna-karanda-vyuha Sutra Illustration in Cave 17 at the Bezeklik Grottoes," *Dunhuang Research*, no. 6, pp. 82-92.

烏爾里希・馮・施羅德著；羅文華譯

2010 《西藏寺廟珍藏佛教造像108尊》，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Schroeder, Ulrich von; Luo, Wenhua trans.

2010 *108 Buddhist Statues in Tibet*, Beijing: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閆雪

2009 〈北京智化禪寺轉輪藏初探——明代漢藏佛教交流一例〉，《中國藏學》，1期，頁211-214。

Yan, Xue

2009 "Beijing Zhihua chansi zhuanlunzang chutan: Mingdai Han Zang Fojiao jiaoliu yi li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Preliminary Survey on the Dharmachakra of Zhihua Temple in Beijing: An Example of Exchanges between Han and Tibetan Buddhism in the Ming Dynasty)," *China Tibetology*, no. 1, pp. 211-214.

敦煌研究院編

1997 《敦煌石窟藝術：莫高窟第四六四、三、九五、一四九窟（元）》，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

Dunhuang Academy ed.

1997 *Dunhuang shiku yishu: Mogaoku di siliusi, san, jiuwu, yisijiu ku (Yuan)* (The Art of Grottoes in Dunhuang: Mogao Cave 464, 3, 95 and 149, Yuan Dynasty), Nanjing: Jiangsu meishu chubanshe (Jiangsu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瑞士蘇黎世大學民族學博物館版本提供

2011 《五百佛像集：見即獲益》，《藏傳佛教圖像學叢書》，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

Edition Belongs to The Ethnographic Museum of the University of Zurich

2011 *Wubai foxiang ji: jian ji huoyi* (Deities of Tibetan Buddhism: The Zurich Paintings of the Icons Worthwhile to See), *Zangchuan fojiao tuxiangxue congshu* (The Book Series of Iconology in Tibetan Buddhism), Beijing: China Tibetology Publishing House.

楊新、王家鵬主編

2002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中國藏傳佛教雕塑全集上・金銅佛》，北京：北京美術攝影出版社。

Yang, Xin, and Jiapeng Wang eds.

2002 *Zhongguo meishu fenlei quanji, Zhongguo Zangchuan fojiao diaosu quanji, shang, jin tong fo* (The Complete Works of Chinese Art Classification: Complete Sculpture Artworks of Tibetan Buddhism in China Volume One: Gilt Bronze Buddhas), Beijing: Beijing meishu sheying chubanshe (Beijing Arts and Photography Publishing House).

賈維維

2019 〈西夏石窟造像體系與巴哩《成就百法》關係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10期，頁20-36。

Jia, Weiwei

2019 "The Iconographical System of Tangut Grotto Buddhist Images and Bari brgya rtsa," *Palace Museum Journal*, no. 10, pp. 20-36.

熊文彬、唐櫻家

2023 〈元明漢藏藝術交融的視覺證據——西藏阿里三圍地區的漢式龍鳳藝術遺珍〉，《故宮博物院院刊》，4期，頁4-20。

Xiong, Wenbin, and Yingjia Tang

2023 "The Han-Styled Artworks with Dragon and Phoenix Motif in mNgav ris of Ali as Visual Witnesses to Chinese Han-Tibetan Art Blending Through the Yuan and Ming Dynaties," *Palace Museum Journal*, no. 4, pp. 4-20.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趙雪芬
2011 〈炳靈寺石窟四臂觀音造像試探〉,《西藏研究》,1期,頁78-84。
Zhao, Xuefen
2011 "Analysis on the Statues of the Four-armed Avalokiteshvara in Grottoes of Bingling Temple," *Tibetan Studies*, no. 1, pp. 78-84.
劉敦楨
1982 〈北平智化寺如來殿調查記〉,收入《劉敦楨文集》,第1卷,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頁61-128。
Liu, Dunzhen
1982 "Beiping Zhihua si rulai dian diaocha ji (Survey notes on the Tathagata Hall of the Zhihua Temple in Beiping)," in *Liu Dunzhen wenji* (Collected Works of Liu Dunzhen), vol. 1,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Publishing, pp. 61-128.
德新、張漢君、韓仁信
1994 〈內蒙古巴林右旗慶州白塔發現遼代佛教文物〉,《文物》,12期,頁4-33。
Dexin, Hanjun Zhang, and Renxin Han
1994 "Nei menggu Balinyouqi Qingzhou baita faxian Liaodai Fojiao wenwu (Liao Buddhist Relics Discovered in the White Pagoda of Ancient Qingzhou in Bairin Right Banner, Inner Mongolia)," *Cultural Relics*, no. 12, pp. 4-33.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陽市北塔博物館編;王晶辰、董高、杜斌主編
2007 《朝陽北塔:考古發掘與維修工程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
Liaoning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and Zhaoyang Shi beita bowuguan (Chaoyang North Pagoda Museum) eds.; Wang, Jingchen, Gao Dong, and Bin Du eds.
2007 *Zhaoyang beita: kaogu fajue yu weixiu gongcheng baogao* (Chaoyang North Pagoda: A Report of the Excavation and Repair Work),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霍巍、張長虹主編
2017 《藏族美術集成・壁畫・阿里卷》,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Huo, Wei, and Changhong Zhang eds.
2017 *Zangzu meishu jicheng, bihua, Ali juan* (Collection of Tibetan Fine Art: Murals: Volume of Ali), Chengdu: Sichuan minzu chubanshe (Sichuan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謝繼勝
1996 《風馬考:西藏民間宗教、儀軌與神話》,臺北:唐山出版社。
2002 〈一件極為珍貴的西夏唐卡——武威市博物館亥母洞寺出土唐卡分析〉,收入宿白先生八秩華誕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編,《宿白先生八秩華誕紀念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下冊,頁597-613。
2014 〈居庸關過街塔造像義蘊考—11至14世紀中國佛教藝術圖像配置的重構〉,《故宮博物院院刊》,5期,頁49-80。
2018 〈漢藏文明的形成與多民族中國文明史〉,《中國社會科學報》,2月26日。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2018 〈扎塘寺主殿造像配置及其意蘊——兼論11-13世紀西藏佛教與佛教藝術的構成〉，《中國藏學》，3期，頁72-91。

2018 〈平措林寺六體六字真言碑與蒙元真言碑源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9本4分，頁663-710。

2021 〈扎塘寺壁畫法華圖像與11—14世紀中國多民族藝術史的重構——文殊彌勒、釋迦文殊與藏漢佛教義理的圖像形成史〉，《文藝研究》，11期，頁130-146。

Xie, Jisheng

1996 *Fengma kao: Xizang minjian zongjiao, yigui yu shenhua* (Survey on Lungta: The Tibetan Folk Religion, Ritual and Mythology), Taipei: Tonsan Books.

2002 "Yi jian ji wei zhengui de Xixia tangka─Wuwei Shi bowuguan Haimudong si chutu tangka fenxi (Rare Art of Western Xia Thangka: An analysis of the Thangka Paintings Discovered in Haimu Cave of Wuwei)," Su Bai xiansheng bazhi huadan jinian wenji bianjiweiyuanhui (Editorial Board for the Commemorative Issue of Collected Papers to Mark the Eightieth Birthday of Su Bai) ed., *Su Bai xiansheng bazhi huadan jinian wenji* (Commemorative Issue of Collected Papers to Mark the Eightieth Birthday of Su Bai),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2014 "The Iconography of Crossing Road Pagoda (Guojie Ta) Images of JuYongGuan Pass─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Buddhist Art Images and Composition from 11th to 14th Centuries," *Palace Museum Journal*, no. 5, pp. 49-80.

2018 "Han Zang wenming de xingcheng yu duo minzu Zhongguo wenmingshi (The Forming of Han-Tibetan Civilization and the History of Multi-Ethnic Civilization in China),"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Press*, Februaey 26.

2018 "Zhatang si zhudian zaoxiang peizhi ji qi yiyun─jianlun 11-13 shiji Xizang Fojiao yu Fojiao yishu de goucheng (Placement of the Status in the Main Hall of Zhatang Temple and Its Signification: Extend Study on the Constitution of Tibetan Buddhism and Buddhist Art During the 11th to 13th Century)," *China Tibetology*, no. 3, pp. 72-91.

2018 "The Multilingual O*ṃ maṇi-padme hūṃ* Stele from Phun-tshogs-gling Monastery and Mantra Steles of the Mongolian Yuan Period,"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89: 4, pp. 663-710.

2021 "Lotus Sūtra Image in the Murals of Grathang Monastery and Reconstruction of Multi-Ethnic Art History in the 11th-14th Centuries: Manjusrī-Maitreya, Sākyamuni-Manjusrī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an and Zang Images of Buddhist Doctrines," *Literature & Art Studies*, no. 11, pp. 130-146.

謝繼勝主編

2019 《藏族美術集成・雕塑藝術・江南卷》，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Xie, Jisheng ed.

2019 *Zangzu meishu jicheng, diaosu yishu, Jiangnan juan* (Collection of Tibetan Fine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Art: Sculptures: Volume of Jiangnan), Chengdu: Sichuan minzu chubanshe (Sichuan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謝繼勝、才讓卓瑪

2020 〈宋遼夏官帽、帝師黑帽、活佛轉世與法統正朔——藏傳佛教噶瑪噶舉上師黑帽來源考〉(上、下),《故宮博物院院刊》,6期,頁45-60;7期,頁58-71。

Xie, Jisheng, and Tshe ring sgrol ma

2020 "The Liao-Xixia Official Hats, Ti-shis Black Hat, 'Phrul-sku Reincarnation and Imperial Legitimism——Tracing The Origin of Karmapa Black Hat," *Palace Museum Journal*, no. 6, pp. 45-60; no. 7, pp. 58-71.

謝繼勝、熊文彬、廖暘、賴天兵、R. Linrothe(林瑞賓)、葉少勇等

2014 《江南藏傳佛教藝術——杭州飛來峰石刻造像》,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

Xie, Jisheng, Wenbin Xiong, Yang Liao, Tianbing Lai, R. Linrothe, and Shaoyong Ye et al.

2014 *Jiangnan Zangchuan fojiao yishu: Hangzhou Feilai feng shike zaoxiang* (Tibetan Buddhist Art in Jiangnan: The Stone Buddhist Statues in Feilai Peak of Hangzhou), Beijing: China Tibetology Publishing House.

謝繼勝、趙媛

2021 〈建構多民族共創中華文明史的知識體系〉,《廣西民族大學學報》,4期,頁66-70。

Xie, Jisheng, and Yuan Zhao

2021 "Jiangou duo minzu gongchuang Zhonghua wenmingshi di zhizhi tixi (Constructing Multi-Ethnic Society for a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History)," *Journal of Guan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o. 4, pp. 66-70.

魏文

2010 〈甘肅永登紅城感恩寺考察報告〉,收入謝繼勝主編,《漢藏佛教美術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頁353-410。

Wei, Wen

2010 "Gansu Yongdeng Hongcheng Ganen si kaocha baogao (Report of the Investigation on Ganen Temple in Hongcheng of Yongdeng County, Gansu)," in Xie Jisheng ed., *A Journal for Sino-Tibetan Buddhist Art Studies*, Beijing: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pp. 353-410.

魏同賢、孟列夫主編;俄羅斯國立艾爾米塔什博物館、上海古籍出版社編纂

2002 《俄藏敦煌藝術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Wei, Tongxian, and L. N. Men'shikov eds.; The State Hermitage Museum of Russia, and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compiled

2002 *Dunhuang Art Relics Collected in The State Hermitage Museum of Russia,*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顏娟英

2006 〈唐代十一面觀音圖像與信仰〉,《佛學研究中心學報》, 11，頁85-116。

Yen, Chuanying

2006 "Iconography and Faith of the Tang-dynasty Eleven-headed Guanyin," *Journal of the Center for Buddhist Studies*, no. 11, pp. 85-116.

藏族美術集成編輯委員會編

2021 《藏族美術集成・繪畫藝術・壁畫・日喀則卷》,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Zangzu meishu jicheng bianji weiyuanhui (Editorial Board for the Collection of Tibetan Fine Art) ed.

2021 *Zangzu meishu jicheng, huihua yishu, bihua, Rikeze juan* (Collection of Tibetan Fine Art: Paintings: Murals: Volume of Shigatse), Chengdu: Sichuan minzu chubanshe (Sichuan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羅德瑞克・韋陀（Roderick Whitfield）；林保堯編譯

2019 《西域美術（二）：大英博物館斯坦因蒐集品（敦煌繪畫2）》, 臺北：藝術家出版社。

Whitfield, Roderick; Lin, Baoyao ed. and trans.

2019 *Xiyu meishu er: Dayingbowuguan Sitanyin soujipin (Dunhuang huihua 2)* (The Art of Xiyu Volume Two: The Aurel Stein Collection in British Museum, Dunhuang Paintings Part Two), Taipei: Artist Publishing Co.

（印度）蘇達卡爾・沙爾曼著，向紅笳、劉釗譯

2020 《印度帕拉王朝的造像藝術》, 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Sudhakar Sharma; Xiang, Hongjia, and Zhao Liu trans.

2020 *The Heritage of Buddhist Pala Art*, Shanghai: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村木二郎

2003 〈東日本の經塚の地域性〉,《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 第108集，頁165-190。

Muraki, Jiro

2003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utra Mounds of Eastern Japan," *Bulletin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Japanese History*, no. 108, pp. 165-190.

Bhattacharyya, Benoytosh (巴達恰利亞)

1968 *The Indian Buddhist Iconography: Mainly Based on the Sādhanamālā and Other Cognate Tantric Texts of Rituals* (成就法鬘), Calcutta.

Imaeda ,Yoshiro (今枝由郎)

1979 "Note preliminaire sur la formule om mani padme hum dans les manuscrits tibetains de Touen-houang (敦煌藏文寫卷六字真言初探)," in Michel Soymieed., *Contributions aux etudes sur Tbuen-houang* (敦煌研究論稿), Geneve-Paris: Librarie Droz, pp. 71-76.

臺大藝術期刊資料庫

Sharma, Sudhakar
2004 *Heritage of Buddhist Pala Art*, New Delhi: Aryan Books International.
Verhagen, P. C.
1990 "The Mantra "Oṃ maṇi-padme hūṃ" in an Early Tibetan Grammatical Treatise," *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13:2, pp. 133-138.

網路論文與資料庫

美國大都會博物館
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60785（檢索日期：2023年10月29日）。
Buddhist Digital Resource Center (BDRC)
purl.bdrc.io/resource/MW26572（檢索日期：2023年10月29日）。
美國克利夫蘭博物館
https://www.clevelandart.org/art/1982.147（檢索日期：2023年10月29日）。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版出處

圖1a　比哈爾邦出土四臂觀音三尊。（印度）蘇達卡爾・沙爾曼著，向紅笳、劉釗譯，《印度帕拉王朝的造像藝術》（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20），圖版82（巴特那博物館藏青銅編號No. 9788/9780）。

圖1b　大都會博物館藏般若經貝葉經插圖四臂觀音

圖1c　四臂觀音三尊。楊新、王家鵬主編，《中國美術分類全集・中國藏傳佛教雕塑全集上・金銅佛》（北京：北京美術攝影出版社，2002），頁58，圖版67。

圖2　明宣德六年（1431）的《諸佛菩薩妙相名號經咒》十一面八臂大悲觀音。國家圖書館版本提供，《諸佛菩薩妙相名號經咒》（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1），頁43。

圖3　明宣德六年（1431）的《諸佛菩薩妙相名號經咒》四臂觀音。國家圖書館版本提供，《諸佛菩薩妙相名號經咒》，頁42。

圖4　夏魯寺甘珠爾殿不空羂索五尊

圖5a　內蒙古赤峰巴林右旗慶州白塔出土《大乘莊嚴寶王經六字大明陀羅尼》單頁雕板印畫

圖5b　福建福清瑞岩山將軍岩獨醒石豎立吳越式樣佛塔

圖6　俄羅斯艾爾米塔什博物館藏敦煌觀音

圖7　救六難「四臂觀音」

圖8　柏孜克里特石窟29窟阿彌陀佛

圖9　柏孜克里特石窟29窟阿彌陀佛下方蓮池化生童子

圖10　黑水城出土阿彌陀三尊。艾爾米塔什博物館編號X2340，尺寸42 x 27公分。

圖11　柏孜克里特石窟29窟四臂觀音

圖12　柏孜克里特石窟29窟阿彌陀佛仰覆蓮座

圖13a　麥積山元代第38窟雙龕四臂觀音

圖13b　麥積山元代第38窟雙龕之阿彌陀佛

圖14　北宋《妙法蓮華經》刻本「杭州晏家重開六字觀音□（雕）印」。翁連溪、李洪波主編，《中國佛教版畫全集》（北京：中國書店，2014），第2卷，頁261-262。

圖15　飛來峰64龕與65龕《寶王經》阿彌陀佛三尊

圖16　莫高窟464窟主五方佛阿彌陀佛與蘭札體梵字六字真言

圖17　炳靈寺洞溝第5窟送子觀音與四臂觀音圖

圖18a　賀蘭山山嘴溝第3窟全圖

圖18b　賀蘭山山嘴溝第3窟四臂觀音

圖19　武威亥母洞出土文殊菩薩唐卡局部

圖20　瓜州東千佛洞第5窟南北甬道口繪製四臂觀音與金剛薩埵

圖21　莫高窟149窟主壁壁畫。敦煌研究院編，《敦煌石窟藝術：莫高窟第四六四、三、九五、一四九窟（元）》（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1997），頁181-206。

圖22　莫高窟149窟東壁窟門兩側分別繪四臂觀音和金剛薩埵

圖23a　黑水城波羅樣式四臂觀音。艾爾米塔什博物館編號X2352。

臺大藝術圖書資料庫

圖23b　拉達克萬喇殿四臂觀音（王傳播供圖）
圖23c　拉達克萬喇殿西方三聖（王傳播供圖）
圖24　北京八達嶺彈琴峽金魚池舊址出土了元代四臂觀音
圖25a　夏魯寺噶夾牆殿內景
圖25b　夏魯寺噶夾牆殿四臂觀音三尊
圖26　明宣德六年刻本扉畫，施護《一切如來金剛三業最上秘密大教王經》扉畫。見翁連溪、李洪波主編，《中國佛教版畫全集》，第7卷，頁100。
圖27　夏魯寺三門殿東側外牆大悲觀音戒定慧瑜伽修習圖
圖28a　西夏文六字真言與四臂觀音銅捺印模具。羅福萇，《初印〈西夏國書略說〉》1冊（附圖珂羅版，線裝手書印本，東山學社，1914，後由西北民族大學房少新收藏）。
圖28b　回鶻文寫卷捺印四臂觀音與蘭札體梵字六字真言
圖29　榆林窟第27窟上師四臂觀音三尊
圖30　明宣德六年（1431）劉智慧刊刻的《聖觀自在求修六字禪定經》。北京文博交流館編，《智化寺藏元明清佛經版畫賞析》（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
圖31a　三世噶瑪巴大寶法王的心咒六字真言，宣德六年（1431）。國家圖書館版本提供，《諸佛菩薩妙相名號經咒》，頁49，佛部十四，大寶法王。
圖31b　寧夏平羅縣汝箕溝花石洞阿彌陀佛/釋迦摩尼與三怙主梵文種子字
圖32a　榆林窟第6窟蒙古西寧王夫婦供養人上方的四臂觀音佛髻
圖32b　青海玉樹雜多巴艾寺佛塔遺址佛塔全圖
圖32c　青海玉樹雜多巴艾寺佛塔遺址佛塔四臂觀音與護法
圖32d　西藏昌都乃普寺靈塔殿靈塔四臂觀音局部（西藏文物保護研究所供圖）
圖32e　西藏昌都乃普寺靈塔殿靈塔殿西壁四臂觀音（西藏文物保護研究所供圖）
圖32f　藏西卡茲河谷寺院所出四臂觀音三尊唐卡（阿里地區文物局文物室提供）
圖33a　炳靈寺146窟四臂觀音千佛壁畫
圖33b　永昌博物館藏三世佛唐卡螺髻四臂觀音
圖34　遼寧朝陽北塔地宮出土重熙十二年（1043）的金銀經塔。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陽市北塔博物館編，王晶辰、董高、杜斌主編，《朝陽北塔：考古發掘與維修工程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圖35　鎌倉時代建久七年（1196）利仁神社經塚出土銅經筒。東京博物館編號E-14524，福岡縣太宰府市原山寺經塚出土。
圖36　平安時代（十二世紀）鐵鑄經筒。東京博物館編號E-14401，埼玉縣東松山市利仁神社經塚出土。
圖37a-c　北京大覺寺主尊四臂觀音的三大士
圖38a-b　西藏阿里札達縣卡茲河谷帕爾宗石窟窟頂壁畫及局部（王瑞雷攝影）
圖39a-b　西藏阿里札達皮央石窟第351窟窟頂六字真言與局部。霍巍、張長虹主編，《藏族美術集成・壁畫・阿里卷》（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17），頁225，圖版1；頁229，圖版9。

臺大藝術期刊資料庫

圖40　敦煌研究院展覽館藏觀音立像三尊

圖41a-c 西藏日喀則夏魯寺集會殿東南壁壁畫金剛手、四臂觀音與文殊菩薩

圖42　西藏江孜白居寺法王殿「三怙主」主供佛

圖43　三怙主。一西主編，《海外回流西藏文物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頁180-185。

圖44a-c 西藏拉薩帕邦喀宮殿三怙主（陳舒怡攝影）

圖45a-b 格魯派觀音，格魯派觀音局部。美國克利夫蘭博物館。尺寸94.6 x 69.2公分，編號Andrew R. and Martha Holden Jennings Fund 1982.147。https://www.clevelandart.org/art/1982.147（檢索日期：2023年10月30日）。

（說明：沒標明拍攝者的圖版皆為作者本人拍攝）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宋夏元時期四臂觀音分布示意圖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a 比哈爾邦出土四臂觀音三尊



圖1b 大都會博物館藏般若經貝葉經插圖四臂觀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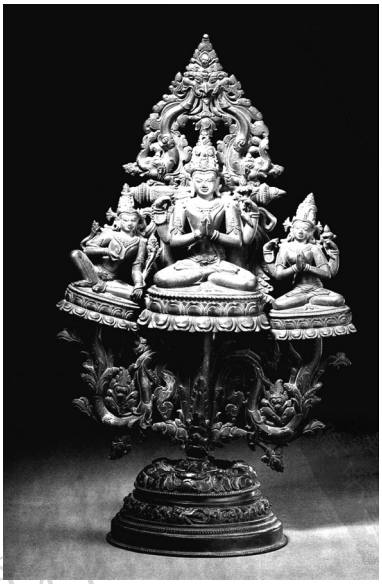


圖1c 四臂觀音三尊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



圖2　明宣德六年（1431）的《諸佛菩薩妙相名號經咒》十一面八臂大悲觀音



圖3　明宣德六年（1431）的《諸佛菩薩妙相名號經咒》四臂觀音



圖4　夏魯寺甘珠爾殿不空羂索五尊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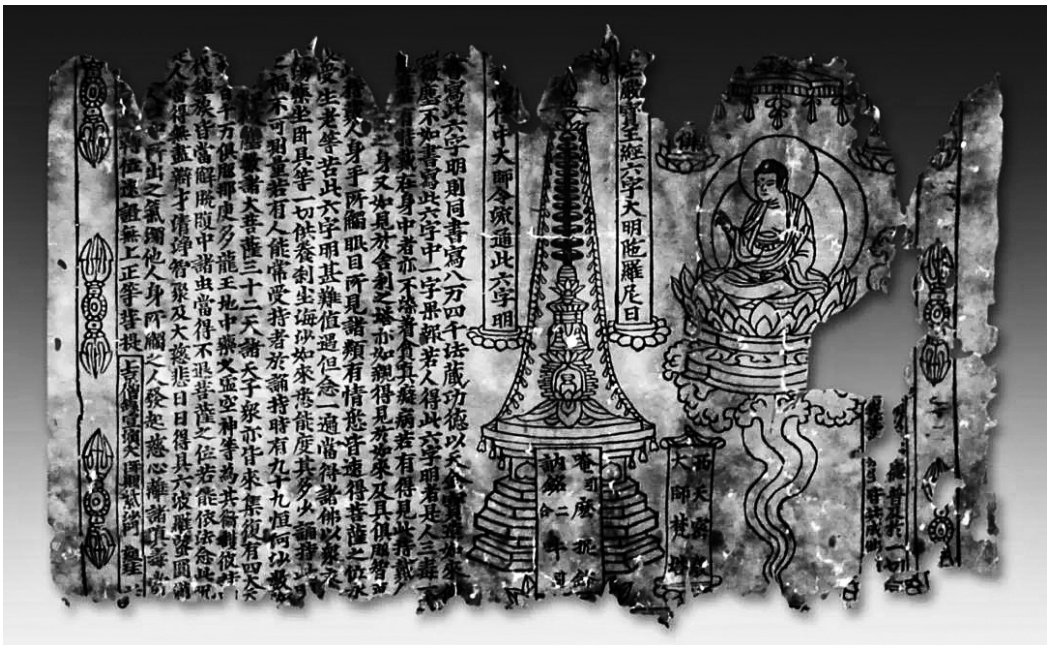


圖5a 內蒙古赤峰巴林右旗慶州白塔出土《大乘莊嚴寶王經六字大明陀羅尼》單頁雕板印畫



圖5b 福建福清瑞岩山將軍岩獨醒石豎立吳越式樣佛塔



圖6 俄羅斯艾爾米塔什博物館藏敦煌觀音

臺大學術期刊資



圖7　救六難「四臂觀音」



圖8　柏孜克里特石窟29窟阿彌陀佛



圖9　柏孜克里特石窟29窟阿彌陀佛下方蓮池化生童子



圖10 黑水城出土阿彌陀三尊 艾爾米塔什博物館編號X2340 尺寸42 x 27公分



圖11 柏孜克里特石窟29窟四臂觀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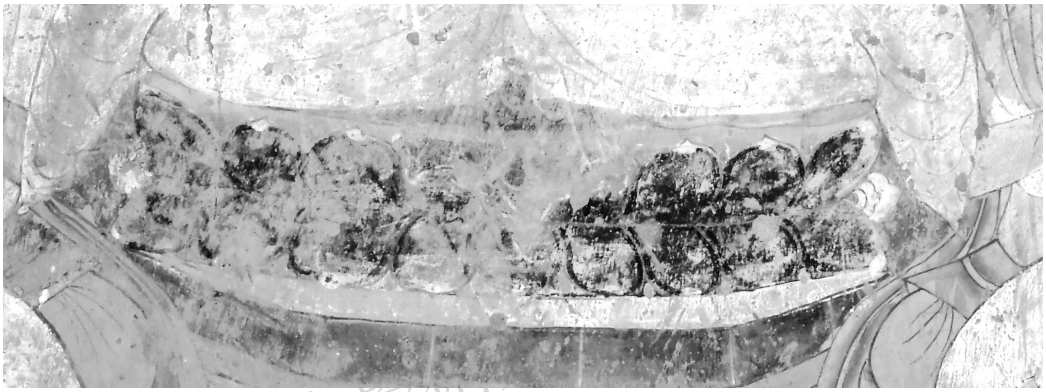


圖12 柏孜克里特石窟29窟阿彌陀佛仰覆蓮座

臺大藝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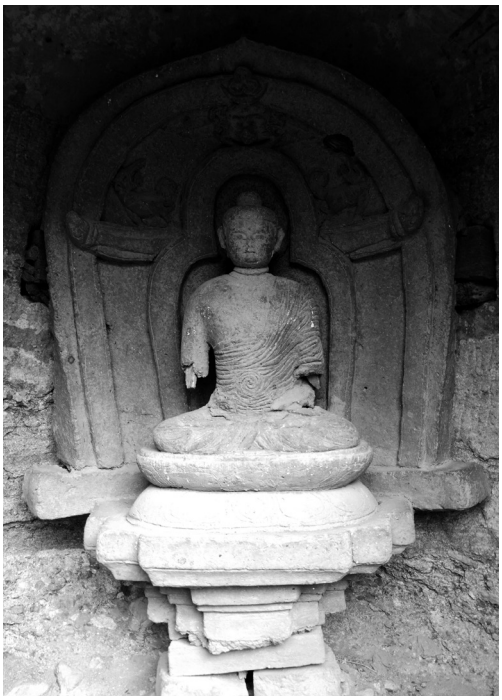


圖13a　麥積山元代第38窟雙龕四臂觀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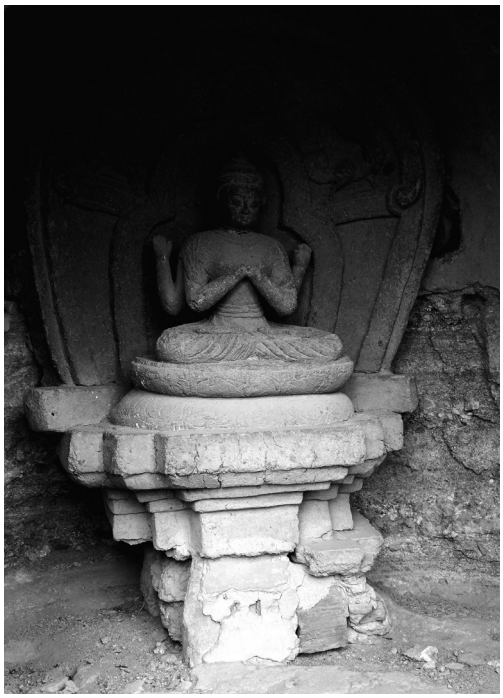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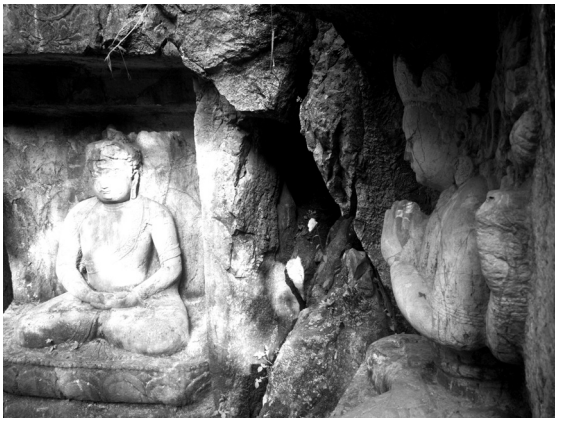


圖13b　麥積山元代第38窟雙龕之阿彌陀佛



圖14　北宋《妙法蓮華經》刻本「杭州晏家重開六字觀音□（雕）印」

臺大學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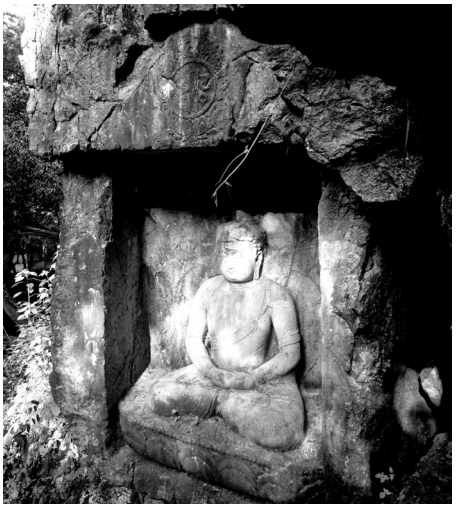


圖15　飛來峰64龕與65龕《寶王經》阿彌陀佛三尊



圖16　莫高窟464窟主五方佛阿彌陀佛與蘭札體梵字六字真言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7　炳靈寺洞溝第5窟送子觀音與四臂觀音圖



圖18a　賀蘭山山嘴溝第3窟全圖



圖18b　賀蘭山山嘴溝第3窟四臂觀音

臺大學術





圖19 武威亥母洞出土文殊菩薩唐卡局部

臺大藝術



圖20　瓜州東千佛洞第5窟南北甬道口繪製四臂觀音與金剛薩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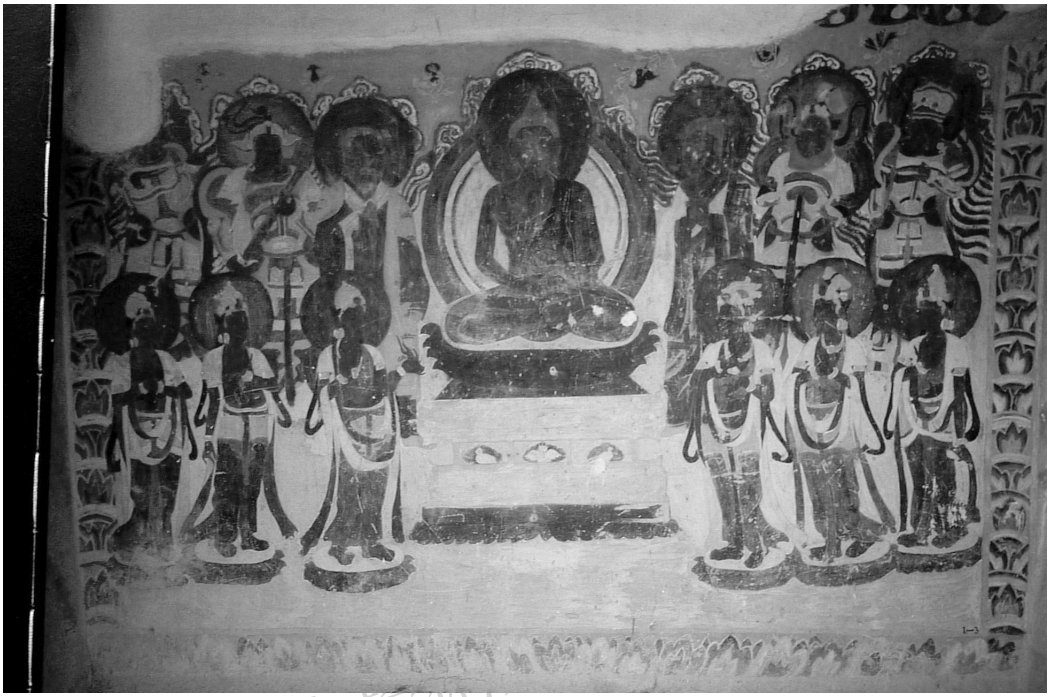


圖21　莫高窟149窟主壁壁畫

臺大學術



圖22 莫高窟149窟東壁窟門兩側分別繪四臂觀音和金剛薩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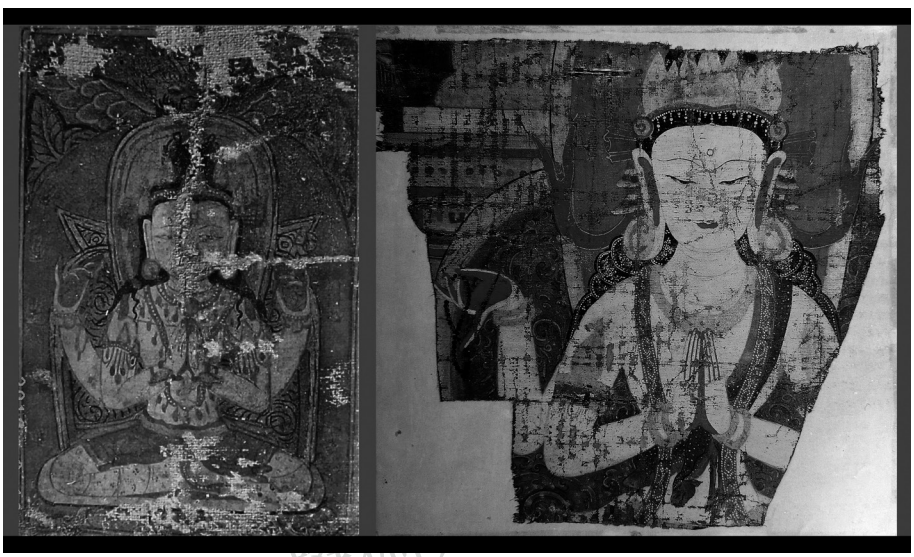


圖23a 黑水城波羅樣式四臂觀音 艾爾米塔什博物館編號X2352

臺大藝術



圖23b 拉達克萬喇殿四臂觀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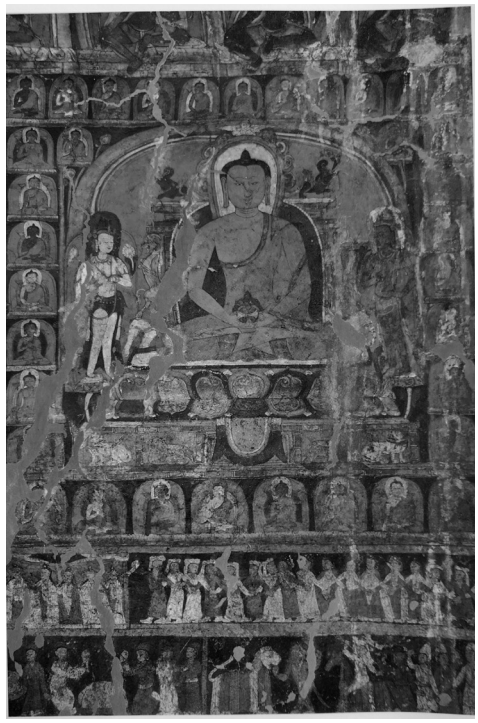


圖23c 拉達克萬喇殿西方三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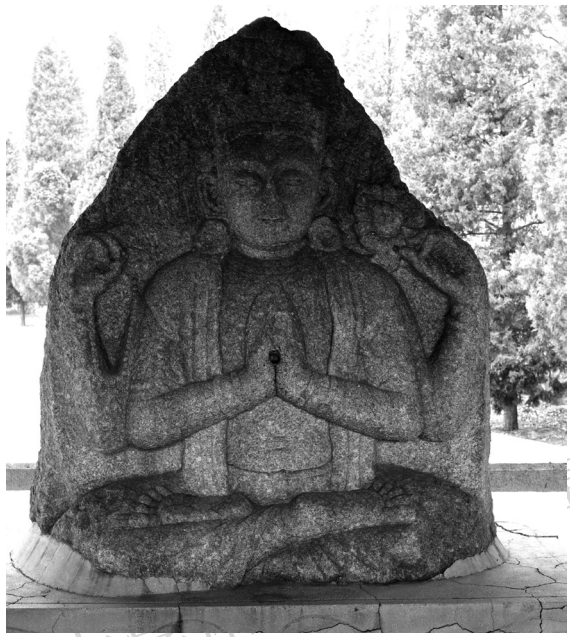


圖24 北京八達嶺彈琴峽金魚池舊址出土了元代四臂觀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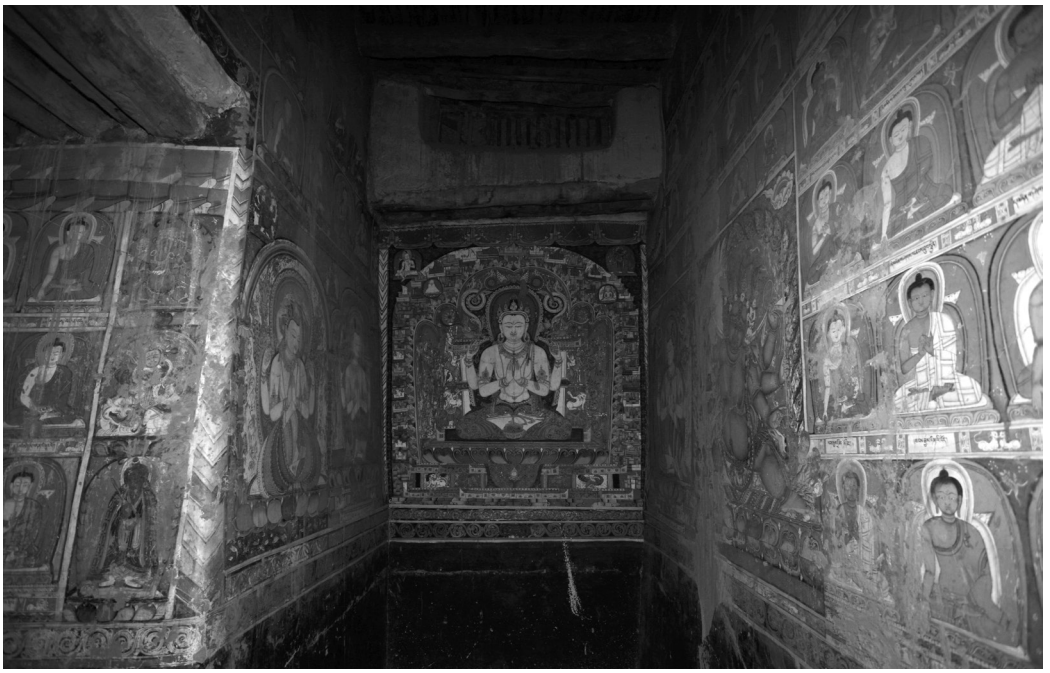


圖25a 夏魯寺噶夾牆殿內景



圖25b 夏魯寺噶夾牆殿四臂觀音三尊

臺大學術期刊資



圖26　明宣德六年刻本扉畫　施護《一切如來金剛三業最上秘密大教王經》扉畫



圖27　夏魯寺三門殿東側外牆大悲觀音戒定慧瑜伽修習圖

臺大臺灣



圖28a 西夏文六字真言與四臂觀音銅捺印模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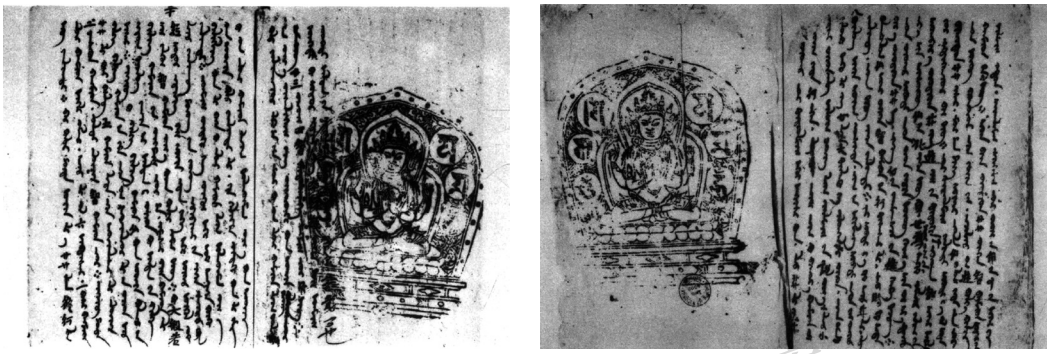


圖28b 回鶻文寫卷捺印四臂觀音與蘭札體梵字六字真言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29　榆林窟第27窟上師四臂觀音三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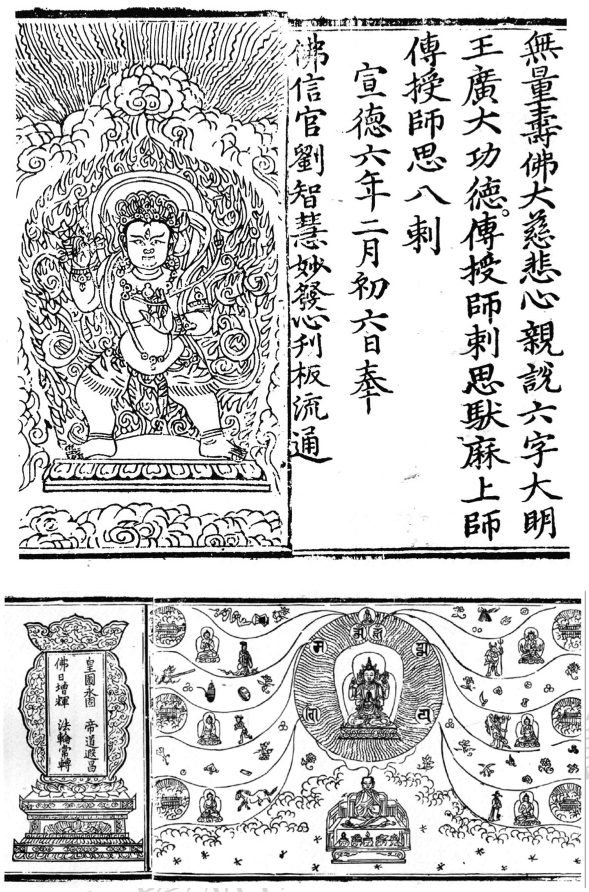


圖30　明宣德六年（1431）　劉智慧刊刻的《聖觀自在求修六字禪定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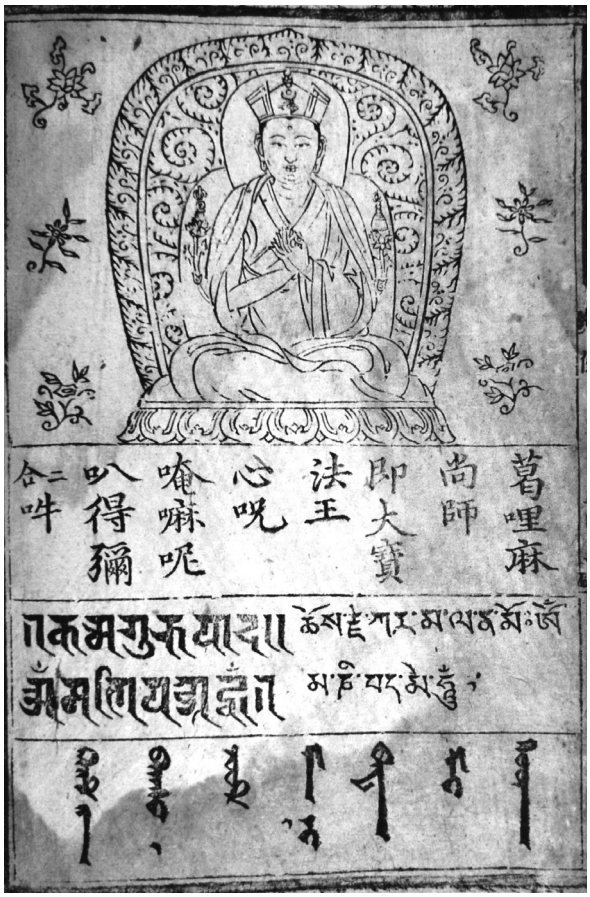


圖31a 三世噶瑪巴大寶法王的心咒六字真言 宣德六年（1431）



圖31b 寧夏平羅縣汝箕溝花石洞阿彌陀佛/釋迦摩尼與三怙主梵文種子字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庫



圖32a　榆林窟第6窟蒙古西寧王夫婦供養人上方的四臂觀音佛髻



圖32b　青海玉樹雜多巴艾寺佛塔遺址佛塔全圖



圖32c　青海玉樹雜多巴艾寺佛塔遺址佛塔四臂觀音與護法

臺大學術期



圖32d 西藏昌都乃普寺靈塔殿靈塔四臂觀音局部



圖32e 西藏昌都乃普寺靈塔殿靈塔殿西壁四臂觀音



圖32f 藏西卡茲河谷寺院所出四臂觀音三尊唐卡

臺大藝術



圖33a　炳靈寺146窟四臂觀音千佛壁畫



圖33b　永昌博物館藏三世佛唐卡螺髻四臂觀音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34　遼寧朝陽北塔地宮出土重熙十二年（1043）的金銀經塔



圖35　鎌倉時代建久七年（1196）利仁神社經塚出土銅經筒　東京博物館編號E-14524　福岡縣太宰府市原山寺經塚出土



圖36　平安時代（十二世紀）鐵鑄經筒　東京博物館編號E-14401　埼玉縣東松山市利仁神社經塚出土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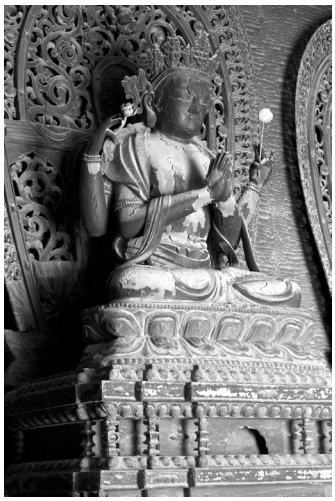




圖37a-c　北京大覺寺主尊四臂觀音的三大士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38a-b　西藏阿里札達縣卡茲河谷帕爾宗石窟窟頂壁畫及局部







圖39a-b　西藏阿里札達皮央石窟第351窟窟頂六字真言與局部

臺大藝術期



圖40　敦煌研究院展覽館藏觀音立像三尊



圖41a-c　西藏日喀則夏魯寺集會殿東南壁壁畫金剛手、四臂觀音與文殊菩薩

臺大藝術



圖42 西藏江孜白居寺法王殿「三怙主」主供佛



圖43 三怙主

臺大學術典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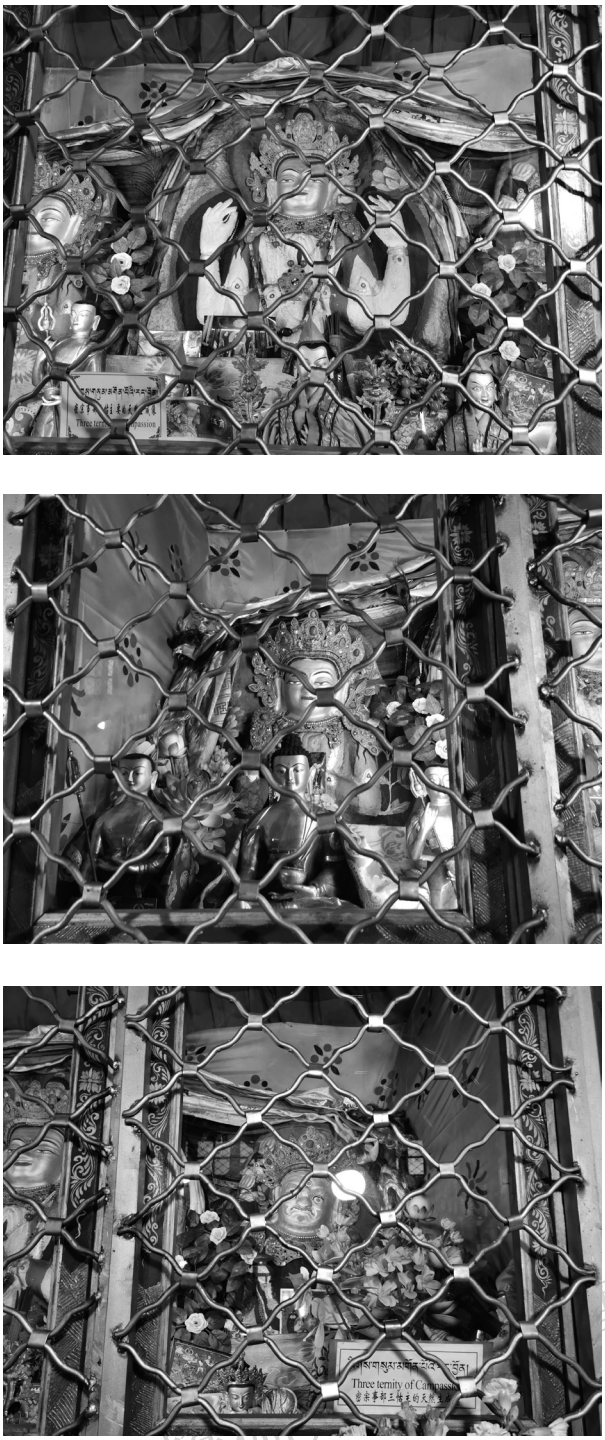


圖44a-c 西藏拉薩帕邦喀宮殿三怙主

臺大藝術學研究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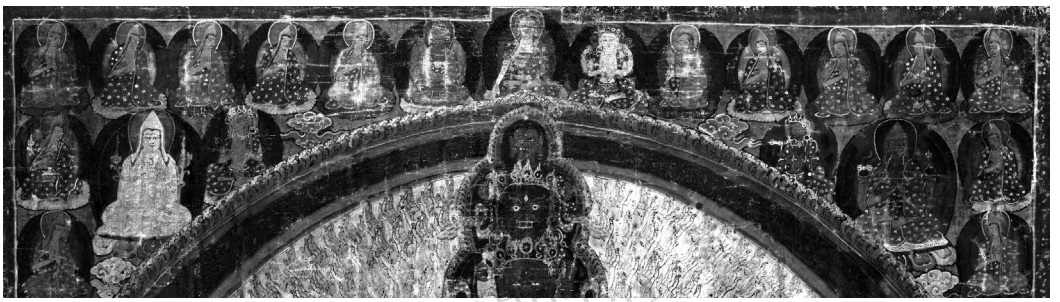


圖45a-b 格魯派觀音 格魯派觀音局部 美國克利夫蘭博物館 尺寸94.6 x 69.2公分 編號 Andrew R. and Martha Holden Jennings Fund 1982.147

臺大藝術期刊

The Convergence of Beliefs in Buddhism Among Han Chinese and Tibetan During the Song, Xia and Yuan Dynasties: Investigation on the Formation of Lokeshvara, Three Protectors (San Huzhu), Three Great Sages (San Dashi), and the Mani Wheel

Xie, Ji-sheng
School of Art and Archaeology
Zhejiang University

The Three Protectors (Rigs gSum mGon Po, or San Huzhu), which includes Chaturbhuja Lokeshvara, is the most important trinity of bodhisattvas in the Tibetan Buddhism. This combination of deities integrates the basic faith which is originally associated with the Western Pure Land (Sukhavati), and the beliefs with focus on ritual practices, teachings, and lineage in the Tibetan doctrines, creating a new representation of Avalokiteshvara. Meanwhile, the position of Guanyin in the Han-Chinese Buddhism rises and enters the Huayan system, becoming the new principal deity of the three honored ones or the three Huayan saints. Guanyin accepts the lion throne of the two previous main deities, which develops the Three Great Sages (San Dashi) with Manjushri, Guanyin and Samantabhadra in the trinity. Guanyin has then become the leading deity for the Buddhist monasteries in the Central Plains of China since the Song and the Western Xia dynasty. Though the consistency in the appearances of Lokeshvara's retinue, the Simhanada Avalokiteshvara (Avalokiteshvara of the Lion's Roar) and the Guanyin of San Dashi who is seated on a lion mount, Tibetan San Huzhu is partially integrated into the system of Han Chinese San Dahsi. This results in that the Tibetan Avalokiteshvara, the Lokeshvara, replaces the Great Compassion Guanyin or the lion-riding Shuiyue Guanyin, forming a new style of San Dashi, the trinity of Han-Tibetan fusion: Manjushri, Lokeshvara/ Simhanada and Samantabhadra. After the fourteenth century, the Six-Syllable Mantra specifically refers to Lokeshvara as an equivalent name. However, it is later detached from the connection to the image of Lokeshvara and becomes the symbolic secret mantra in Tibetan Buddhism. Besides, Guanyin and Lokeshvara acquires association with the wheel of dharma (Dharmachakra) in the San Dashi-centered Huayan world. And the mantra is subsequently adopted by the same Huayan realm. Roughly in the late fifteenth century, the mantra spreads out to the Tibetan region in the form of Mani wheel, and gradually become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local religious practices in Tibet.

(Translated by Peiyu Lin Andersson)

Keywords: Lokeshvara, Rigs gSum mGon Po, San Dashi, Dharmachakra, Mani wheel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